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周小川 陈 元 张 平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炳华	王洛林	宁吉喆	毕井泉	江小涓	刘元春
刘世锦	刘 伟	刘遵义	许宪春	朱之鑫	朱 民	朱光耀
杜 鹰	谷源洋	李 扬	李毅中	杨伟民	张大卫	张卓元
张 勇	张晓强	林兆木	林毅夫	郑新立	姜增伟	高培勇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常振明	黄奇帆	隆国强	程永华
韩永文	谢伏瞻	解振华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戴相龙	魏礼群	魏建国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王一鸣
副主任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晓河	王昌林	王 战	叶辅靖	陈文玲	迟福林	陈宗胜
李 平	李向阳	张宇燕	张 琦	张燕生	张蕴岭	范恒山
冼国明	郑京平	施子海	姚 洋	顾学明	贾 康	徐 林
黄志凌	黄群慧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王一鸣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李 蕊

· 本刊专论 ·

把握全球经济大势做好自己 郑京平 (005)

美联储“三重紧缩”及其政策溢出效应 谷源洋 (010)

· 数字经济 ·

数字时代的大国经济博弈：模式变迁与发展战略

许正中 行伟波 梁云燕 (019)

打通跨境电商的堵点与痛点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赵瑾 (029)

· 国际经济 ·

中美关系 50 年：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郭达 迟雪 (036)

三十而立：中韩服务业合作回顾、展望与建议 洪群联 (045)

中韩贸易 30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李天国 (055)

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对华影响及政策建议

——基于各成员国对中美贸易投资状况的对比分析

董惠梅 刘丹 曹怡婷 刘琪 (063)

借助全球环境基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周亚敏 (075)

· 理论前沿 ·

中国消费研究状况 1990—2020 年：知识图谱分析 逯万辉 荆林波 （085）

· 产业发展 ·

综合施策解决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痛点问题 景春梅 陈 妍 （096）

中国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的机制与路径 温 灏 田惠敏 （104）

· 名人观察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宁吉喆 郑新立 余永定 张军扩 贾 康 樊 纲 （112）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5）

CONTENTS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be ourselves *Zheng Jingping* (005)

Fed’s “triple tightening” and its policy spillover effects *Gu Yuanyang* (010)

The great power economic game in the digital era; mode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Xu Zhengzhong, Xing Weibo, Liang Yunyan (019)

Break through the blocking points and pain point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ual circulation *Zhao Jin* (029)

50 years of Sino-US relation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Guo Da, Chi Xue* (036)

Standing at thirty: review, prospect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Korea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Hong Qunlian (045)

30 years of China-Korea trade;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Li Tianguo* (055)

Influence of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on China and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US trade and investment by member countries
Dong Huimei, Liu Dan, Cao Yiting, Liu Qi (063)

Reflections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help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Zhou Yamin* (075)

The state of consumption research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Lu Wanhui, Jing Linbo (085)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third-party assessment i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Wen Hao, Tian Huimin (096)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ain poi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Jing Chunmei, Chen Yan* (104)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把握全球经济大势做好自己

郑京平

摘要：2022—2023 年世界经济前景不佳，正在步入近 20 年的低谷，滞胀阴云笼罩。主要原因是前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逆全球化、绿色低碳经济转型脚步超前、人口老龄化、新冠疫情等。治理经济滞胀或说要走出经济滞胀泥潭是比较复杂和棘手的宏观调控问题。需要分别清晰地判断“滞”和“胀”的原因，通过抓住主要问题，采取结构性的宏观政策进行治理。化解风险的出路是重修和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间协调，研究创立新国际结算货币，迈稳绿色转型脚步等。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要实现更好发展，需紧紧把握住全球经济的发展大势，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尽力推动修复发展全球化，构建高质量发展环境，加快调整结构，积极稳妥推进低碳绿色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做好自己。

关键词：世界经济 经济滞胀 全球化 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郑京平，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全球经济被不利因素干扰、悲观情绪笼罩的当下，作为开放型经济大国，要想充分发挥增长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力量，惟有紧紧把握住全球经济的发展大势，继续推进全球化，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深化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努力做好自己。

一、世界经济前景黯淡

当前，关于世界经济前景的预测，可以说正被悲观情绪所笼罩。随随便便即可列举出“一打”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与矛盾。新冠病毒感染冲击的不利影响仍在持续；通货膨胀超出预期，治理的条件和基础差，控制难度大，尤其是粮食、化肥和能源价格飙升，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联合国《2022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饥饿人口超过 8 亿人，比新冠疫情前增长了 1.5 亿人，约有 9300 万人重新陷入贫困，许多低收入者陷入生活困境，加剧了通胀的严峻性；乌克兰危机负面影响大、外溢程度高，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稳定；绿色转型受到挑战；多国政府更迭，不稳定因素上升等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的预测，2022 年全球增长率可维持在 3.2% 的水平，但 2023 年的预测值只有 2.7%。2023 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占全球经济 1/3 左右的国家将出现经济萎缩。美国和欧元区等大体量的经济体将继续处于增长停滞状态（见表 1）。

通常来说，IMF 的预测都是相对乐观的。而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和智库的预测则可能更接近实际，他们给出的预测更趋悲观。如，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预测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由于实际

收入减少、利率上升，以及资产和房价下跌带来的不利财富效应，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 GDP 在 2023 年将出现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2 年 11 月 22 日预测，2023 年和 2024 年美国 GDP 的增长只有 0.5% 和 1.0%。联合国贸发会议 10 月 3 日发布《2022 贸易与发展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增速 2022 年为 2.5%，2023 年进一步放缓到 2.2%，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的威胁。

从通胀角度看，问题更加突出。2022 年 9 月，美国通胀率同比上涨 8.2%；核心通胀率上涨 6.6%，创下 40 年新高。10 月，欧元区同比通胀率已飙升至 10.7%，为欧元区有史以来最高水平，是欧洲央行通胀控制目标的 5 倍。英格兰银行预计，英国 2022 年通胀水平将达到 10.9% 的峰值。

总之，世界经济正步入近 20 年的低谷，滞胀难题凸显。面对挑战丛生、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出路何在？

表 1 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单位：%

	2021 年	2022 年 估计值	2023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 年 10 月）预测， 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			
世界	6.0	3.2	2.7
发达国家	5.2	2.4	1.1
美国	5.7	1.6	1.0
欧元区	5.2	3.1	0.5
日本	1.7	1.7	1.6
发展中国家	6.6	3.7	3.7
印度	8.7	6.8	6.1
俄罗斯	4.7	-3.4	-2.3
巴西	4.6	2.8	1.0
中国	8.1	3.2	4.4
世界银行（2022 年 6 月）预测，按照汇率方法进行汇总			
世界	5.7	2.9	3.0
发达国家	5.1	2.6	2.2
发展中国家	6.6	3.4	4.2

数据来源：IMF、世界银行。

二、找准原因对症下药化解危机

治理经济滞胀或说要走出经济滞胀泥潭是比较复杂和棘手的宏观调控问题。因为应对“滞”与“胀”二者的宏观政策会出现冲突。如，为对抗通胀，货币政策要求实际利率上升，而这会使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政策因为担负照顾大众民生的重任，更希望实际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以此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分别清晰地判断“滞”和“胀”的原因，通过抓住主要问题，采取结构性的宏观政策进行治理。

分析本轮“胀”的原因：一是前期货币供给过大，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后遗症。二是全球化大倒退，破坏了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提高了供给成本。这既有人为破坏因素，包括为保住霸权、用意识形态划线、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等；也有突发并演变成持续性全球性疫情的影响。三是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脚步有些超前。四是人口老龄化，疫情因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极端天气等等。本轮“滞”的原因，除了导致“胀”的原因外，还有疫情改变及影响了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与需求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前期货币供给过大，大水漫灌的后遗症因素，属于“欠债还钱”性质，最多只能适当放缓“还钱”的速度，而不能不“还钱”。极端天气属于天灾，短期内无能为力。人口老龄化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各国政府能够实施并较快见效的措施是：第一，尽快摒弃“政治正确”，重振全球化的雄风；第二，适当放缓绿色低碳经济转型脚步，尽管大方向需要始终坚持。这两条既是短期应急之举，也是长期需要注意和坚持的举措。此外，长期来看，还要通过国际支付体系的改革，走出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手段，恣意操作，绑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困境；通过改革全球

合作机制，强化国家间协调，以助力全球化；加强有效的国际贸易和交往机制，继续推动全球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建议。

一是尽快消除阻碍全球化的因素，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从短期看，治理滞胀就是要扩大供给，压缩需求。能够较快见效的措施是，各国携手力推全球化，尽快修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扩大生产要素配置范围和效率，实现提高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率的目标，进而实现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特别是对民生影响大的粮食、能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及日益短缺的人力资源，更需要优先考虑在全球范围互通有无、自由流动。全球化是治理滞胀最方便也最易见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需视自身情况，配之以价格控制、暴利税、反垄断措施和监管商品投机等市场与行政干预相结合的务实手段，强力抑制通货膨胀。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利于短期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衰退，也是长期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途径。要将“政治正确”压缩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及领域；尽可能大地拓展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范围及领域。先易后难，尽快着手实施。可以从区域或利益集团开始，不断过渡及扩展到全球和各个领域。

二是学会在加强传染疾病防治条件下，有效推动全球化的方法。毫无疑问应该优化新冠病毒感染防治管控，与此同时，也应在有效防治传染疾病大规模爆发条件下，尽早寻求并适应推动全球化的途径。首先在思想上要接受和重视，传染性疾病的全球化一定是相伴相随的这一严峻事实。其次要付诸行动，做到防治传染性疾病大规模爆发与加强经济全球化并举。

三是进一步发挥二十国集团（G20）作用，加强国际间协调。应从现有国际沟通协调机构/机制入手，尽快形成各国协调共进、联手抗击滞胀的合力，以提高抗击效率。G20 是一个可选平台，但需要改革。由于 G20 只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工作人员，仅由当年主席国设立临时秘书处来协调集团工作和组织会议。如果要使其发挥更大更加实质性的作用，需要进行较大改革。一个可选的方向是成立常设机构，加强日常协调。应建立常设秘书处，以便更好地保障 G20 平台运转效率，提高处置问题和有关决议的针对性、及时性和连续性。领导人峰会应在现有每年一次的基础上，视情况增加临时峰会。每年一次的各国财长和行长会议也应该增加频率，调整为每年两次。

四是推动研究创立新国际结算货币，结束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局面。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问题多多，广受诟病。创立新国际结算货币日益紧迫。美国已多次利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外汇的地位，以美国自身利益为核心，转嫁经济危机，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当前的经济形势为例，美国为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大幅度快速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已上调到 3.75%~4%，达到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使得其他国家也要随之上调利率，以免本币的利率与美元的利率差距太大。而这又无疑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当一些国家，包括其盟友国家，难以承受高利率压力，停止或放慢加息时，本国货币兑美元就会大幅度贬值，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经济损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就深受其害。例如，随着美元走强，美元指数屡创新高，在美国的投资已经比在欧洲、亚洲更具吸引力。大量资本从欧亚流向美国。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却还在力挺所谓市场化的美元汇率；总统拜登也说“不担心美元暴涨”，并将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推给其他国家。面对美国制造痛苦、让世界难受的这种做法，其他国家显得很无奈。这也许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说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

但物极必反，美国的行径，美元的霸道，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许多国家纷纷被迫采取行动“去美元化”。这为改革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创造了条件。一个可能的方向是：通过市场竞争和国际社会协商，形成由几种主权货币组合而成的国际货币。对于这几种主权货币的发行，以及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要有一定约束和限制。也就是说，参与国际货币组合的国家需要让渡一定的货币政策主权。例如，货币发行量要经过特定的国际议定机制批准，或者要与某些贵金属做一定比例的挂钩等等。从而

达到，既可以避免由于金本位带来的通缩，又可以避免没有约束的货币滥发，侵占他国利益。表面上看这种国际货币类似于 IMF 的特别提款权（SDR）。但由于有市场竞争为基础，又对主权货币发行增加了一些限制性条件，既保留了现行竞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点，又可以限制其不足，可能较 SDR 更加容易被市场接受，更实际些。改革初期，可以授权 IMF 或成立新的独立国际组织来实施对这些货币发行的约束。这样有一定基础的国际协商机制，比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全球货币更容易实现。建议有关国家或机构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牵头及时推动创立新国际结算货币体系。

五是坚定方向、迈稳绿色转型脚步。加强全球环境保护，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是基于地球适合人类可持续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全球共识。因此，转型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但转型的方式和进程应该更加稳妥，特别是当全球经济面临滞胀引发衰退的风险很高的时刻，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本需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任何操之过急或不当都有可能对转型本身的质疑，不利于绿色低碳经济转型长期目标的实现。

六是加强科技研发创新应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及协调，提高生产率。要通过国际合作及协调，提升科技研发创新应用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克服高通货膨胀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量子计算、氢能开发、核能应用、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都是方向。在提高管理水平方面，也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

总之，面对治理经济滞胀这一复杂和棘手的宏观调控局面，惟有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尽快恢复和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方能使全球经济逐步摆脱滞胀，防止或减轻衰退。

三、加快结构性改革与转型，努力做好自己

世界经济疲弱的大背景，在短期内难以改观。单个国家或经济体尽管可以有所作为，为改善国际经济环境贡献一定的力量，但从总体上看，更主要的还是被动接受和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即使是经济大国或大的经济体也是如此。因此，中国想在世界经济疲弱的大背景下，实现更好的发展，在充分发挥经济大国优势、尽力改善国际经济环境的同时，努力做好自己的事至关重要。面对世界经济的风险、挑战和高度不确定性，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发展不动摇。

一是要敞开胸怀，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继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抓手，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以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为方向，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开展跨境证券投融资改革试点和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境、运输等政策。稳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

二是要积极发挥大国影响力，尽力推动修复发展全球化。中国的发展得利益于全球化，中国的发展也有力推动了全球化。摆脱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困境要依赖于全球化。因此，面对当前逆全球化浊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积极发挥大国的作用，反

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尽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修复发展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改革完善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多边及双边等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按照国际惯例及全球化的新要求，研究倡导改革创新，探索新形势下推动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及协调新机制。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三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高质量的发展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时，明确提出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要切实落实好这些要求。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使市场各类主体充满活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基本形成，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激励机制更加有效，营商环境更加优良，创新条件更加友好，产业链供应链更健全更坚固，供给能力更强；促使国内消费市场更宽阔，消费能力更强，投资结构更优化，投资效率更高；形成法治健全、高效规范、公平竞争、依法经营、高质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使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

四是要加快调整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要总量、要速度。世界经济疲弱的大背景使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受到制约，本身就比较脆弱的资源与环境制约，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等问题，都意味着要加快结构调整，用高质量发展克服环境资源短板，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改善发展不平衡，缩小收入差距。近些年，结构调整转型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远没到位。要下大力气切实转变观念，改革开放，探索创新，认真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构建好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上下功夫。依靠创新发展增强发展动力；依靠协调发展克服发展不平衡矛盾；依靠绿色发展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依靠开放发展实现内外联动，相互促进；依靠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特别要关注关心关爱收入最低的 5% 人口的收入和生活，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五是要坚定而又积极稳妥地推进低碳绿色转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过渡。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力度与进度，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稳步前行，使转型的脚步更加扎实，更具可持续性。

六是要创造条件激发科技创新和管理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充分认识探索创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使创新成为发展的不竭源泉。要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和法治建设，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各类容错机制，激励和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各类组织和每个人的探索创新积极性。继续加强和改善教育，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潜能。继续加强教育科研创新创造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充分学习交流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IMF. World Economy Outlook 2022, Oct. 2022.
2. OECD. Economic Outlook, Interim Report, September 2022.
3.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22, June 2022

责任编辑：李 蕊

美联储“三重紧缩”及其政策溢出效应

谷源洋

摘要：在通胀螺旋冲击下，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激进升息加速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最终将把美国拖入经济衰退的深渊。美联储持续加息扰动全球，带动美元指数攀升，改变世界资金流向，非美元主要货币大幅贬值，资本从多国流出，加重债务危机风险，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失序混乱。美国经济是当下世界经济的“缩影”，大多数国家通胀和经济前景迷雾重重，面临比美国更加严重的滞胀与衰退威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多重影响，以及给新兴市场金融体系造成的系列风险。更要特别警惕美联储货币政策急速变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未雨绸缪，全面做好缓冲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严防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

关键词：通胀螺旋 三重紧缩 溢出效应 经济衰退 金融混乱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美联储的主要职能是促进全民就业和物价稳定。根据就业和通胀曲线变化，在顺周期时，美联储采取紧缩措施；在逆周期时，美联储实施宽松政策。不管是宽松还是紧缩，都给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不同的政策溢出效应。

一、美联储用货币政策的“松与紧”调节宏观经济形势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即非常规货币政策。伴随经济形势向好，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美联储连续 9 次加息，后因经济数据恶化，没能完成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2019 年 7 月至 10 月，美联储面对全球需求和投资双放缓、美国财政刺激消退、持续加息滞后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景气不振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近忧和远虑，实施了 3 次称之为“预防性降息”，试图通过降息提前阻止经济下滑。2019 年底爆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打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预期，其乐观情绪消失。

美联储面对内外涌现出来的始料不及的系列负面因素，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宣布“紧急降息”50 个基点，并在 3 月 15 日召开临时会议再次降息 100 个基点，两次“紧急降息”150 个基点，使其联邦基金利率重返 9 次加息前的 0~0.25% 的“超低水平”。“预防性降息”产生了经济

刺激效应，但提振作用较为有限，而美联储紧急“放水救市”却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作用，甚至让市场惊讶、投资者恐慌，对当时经济形势及经济前景丧失信心，投资者争先恐后地抛售持有的股票，美国三大股指 4 次触发熔断，累计跌幅超过 30%。这样的后果是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及其同僚事前没能预料到的。“紧急降息”未能力挽狂澜，2020 年美国陷入深度衰退，经济收缩了 3.5%。

进入 2021 年以来，美国新冠疫情比 2020 年更显严重。美联储加大 QE 的“放水规模”。市场愈担心超宽松货币政策，叠加拜登总统耗资巨大的“新政”，势将加速扩大美国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进而改变美国经济增长轨迹。实践证实，市场等多方面的担忧有其道理。美国劳工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3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创下了 2018 年 8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对全年通胀预期亦随之上升。然而，鲍威尔对通胀及通胀预期的判断与市场的认知相差甚远，他认为美国经济强劲，供应链中断、市场供需错位只是推高了“部分产品”的价格水平，暂时出现了“略高的通胀”。因此，鲍威尔把其主要目标放在“促就业和强增长”方面，而抑制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则成为了次要目标。尽管美联储 2021 年 4 月发表的经济“褐皮书”指出，美国的 CPI 正在加速上行，并预计短期内还将继续上涨。但鲍威尔依然坚持通胀走高是“短期现象”。为安抚市场，稳定信心，鲍威尔甚至宣布美联储将维持宽松政策不变，未来三年不予加息，即便是通胀率上升至 2% 或以上，^① 亦可“容忍”一段时间，不会过快地改变宽松货币政策。在现实中，坚持通胀“短期论”的不止鲍威尔一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等高官，都曾是通胀“短期论”支持者。欧盟和欧元区通胀率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月通胀率甚至超过美国，英格兰银行、瑞典中央银行和欧洲央行等都不得不采取收缩政策，同美国一样面临着滞胀与衰退的严重考验。

二、美联储实施“三重紧缩”抑制通胀螺旋

2022 年是美联储启用 QE 的第 14 个年头。新冠疫情爆发后的这几年，QE 的力度明显增强，其政策潜在风险日趋彰显。各方关注 QE 究竟要不要调整？答案是肯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需要反向调整。主要原因包括：第一，QE 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其经济有些刺激作用，但不能持久使用，否则将给经济金融带来更多的伤害；第二，QE 的副作用或潜在风险逐渐从隐性变为显性；第三，在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经济有所恢复，失业率降低，通胀率上升；第四，QE 导致美元指数下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商品进口加征关税，助推美国通胀持续上扬；第五，拜登总统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法案》，增加低收入者的薪酬，进而加速房地产价格上扬。^② 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其主要推手是高昂的房价和亢奋的股市。然而，美联储何时调整货币政策及调整力度有多大，则受内外多种因素左右，主要取决于 5 个因素的综合权衡：新冠疫情的控制程度，经济的真实表现，财政支持的规模，就业状况的改善，通货膨胀变化走向。^③

2022 年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美国从以往十几年的低通胀走向高通胀。通胀就像脱缰之马越飞越高，拖延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全球石油等大宗商品短缺和价格迅猛飙升，并带动工业原材料上涨，加剧刺激美国通胀及通胀预期。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

①美联储在 2021 年 1 月正式宣布“长期通胀目标”为 2%，系指 PCE，而不是 CPI。但后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更重视 CPI 数据。

②2021 年 2 月，拜登在签署《提高最低工资法案》时表示，到 2025 年 6 月将最低时薪上调至 15 美元。

③谷源洋：《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还能走多久》，《全球化》，2021 年第 3 期。

MC) 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决定从当月开始“缩减购债规模”(Taper), 将每月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规模分别减少 100 亿美元和 50 亿美元, 此后不久又将两项缩减规模扩大到 300 亿美元。鲍威尔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在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季度听证会时表示, 不再将通胀高企视为“暂时性”现象, 声称到了弃用“暂时性”一词的时候了。但鲍威尔仍把这个“关键性的转变”解释为“暂时性”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 对许多人来说, 给人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 而美联储往往用这个词来表示通胀不会长期位于较高水平。Taper 开启了“三重紧缩”的第一步, 但数据表明 Taper 并没能抑制住美国通胀飙升, 12 月美国通胀率高达 7%。

2022 年 1 月 5 日, 美联储公布了上年 1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与会联储成员认为“在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后, 相对较短时间内开始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可能是合适的”。换句直白的话来说, 美联储向市场释放了需要“加息与缩表”的信息, 旨在阻止通胀率飙升。然而, 在行动上美联储既未“加息”, 也未“缩表”, 通胀持续攀升。2022 年 1 月至 3 月的通胀率同比分别上升为 7.5%、7.9%、8.5%, 通胀连续“高烧不退”, 其严重性超出预期, 但 2 月和 3 月的失业率却降至 3.9% 与 3.6%。在事实面前, 鲍威尔和美联储不得不改变立场, 把抑制通胀作为第一要务。市场、学者和华尔街对美联储何时加息、加息频率、加息幅度, 以及何时“缩表”、“缩表”规模、“加息与缩表”秩序安排等问题纷纷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但判断和预期不尽相同。较为一致的预测是美联储将于 3 月启动加息周期, 在加息预期下, 美元指数强劲走高,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的预测时对时错。这次市场等多方面对加息时间节点的预测基本准确。美联储 3 月 16 日果然宣布首次加息 25 个基点, 向“三重紧缩”迈开了第二步。与有些预期不同的是, 美联储只加息 25 个基点而不是 50 个基点。实际上, 美联储首次加息 25 个基点滞后于通胀及其预期, 未能起到遏制通胀的作用。

美联储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公布了 3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表明即将步入“既加息又缩表”的紧缩阶段。野村美国高级经济学家 Robert Dent 认为“加息与缩表”标志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步入了一个转折点, 开启了“量价双紧”的时代。^① 在 5 月 4 日议息会议上, 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 为 2000 年以来首次加息 50 个基点, 并宣布从 6 月 1 日起, 以每月 475 亿美元的上限正式启动缩表, 并在 3 个月后将上限增至每月 950 亿美元。美国 4 月的 CPI 为 8.3%, 比 3 月(8.5%)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 5 月至 10 月美国的 CPI 分别为 8.6%、9.1%、8.5%、8.3%、8.2%、7.7%, CPI 有所下降, 但仍居高不下。继 6 月和 7 月连续两次加息 75 个基点之后, 鲍威尔在 8 月下旬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的演讲强调, 美联储将继续坚定不移抗击通胀。不出市场所料, 9 月 20 日美联储第三次加息 75 个基点。9 月 30 日, 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表示, 美联储注意到激进加息所产生的金融震荡, 但不会在时机尚不成熟时放弃遏制通胀的努力。11 月 2 日, 美联储再次加息 75 个基点, 三大股指应声而下。美联储首次表示将考虑其货币政策的“积累效应”, 以及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性”。伴随不断加息, 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就业市场趋于疲弱, 出现了要求放慢加息的声音, 以防引发经济“深度衰退”。尽管美联储表示宁愿过度加息, 也不想重蹈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覆辙。然而, 美联储不会一直保持“鹰派”态势, 12 月之后大幅加息的空间趋窄, 美元指数和债券收益率或许短暂减弱及股市上扬。美联储后续加息幅度将取决于通胀抑制状况及经济变化态势。总体看, 美联储加息呈现温和(加息 25 个基点)—激进(加息 50 个基点或 75 个基点)—温和(加息 25 个基点)的路径。

^①向秀芳、张喜善:《专访野村美国高级经济学家 Robert Dent》,《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3 月 23 日。

三、美联储“加息与缩表”的潜在风险和溢出效应

美国此次通胀不是一般性的物价上涨，而是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的通胀螺旋，对美国经济将造成四大风险冲击。

（一）美国经济加速下行的风险冲击

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是在美国经济减速形势下进行的。2020 年受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冲击影响，美国经济收缩了 3.5%。2021 年美国经济在低基数效应基点上反弹。按年率计算，首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6.3%，二季度 GDP 增长率为 6.5%。上半年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呈现强劲态势。但进入下半年，美国经济开始明显放慢。美国商务部在 10 月下旬公布的数据，三季度 GDP 仅增长 2.1%，低于市场预期。当时，美联储将 2021 年美国 GDP 增长预期从 6.9% 下调至 5.9%，IMF 则将该预期从 7.0% 下调至 6.0%。OECD 于 12 月初发布的报告更是将该预期下调至 5.6%。事实表明，2021 年美国经济表现并不像美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所预测的那么“强劲”“健康”，GDP 增长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如果 2021 年 GDP 增长率扣除上年的 -3.5%，实际仅增长 2.1%。但与 2020 年相比，美国经济毕竟已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从而导致就业增加、工资增长、消费增强、通胀上扬。这就是美联储所表述的经济“过热”的现实状况。进入 2022 年，美国经济持续下行，下滑势头更加强劲。美国国内和国外机构纷纷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各方对 2022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大体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美国经济将“硬着陆”。所谓硬着陆，即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警告称美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伴随美国潜在增长率降为 2% 左右，叠加美联储持续加息以及长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担忧情绪愈益升温。预期衰退的概率越来越高，对冲基金甚至押注美国经济衰退。美联储持续超大幅度的加息，意味着美联储为抑制通胀，有可能将美国经济推向“硬着陆”的方向。事实上，首次加息 75 个基点后，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双下降”。标准普尔全球综合 PMI 指数，从 2022 年 7 月终值 47.7 降至 8 月的 45，创下 2020 年 5 月以来的最低，表明美国经济活动出现萎缩。在高利率和高房价的双重冲击下，美国楼市成交量正持续下降。据美国房利美 11 月 7 日公布的 10 月住房调查结果，住房综合情绪指数已经连续第 8 个月下降，跌至 56.7，创下 2011 年以来该“追踪数据”的新低。市场担心经济滑入衰退，出现抛售大宗商品现象。

第二种，美国经济“软着陆”。所谓软着陆，即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美联储曾表示紧缩不会只是试图压制通胀，而不考虑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其他影响，在持续加息及增加融资成本后，美联储将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寻找平衡点。然而，要真正做到“抑通胀与稳增长”的平衡，谈何容易，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较低。美联储持续性加息提高了借贷利率，抑制了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紧急降温和经济增长下滑是治理通胀高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美联储的目标是促使经济“软着陆”。曾在奥巴马任期内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贾森·弗曼表示，“我认为美联储应争取实现软着陆。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成功”。^①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努里尔·鲁比尼直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通胀率高于 5% 和失业率低于 5% 的情况下，美联储还从未成功实现过经济软着陆”。^② 就

^①朱莉娅·霍罗威：《全球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考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22 年 5 月 23 日。

^②同①。

连鲍威尔亦表示，未来实现经济“软着陆”的挑战相当大，越来越困难。现实状况或许是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远小于“硬着陆”。

第三种，美国经济减速、失速，经济衰退概率飙升。在各种预测中，有人对美国经济在短期内的表现较为乐观，而有人则看好美国经济在未来两年的表现。实际上不管短期抑或今后两年，美国经济均不显乐观。《今日美国报》网站 2022 年 4 月 6 日报道，德意志银行认为“美国经济衰退正在酝酿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 2023 年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2022 年 4 月 7 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称，过去每当出现如今这样通胀率超过 4%，且失业率低于 5% 的情况，美国经济就会在两年内陷入衰退。民间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衰退焦虑”。鲁比尼甚至警告美国经济衰退将“长期而严重”。

现实状况是：美联储 2022 年 3 月 16 日首次加息后，就立即宣布 2022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为 2.8%，比先前预期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IMF 于 4 月发表的春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却预测 2022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为 3.7%，远高于美联储的预期。有学者凭此称，美国 GDP 增长率在 2.8% 和 3.7% 之间，怎能说美国经济衰退？然而，就在 IMF 春季报告发表前后，摩根士丹利将 2022 年美国 GDP 增长率预期下调 100 个基点至 2.6%；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Jan Hatzius 预测，2022 年和 2023 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2.4% 和 1.6%，低于此前预期的 2.6% 与 2.2%；6 月 7 日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1.2 个百分点至 2.5%。更为重要的变化是，6 月 15 日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后，再次将 2022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从 2.8% 下调至 1.7%。白宫在 8 月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2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仅为 1.4%。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 9 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表示，当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时，美国经济存在衰退风险。高盛在同月发布的报告依然坚持 2022 年美国 GDP 为零增长。IMF 在 10 月公布的报告预测 2022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为 1.6%，低于 7 月预测值的 1.7%，并把 2023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下调至 1%，与其春季报告所做预测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拜登政府、国际机构、国际投行、经济学家、企业家等对 2022 年和 2023 年美国经济表现有不同的判断和预期，但共同点是美国经济持续减速，衰退风险或衰退概率增加。越来越多的受访者预测，判定美国经济何时衰退和结束的权威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将会在 2023 年宣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NBER 对衰退的定义为，“多数经济领域内的经济活动连续几个月出现下滑”。一般而言，NBER 的表态通常是在出现真正陷入衰退时，甚至在衰退之后。

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是在美国“失业率失真”形势下进行的。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失业率在降低，2022 年 4 月至 6 月连续保持在 3.6%，业已达到充分就业的衡量标准。美国劳工部 6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共有 1150 万个空缺职位，但相对应的可用劳动力仅为 590 万人。7 月美国失业率降至 3.5%，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加剧企业裁员和破产。在经济大幅减速背景下，失业率持续下降，表明失业率数据已经失去真实性。事实上，职位空缺和失业率下降是由疫情及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所致，离开劳动力市场人数不断增多，而不是因“增长强劲”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新冠疫情、大幅加息和经济下滑，导致很多人没能返回劳动力市场，驱使企业职工薪金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提升和利润下降，形成企业“裁员潮”，出现了就业市场“降温”现象。8 月的失业率已回升至 3.7%。9 月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数据显示，非农业部门新增 26.3 万个就业岗位，低于 8 月的 31.5 万个，创下 2021 年 4 月以来最小增幅，劳动参与率从 63.4% 降至 62.2%。美联储预测 2022 年底失业率将升至 3.9%，2023 年达到 4.1% 或更高。美联储对趋紧的劳动力市场、强劲增长的职工工资和大幅提升的物价指数感到相当担忧。如果美国经济因紧缩而加快减速或衰退，那么旺盛的就业市场就会发生逆转，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

美联储的紧缩措施是在美国通胀不断创新高的形势下进行的。美国的通胀创造了数十年来的高位。通胀高企既有货币超发及国内成本推动因素，又有外部输入型因素；既有供给端原因，又有需求端原因。美国国内通胀因素会因疫情防控治理、流动性紧缩、供应链修复而得到逐渐缓解。但拜登政府继续奉行单边主义、市场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力推俄欧“能源脱钩”，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不让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并承诺向欧盟输出石油和天然气，导致美国国内能源供给紧张，助推物价指数窜升，使其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美国个人和家庭因通胀支出增多，其储蓄率迅速下降。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资料，在新冠疫情前直到 2021 年 6 月，美国储蓄率一直保持在 10% 的水平。然而，2022 年 4 月美国民众的个人储蓄率已降至 4.4%，这是自 200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① 美国储蓄率快速下降，意味着通货膨胀极大地消耗了个人和家庭储备资金，弱化了当下和未来消费信心，进而制约经济增长。

上述背景因素导致 2022 年美国面临“滞与胀”的考验。不争的事实是，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为负值，步入“技术性衰退”，通胀持续保持高位，业已陷入滞胀困境。多数经济学家将滞胀列为经济面临的重大长期风险。在中期选举前，拜登总统指责“欧佩克+”减产计划，并警告如果美国石油企业不把高额利润“反哺”到增产降价中，他将向其征收“暴利税”，同时继续以高价向欧洲出口天然气和石油，推动油气“量价齐涨”，刺激第三季度美国 GDP 增长 2.9%，远高于亚特兰大联储预期的 0.3%。这种出口驱动的正增长改变不了美国经济衰退的趋势。经济学家们表示“暴利税”不符合经济规律，将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当下，经济即将衰退已成为市场共识，市场认为拜登政府缺乏对衰退的认知和准备。

然而，客观判断，2022 年美国平均通胀率难以上升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时期的双位数，“沃克尔时刻”不会很快到来。但外部因素引发的高通胀，不是美联储所能控制的，因而高通胀将持续一段时间。实际上，市场一直对货币紧缩能否在不制造衰退的前提下实现遏制通胀的目标深感疑虑。美联储长期实施的 QE 及乌克兰危机激化导致的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加剧了全球通胀疯狂上扬，以及经济持续减速、失速，不排除美欧国家由滞胀转向衰退的风险。美联储即使是拿出最好的表现，也不大可能找到一条既能将通胀水平控制在 2%~3%，又能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道路。美国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 1980 年到 2020 年，当富裕经济体的通胀率超过 5% 时，平均要花费 10 年时间才能回落到 2%。^② “地球村”面临着由通胀引起的生活成本危机。全球通胀预计将从 2021 的 4.7% 上升到 2022 年的 8.8%，2023 年和 2024 年将分别降至 6.5% 和 4.1%。鉴于此，高利率、低增长、高失业将延续一段时间。

（二）美国债务偿付负担愈益加重的风险冲击

在“无限量购债”及其流动性泛滥的作用下，主要国家央行购买了大约 25 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包含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购买的约 9 万亿美元的债券。^③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债务总额相当于 GDP 的 100%，而今天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 250%，^④ 业已成为隐藏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座“武器库”。美国财政赤字规模连续两年维持历史新高，政府债务总额在 2021 年底已突破 30 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宣布截至 2022 年 10 月 3 日，美国国债总额有史以来首次正式超过 31 万亿美元。预

①资料来源：《警惕美国经济风险对我国的影响，稳中求进推动经济转型》，《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6 月 10 日。

②资料来源：《金融市场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2022 年 9 月 26 日。

③穆罕默德·阿里·纳西尔：《2022 年的世界经济：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对话”网站，2022 年 1 月 4 日。

④默文·金恩：《切实存在严重金融危机的风险》，法国《回声报》网站，2022 年 10 月 23 日。

计到 2022 年底，债务总额占其 GDP 比重将达到 140%。实际上，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储备资金推动经济增长。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无疑增加了政府偿债负担，增添了企业再融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略有不慎就会成为一根导火索，点燃债务或金融危机。2023 年下半年，拜登政府将会再次迎来债务上限的挑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解决，美国债务水平将很快螺旋上升到新高点，最终可能毁掉美国经济。^① 美国和世界确实存在金融危机风险。

从历史数据看，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大约要连续加息 10 次，使其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4.5% 左右。此次加息与其前次加息不同，不会半途停止，从加息转向降息。最大可能是美联储连续加息，最终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降和经济陷入衰退，届时美联储将通过降息刺激经济，使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周期。不难发现，2022 年 3 月至 11 月 6 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已从 0 ~ 0.25% 升至 3.75% ~ 4%。从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上半年，美联储还将继续加息，致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4.5% 或以上。高盛多位经济学家预测，在本轮紧缩周期中，联邦基金利率峰值将在 4% 至 5% 之间，并维持到 2023 年之后。^② 现有的基准利率及预期利率均属于正常峰值。鲍威尔多次表示“债务违约不是美联储的选项”。因此，短期内美国金融市场虽受到严重冲击，但难言年内将酿成债务危机。然而，美联储加息导致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体需要支付更高成本偿还欠下的沉重债务。发展中国家存量债务大幅增加，并仍以美元债务为主，有近 40 个国家面临债务危机风险或正在经历债务危机。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31 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家庭和民间在内的债务余额高达 98.8 万亿美元，是 GDP 总额的 2.5 倍。^③ 美元债务敞口比较大的发展经济体，受美联储加息外溢影响更加严重，在债务管理和外汇获取能力方面面临更为严峻的风险，频频出现债务违约事件，极易触发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进而产生全球连锁性反应，殃及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

（三）美债市场流动性恶化隐现的风险冲击

伴随美联储收紧银根、回收市场流动性，以及加息周期影响，美国债券价格下降，美债收益率上涨。截至 2022 年 9 月 6 日，美国、英国和欧元区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年初分别上涨 170、195 和 175 个基点，对各国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引发美债抛售压力持续增加。美联储已经不是最大的美债买家，大型商业银行开始缩减以美债为代表的证券投资组合。11 月 17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日本继续减持美国国债，9 月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较 8 月环比减少 796 亿美元，降幅达到 8 月的 2.3 倍，减至 1.1202 万亿美元，创下 2019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通过抛售美国国债筹措美元资金，为 9 月干预汇率市场做准备。全球央行在 10 月抛售了 81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 2020 年 3 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抛售规模。^④ 在可见的未来，全球央行持续减持美元资产依然是大概率事件。究其根源：一是美国通胀高企，令美联储加快美元升值步伐，减持美国国债可以规避美债持仓估值下降风险；二是全球通胀高企，令美债的实际收益率（名义收益率 - 通胀率）趋降，降低了美债配置的吸引力；三是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令市场愈益担心美债市场流动性恶化。美债流动性变差，导致华尔街集体押注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和收益率飙升，推动全球资产重新定价，美债收益率上升。截至 10 月 19 日，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徘徊在 4.07% 附近，年内累积涨幅约 256 个基点，使美股面临更大的被抛售压力，加剧美国股市动荡或暴跌，驱使股市下挫回调。受其影响，全球债券和股

①资料来源：《美媒：美国国债高达 31 万亿美元，“最终可能毁掉美国经济”》，新浪新闻，2022 年 10 月 5 日。

②资料来源：《专家预测，美联储将加息至 4% 以上》，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22 年 9 月 17 日。

③广濂洋平：《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增至 GDP 的 2.5 倍》，《日本经济新闻》，2022 年 10 月 13 日。

④吴斌：《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4% 关口，全球市场波动或加剧》，《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10 月 13 日。

票市值急速缩水。从 2022 年 4 月到 9 月，全球债市和股市缩水 44 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① 在美国通胀尚未达到顶点前，利率势必飙升，将使流入股市的资金减少，拖累美国 and 全球股市涨跌互见，但跌多涨少，股市难有真正的回升起色。然而，海外私人资本与官方资本对美债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景象。TIC 提供的数据表明，2022 年 3 月以来，全球私人投资者持续购买美债避险或套取美元升值收益，而海外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官方机构则不得不抛售美国国债，以筹措美元资金，干预外汇市场与稳定本国货币汇率。在美国加息和美元走高的环境下，这种海外官方资本“减持美债”，私人资本“增持美债”的格局还将继续。未来美债市场可能出现两种趋势：通胀持续高烧不退，美债将继续被抛售，美债收益率随之狂升；经济衰退风险加剧，驱使投资者涌入债券市场避险，推高债券价格上行，美债收益率向低位回归。债市的两种走势必将导致股市加剧波动，并挫伤美国 and 全球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信心。伴随美国国债收益和美元飙升，市场将更显持续动荡，各国更加担心出现重大“金融意外”事件，最终爆发一场国际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四）美元国际信用和地位愈益趋降的风险冲击

美联储加息驱使美元指数升高。IMF 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发布的报告宣称，自 2022 年初，美元对日元已升值 22%，对欧元升值 13%，对新兴市场货币升值 6%。美元走高具有正反双重作用，正面效应是促使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及资金回流美国本土，有利于美国抑制通胀，并为实施拜登总统“新政”筹集资金。然而，美元走强驱使美国海外企业的营收价格大幅缩水，同时推动产品成本升高，降低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美元作为全球避险货币，加速推动美元指数上升，使日元、欧元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纷纷贬值，对美元汇率均跌至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促进出口的效益被进口的高成本所抵消，加重通货膨胀，陷入多重经济困境。IMF 第一副总裁姬塔·戈皮纳特在 10 月 14 日发表的报告中估计，“美元升值 10%，会使外国经济体的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上涨约 1%，更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所受影响更大”。^② 现实表明，美元指数回升带来的负面风险远超过其正面溢出效应。但美元指数也不会总是走高，有高就有低，一旦美元指数稳定下调，全球股市、债市和汇市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及麻烦。正如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所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这种局面必须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毅力予以破除。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利用美元作为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颜色革命”，予以“金融洗劫和制裁”，以维持其霸权地位，致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美国随时可以冻结和没收自己的美元资产，因而不得不去寻找替代美元的资产，从而加快“去美元化”进程，削弱美元国际信用和地位，驱使美元吸引力下降，进而推动全球外汇储备多元化、分散化配置的步伐。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降至 58.81%，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低。然而，当前全球 85% 的贸易交易仍用美元结算，“去美元结算”难以一蹴而就，依然任重而道远，但“去美元化”是由美国一手铸成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俗话说，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制裁就有反制裁。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全面金融战争，而俄罗斯则打了一场有成效的“卢布保卫战”作为反击。新兴市场国家应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采取必要的措施，保卫自身的金融安全。

^①古贺雄大、井口耕佑：《4 月到 9 月全球债市股市缩水 44 万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2022 年 10 月 2 日。

^②资料来源：《通胀为何不肯走开》，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2022 年 10 月 13 日。

四、结束语

在美联储“三重紧缩”下，美国经济大幅收缩，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滑。在IMF和WB年会期间，IMF于2022年10月11日发布了新版《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与会代表和媒体聚焦发达经济体的紧缩政策及其外溢效应，IMF和WB如何处理全球债务，世界经济前景等三大问题。自2022年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连续示警，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风险加剧。10月3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如果美联储坚持快速加息，就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损害。UNCTAD预计，如果美联储基准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在随后的3年使其他富国的经济产出下降0.5%，使穷国经济产出下降0.8%。UNCTAD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值从3月时预测的2.6%下调至2.5%，接近于衰退边缘；而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值，则同OECD一致，均为2.2%，标志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①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23年国际货物贸易总额可能仅增长1%，远远低于此前预测的3.4%。WTO总干事长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认为，世界正逐渐进入全球性衰退的困局。值得关注的是，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当前通胀率达到数十年来的高位，许多地区经济前景持续恶化，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存在。为防止通胀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正在应对顽固高通胀的各国央行不得不加快货币政策收紧的步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行都面临着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存在的更大风险和脆弱性。随着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前景恶化、经济衰退担忧增加、硬通货借贷成本上涨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压力加剧，金融资产价格已经下跌。IMF自2022年初以来已多次下调对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但预测值仍然高于美联储和其他国际机构，在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2年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2%和2.7%，依然有些偏高。但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活动普遍放缓且比预期更为严重，最糟糕的局面还未到来。

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不仅影响美国自身经济运行及金融市场操作，更会让新兴市场国家受到不可忽视的十大溢出效益影响，包括资金外流、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加息压力增大、债务负担加重、违约事件频发、对外贸易收缩、资产价格下跌、经济景气低迷、社会秩序动荡或动乱。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发出警告，世界要为迎接经济“风暴”做好准备。^②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亦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全面收缩的影响和冲击，绝不可掉以轻心，应密切关注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未雨绸缪，继续做好缓冲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防止通胀及食品价格上涨，严防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 谷源洋：《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还能走多久》，《全球化》，2021年第3期。
- 朱莉娅·霍罗威：《全球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考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22年5月23日。
- 默文·金恩：《切实存在严重金融危机的风险》，法国《回声报》网站，2022年10月23日。

责任编辑：李 蕊

^①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下，即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
^②杰米·戴蒙：《世界要为迎接经济“风暴”做好准备》，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2022年11月11日。

数字时代的大国经济博弈： 模式变迁与发展战略^{*}

许正中 行伟波 梁云燕

摘要：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国家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数字时代，各国争相抢占宝贵的数据资源，不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占据优势。本文总结了二战后大国经济博弈的模式及变迁，分析了作为守成国的美国与其他崛起国之间的经济博弈。数字经济从多个维度重塑了大国经济博弈模式，主要特征表现为网络平台成为商业价值聚合器，数字地缘竞争成为国家新的权力来源，传统经济博弈面临数字经济叠加影响等。基于自身禀赋，各国采取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差异化战略，美国以加强数字技术发展来推动美式数字规则，欧盟在面临多重约束中推行数字化转型，英国通过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制度创新来维持其全球数字领导者角色，日本注重掌握数字经济价值链关键环节，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同盟。本文认为，中国要审时度势，在大国经济博弈中积极应对，参与资源、市场和规则竞争，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创新数字经济规则和制度，加快布局域外数字治理体系，以及提高联合国议题设置权。

关键词：数字经济 大国经济博弈 模式变迁

作者简介：许正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行伟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①

梁云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言

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国家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② 大国博弈是大型国家之间以维护国家竞争力为基础、以追求发展为动力、以谋取更高地位为目标展开的深度互动和竞争过程，贯穿于数百年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在国家竞争优势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促进汽车市场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与政策评估研究”（722730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内区域分工与市场一体化研究”（71733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行伟波为通讯作者。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2年1月12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的四个阶段中，中国实际上已经越过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和投资导向阶段，目前处于创新导向阶段，跨越此阶段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如果国家间的竞争是提升基于相对利益的国家效用函数，那么根据长期战略决策模型，国家可以通过关键时期的战略转型来实现国家效用优化（夏广涛、张宇燕，2021）。在当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上，大国可以设计数字外交传播策略来影响各国公众的政治行为和国际舆论，实现博弈目标（张晓慧、肖斌，2021）。科技竞争是综合国力较量的主要领域，也是大国博弈必不可少的武器。在科技博弈上，美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体系的创新链中拥有绝对性占优地位，中国在创新链的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环节拥有独特竞争优势（张杰，2019）。

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现象（肖河、潘蓉，2021），争取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核心（陈鹏，2014）。国家竞争优势通过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三者融合来实现，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其中发挥着中枢纽带作用（张涛，2019）。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三次科技革命都体现了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会引发爆炸式创新发展的趋势，同时社会变迁使大国的阵容不断发生变化，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国家能够在经济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重塑全球价值链的窗口期，数字经济成为引导各国传统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重要引擎。历史性的机遇再次摆在各国面前，大国无疑会争相抢占宝贵的数据资源，不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使自身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目前大国对于数据的排他性独占方式已经导致了“数据战”和“数据失序”，使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全球数字治理机制遭遇挑战（杨楠，2021）。总之，以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产业化的速度，新一代技术装备传统产业的密度，以及国家数字治理创新的程度将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世界地位。

一、大国经济博弈的模式变迁

世界格局在不断地分化和重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大国经济博弈的模式变迁不仅要考量当前阶段的发展情况，也要集中于历史研究，从中总结大国经济博弈的现实样态、模式和特征。二战后，各国经济飞速发展，实力不断发生变化，全球经济格局随之改变。

（一）大国经济博弈史：二战后的历史

1. 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二战后—20 世纪 60 年代末）。1944 年 7 月，凭借战后美国拥有全球 3/4 的黄金储备实力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盟主的地位，西方国家的主要代表在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旨在建立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制度。同年 10 月，为了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23 个国家签署关贸总协定。在此期间，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经济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成为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的重要支柱。政治上，美国总统罗斯福重新启动了建立以美国理念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核心内容是以国际制度替代实力均衡、以国际组织替代列强结盟、以自由主义替代权力政治（秦亚青，2021）。军事上，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扶植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1947 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援助；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扶植日本。美国对欧盟和日本的扶植计划，一方面可以壮大盟国力量，对抗苏联，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欧盟和日本的控制，制衡各力量，维护世界霸主地位。

2. 合作与竞争并存,世界向多极化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末)。随着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和跨国交往的逐渐深入,经济交往中断的脆弱性越来越强,各国单打独斗、自给自足的发展方式逐渐被相互依赖、互相依存的关系所取代。参与国际合作不仅是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也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有效手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在资本主义阵营,一是由于美国持续对外扩张,通货膨胀加剧,美元不断贬值,危机持续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二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决定对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国际石油价格急剧增长,石油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三是日本、西欧的力量开始壮大,日本积极改善与中国、越南、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西欧成立欧洲共同体等合作组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局面开始从美国一家独大转向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凭借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及发达的重工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与美国结束敌对关系。此外,亚洲和拉丁美洲开始出现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3. 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快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第一,欧洲联盟。1952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随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成员国之间劳动力、商品、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通,1958 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成立,2002 年实现欧元正式流通。目前,欧盟是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截至 2021 年共有 27 个成员国。第二,北美自由贸易区。随着 80 年代后期欧盟和日本力量的壮大,世界局势越来越不利于美国发展,美国开始部署以自身为中心,能够与其他大国和经济集团相抗衡的力量。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美加墨三国约定贸易最惠国待遇,旨在实现贸易自由流通。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有助于优化垂直分工,墨西哥方能够引入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加拿大两国则可以借助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优化本国产业结构。2020 年《美墨加协定》生效,重构该地区贸易协定。第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多样化为前提,采取多结构、多形式并行的方法,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繁荣、增进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目前共有 21 个成员,涵盖了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重要经济体,各成员国积极参与 RCEP 和 CPTPP 等贸易协定,未来亚洲将成为各方力量角斗的重要区域。除此之外,遍布世界的各种公民社会团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也将在全球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 大国经济博弈的模式与特征

1. 经济制裁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大国经济博弈最常用的工具。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军事力量日益壮大,军事武器破坏性空前提高,任何国家发动战争都将会给本国乃至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而一国的国家竞争力、军事实力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通过经济制裁等博弈手段可以有效打击他国经济实力,经济制裁取代军事对抗,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阵地。二战后的经济制裁趋向于国内外政策的博弈,主要目的是打击对手经济实力,提升本国国际地位。

2. 知识、技术、管理的竞争与油气、煤炭的能源竞争并行。石油一直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在工业化进程中,石油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需求量与日俱增。大国对于石油进口高度依赖,以《世界能源展望 2002》的数据为例,美国、加拿大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为 46%,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进口石油依赖度达 87%。鉴于石油资源地理分布不均且各国石油进口地较为集中的现实情况,石油资源的竞争在大国博弈中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油气、煤炭等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加速全球经济发展。在技术的加持下,能源的使用呈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上升到与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

3. 供应链和市场竞争是各国竞争的主战场。为了降低成本，发达国家将工厂向我国和东南亚等地转移。如何压缩生产成本、增强上下游产业链的联系、拉近产品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距离是生产厂商重点考量的问题。西方国家一直主张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各国纷纷抢占国际市场，在全球构建产业链。新冠疫情促使增强供应链弹性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强调的重点问题，供应链和市场竞争仍是大国关注的焦点。

（三）守成国与崛起国：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博弈

1. 美国与苏联。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形成两极格局。冷战时期，双方除了的军事博弈，也经常互相实施经济博弈。常用经济博弈手段包括出口管制、经济援助、军备竞赛、石油危机等。美国逐渐在经济制裁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出口管制方面，美国凭借强大的产业制造能力以及众多盟国的优势，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联合西欧国家，对苏联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制定了包括战略物资、尖端材料、能源技术、石油运输管道、电子通信等在内的详细出口禁止清单，并不断拉大与苏联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差距。经济援助方面，苏联侧重于帮助被援助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坚实的工业基础，但这种方式投资巨大且耗时较长；美国主要是通过金融、技术、设备等方式援助，为被援助国提供贷款服务，并顺势将国内过剩产能向其他国家转移，与援助国构建产业链的局面。军备竞赛方面，核武器、太空探索等军事领域都是两国博弈的重点。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在自身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必需的粮食等基础产品则要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在对盟国经济援助的过程中使自身产业链更加完备和科学，军备力量发展如虎添翼。

2. 美国与德国。二战后，美国意识到联邦德国不仅是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也是制衡欧洲各国发展的关键力量，表示将帮助其实现自主管理，复兴经济。对当时急于恢复主权的联邦德国来说，美国的扶植政策正中下怀。联邦德国凭借大量资金和物质援助以及强大的工业体系，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经济水平。在这期间，美德关系表现为主从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苏联。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受美苏关系松动、时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考虑承认民主德国、美国政府使用“西柏林”字样等事件的影响，美德之间开始出现信任危机，联邦德国逐渐改变对外政策（陈岩，2004）。1958 年，联邦德国成为欧共体成员国之一，在开始加强与其他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同时，降低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使自身对美国竞争力增强。1950 年至 1967 年，德国年均 GDP 增速高达近 8%，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美国虽然依旧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具有巨额贸易逆差，德国的贸易环境相对更为健康。1994 年，美国提出耗资 4000 亿美元在未来的 20 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着重发展信息产业。得益于此，美国高科技产业悄然兴起，重新恢复自身的绝对优势（曹祖平，1999）。

3. 美国与日本。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美苏两国争霸，美国为了壮大盟国力量，开始扶持日本，将中低端产业链向日本转移。日本经济自 60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1968 年赶超德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半导体行业一度与美国平分秋色。80 年代，日本的半导体行业超越美国，占据全球 80% 的市场份额，美国逐渐意识到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受到威胁，开始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日本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并且对美国的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政府以解决贸易逆差为由，1985 年威逼日本签署《广岛协议》。《广岛协议》的签署使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势头迅速走强，大量国际资本疯狂进入日本，投资房地产行业和股票市场，导致日本经济产生巨大泡沫。此时，美国华尔街动用海量资金，做空日本股市，导致日本股价暴跌。1986 年美日签署《半导体协议》，明确规定日本半导体的生产品种及出口价格，自签署后每年增加新条例，而且在此期间美国不

断扶持韩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直至日本半导体行业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

苏联和日本都因为本国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在与美国的经济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德国产业结构相对科学，但并没有及时意识到“信息革命”的到来，也使其错过经济腾飞的机遇。美国在与苏联、日本和德国的博弈中，始终坚持完善本国产业结构和工业体系，并且积极发展科技创新事业，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持下越来越强，并且成功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拉开差距。在数字时代，中国要审时度势，借助产业链完整的优势，深入思考大国博弈的深层逻辑，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二、数字经济重塑大国经济博弈模式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经济运行特征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博弈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时代下，在当前大国交替的关键期，经济博弈模式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网络平台成为新的商业价值聚合器

在工业时代，供应链是商业价值的中央聚合器。供应链将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串联在一起，每一部分都是供应链上重要一环。上下游企业配合是否默契、节奏是否一致，是整条供应链能否高效运转的关键；生产地是否具有丰富的原材料、劳动力是否相对廉价、上下游之间物流是否便捷，都是企业在压缩生产和销售成本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数字时代，网络平台是商业价值的新聚合器，规模是发掘企业外部网络的能力。网络使供应链的传递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由原来上下游相互串联的单线条连接方式转变成多节点的网络模式。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可以从更高维度俯视供应链网络，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整合生产资源，分析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制定精准的销售策略。网络平台还可以帮助地理位置偏远但物质资源丰富的地区打破空间障碍，节省大量中间环节，直接与市场建立密切联系。

（二）数字地缘竞争成为国家新的权力来源

数字时代推动了大国之间第一次经历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战略竞争，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大国博弈不再局限于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进行资源及国土的竞争。在数字技术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下，信息技术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对信息资源的控制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力量的关键（Lynch III，2020）。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发展，全球数字地缘版图逐渐清晰。一方面，参与主体多元化是典型特征。数字时代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除国家之外，还包括大型互联网企业和技术集团。企业和技术集团在科技领域的不断创新成为推动国家数字力量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数据作为数字地缘版图的主要构成要素，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源。数据之争不仅关乎国家数字版图的大小，还关乎个人隐私、企业命脉和国家安全。相比于传统地缘竞争中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主要手段，基于信息网络前沿数字技术的数字地缘之争，具有隐蔽性强、成本低、打击范围广、见效快的优势，成为国家新的权力来源。

（三）传统经济博弈面临数字经济叠加影响

传统的供应链竞争和军事竞争仍是各国关注的焦点，但大国博弈不得不考虑数字经济的叠加影响。传统的经济博弈工具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经济制裁、石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调整、反倾销税、出口管制、封禁科技企业等。随着美俄围绕乌克兰和中东局势展开激烈角力，以及美国单方面挑

起中美贸易摩擦并扩展至科技、地缘、军事、社会人文乃至意识形态等领域，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大国博弈再度展开。美国、欧盟等以挑起战争为由陆续公布对俄罗斯实行一系列经济制裁。但各国由于经济体系互相关联，特别是通过数字平台、数据账户进行大量经济往来的情况下，西方各国自身在产业链塑造、科技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也受到了严重削弱。当前，传统经济博弈工具的使用出现局部化、事件化等特点，是在关键节点阻碍和扰动世界格局变化的工具，但其大规模体系性使用的效果逐渐式微，面临数字经济的叠加影响。

（四）非经济要素仍是经济博弈的重要力量

在大国经济博弈中，美国在军事、外交、人权、文化等传统的非经济要素方面的动作不断。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放松对华施压，与特朗普政府的“硬遏制”策略不同，拜登政府采取“弹性遏制”或“巧遏制”战略，认为人权斗争的战略十分有效，在人权领域动作不断。人权斗争往往与文化差异息息相关，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标准，提倡“普世人权”，干涉他国内政问题，企图通过人权话语实现文化意识渗透，进而影响他国经济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新闻、图书、出版、音像制品、激光唱片等文化产品加速传播，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对他国人民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控制他国人民的行为方式，破坏他国文化，瓦解他国经济社会基础。

三、主要国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化战略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战略基础，关于政府主导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之争成为大国竞争常态。在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各国家加紧布局数字经济前沿领域，围绕数字经济规则、制度、政策等方面先后推出一系列差异化战略，以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

（一）美国加强数字技术发展，推动美式数字规则

美国始终坚持推进数字技术。美国政府 20 世纪 90 年代率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大力投资信息基础设施，近年则加快了对数字领域的布局，陆续发布《联邦数据战略 2020 年行动计划》《引领未来先进计算生态系统：战略计划》等战略，巩固其全球领先优势。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提出如何保护和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能源、量子信息科学、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军事和空间技术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注重数字技术在增强国家安全和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强烈支持资助新兴技术，呼吁国会拨款 1800 亿美元，提升关键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和升级研究基础设施。^①

美国积极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推动美式数字规则。2020 年，美国国家贸易评估确定的主要数字贸易壁垒包括数据本地化、云计算限制、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税和网络广告等多个相关方面，涉及中国、法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② 此外，美国在数字领域高举“数字自由主义”大旗，强调自由开放，但却以威胁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为借口，禁止与中国支付宝、扫描全能

^①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terim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s Re: Section 9412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 May 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OSTP_Interim_RTC_NDAA_Sec_9412_RD_IOTF.pdf.

^②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act Sheet on the 2020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Strong, Binding Rules to Advance Digital Trad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20/march/fact-sheet-2020-national-trade-estimate-strong-binding-rules-advance-digital-trade>.

王、QQ 钱包、茄子快传 (SHAREit)、VMate、微信支付和 WPS Office 等应用程序有关的交易。在数字服务税方面,美国认为征收数字服务税损害美国数字企业的利益,但这可以帮助其顺利进入他国市场并带来巨大收益。经多次磨合,已与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在全面实施经合组织第一支柱协议之前的过渡时期达成了数字服务税协定。^①

(二) 欧盟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但因多重约束导致数字经济扩张受阻

虽然欧盟发展数字经济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全球范围看,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表现并不亮眼。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欧盟将“一个适合数字时代的欧洲”列为优先发展事项之一,试图加强数字主权。2020 年发布《塑造欧洲数字未来》战略,旨在为企业创造新的机遇,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企业绿色转型。2021 年发布《2030 数字罗盘:数字十年的欧洲之路战略》,围绕数字专业高级人才、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数字化等四个基本点,推进建立以人为本的数字社会。同时,欧盟从芯片、人工智能、数字战略、数字技能、网络安全、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等各个环节共同推进数字治理,已制定《芯片法案》《欧洲数据战略》《欧洲新产业战略》,正在积极制定《数字市场条例提案》《数字服务单一市场条例的建议》等政策措施。

然而,欧盟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国家主权、基础设施和监管制约等多重约束。第一,欧盟由 27 个国家组成,凝聚力不强、执行力不足、数字化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较大、数字市场分散,“抱团取暖”阻力较大。第二,欧盟光纤网络、5G 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仍较滞后,阻碍欧洲数字化转型进程,这一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得尤为明显。第三,在数字化转型上,中小企业数字技术使用率较低,提供线上销售服务的企业较少,处于明显劣势。小型企业通过数字交易可以获得与大企业同台竞争的机会,运用低成本的方式快速扩大规模,但由于严格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小型企业获益能力受到限制。第四,欧盟过于严格的监管制约新兴数字产业的发展。

(三) 英国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制度创新,试图维持全球数字领导者角色

英国率先制定数字服务规则,征收数字服务税。对于为英国用户提供社交媒体服务、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的集团,其收入超过 2500 万英镑的部分,征收 2% 的数字服务税。^② 英国也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先驱,在政府数字化建设方面成果显著。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就开始尝试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2012 年以来,英国政府先后发布《数字政府战略》《政府数字包容战略》《政府转型战略 2017—2020》《政府数字服务战略 2021—2024》等一系列举措,开展“政府网站瘦身革命”“数字政府即平台”建设计划,培训数字政府管理建设专业人才,由“服务数字化”向“数字服务化”转变,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创新能力一直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数字经济时代,英国也早早跻身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最前沿。2021 年发布的《英国创新战略:创造引领未来》提出 2035 年成为全球创新中心的愿景。英国将人工智能与数据列为产业战略四大挑战之一,认为人工智能本身是一个新兴产

^①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Welcomes Agreement with Austria, France, Italy, Sp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n Digital Services Taxes, October 21, 2021,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october/ustr-welcomes-agreement-austria-france-italy-spain-and-united-kingdom-digital-services-taxes>.

^②GOV. UK. Introduction of the Digital Services Tax, March 11, 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roduction-of-the-digital-services-tax>.

业，也能改变其他行业的商业模式，运用大量的数据集来确定完成复杂工作的更好方法。^① 同时，英国的数字监管框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监管和法律体系成熟，致力于建立全球最灵活的监管体系。英国正在重新思考其国际定位，平衡经济稳定和维护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寻找如何影响全球数据共享和使用的方法，以期实现其全球数字领导者的目标。

（四）日本注重掌握数字经济价值链关键环节，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同盟

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半导体不仅是计算机、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核心单元，也是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算力的基本保障，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要依赖于算法的提升，更需要算力保障。日本对于半导体技术具有丰富的积累和经验，曾一度代表半导体产业的最高水准，引领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此外，日本还是国际海缆的重要节点。日本借助岛国优势，在本地和周围地区接入大量海底光缆，建立了立足亚太，连接欧美的海底光缆布局。全球 95% 以上的国际通信流量都通过海底光缆传输，已基本形成了以美国、英国、日本为起点和重要节点的跨大西洋、太平洋的国际海缆格局（沈本秋，2022）。

为了在国际数字领域中争夺主动权，一方面，日本积极在国际会议上发声，阐明主张。在数字治理上日本主要强调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和可信任的“三化一可”理念性原则，凸显“高标准、高质量”特征（陈友骏，2020）。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开展与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2019 年初，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对日本的充分性决定，^② 意味着欧盟认为日本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达到了与欧盟相当的水平，而“适当性决议”正式生效使日本与欧盟之间实现了个人数据的自由流动；同年，日本还与美国签署《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包括禁止对电子传输的数字产品征收关税、确保所有领域数据跨境流动等内容，有助于两国数字贸易市场蓬勃发展。^③ 同时，日本强化数字创新，提出“社会 5.0”，日本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引入所有的产业和社会活动中，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数字市场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数字经济规则等方面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国与此不同，数字经济发展较早且富有成果，凭借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和政策执行能力，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新时代中国更应顺势而为，与全世界分享数字经济红利。

（一）基于资源、市场和规则展开竞争

未来的全球数字治理绝不能在个别国家的推动下向逆全球化方向发展，放弃多边主义，向各国推销或强加单边数字条款规则，这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都将造成极大挑战。中国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在数字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善于发挥数据优势，在数字经济之争中建立话语权。第一，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数字空间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一方面，中国应积

^①GOV. UK. The Grand Challenges, January 26,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dustrial-strategy-the-grand-challenges/industrial-strategy-the-grand-challenges>.
^②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 Answers on the Japan Adequacy Decision, January 23, 2019,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l/MEMO_19_422.
^③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act Sheet on U. S. - 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9/october/fact-sheet-us-japan-digital-trade-agreement>.

极推进构建数字资源共享的多边协定，绝不能一味响应个别国家关于“数据自由流动”的呼吁，也不能完全封锁本国数据，形成数据孤岛。另一方面，加快完善本国与其他国家数据资源互通互认的标准，在平等合作、互商互谅的前提下分享本国的数据资源。第二，建立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全球数字经济市场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时代下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使整个世界联系更为密切，要积极推进公平普惠的公共数字空间建设，打通数据要素市场，使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第三，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数字治理规则体系是多数国家的共同期望。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数字治理规则体系建设，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关切他国利益，兼顾不同国家数字市场发展程度，为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

（二）加强政府履职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中国大量的政务数据资源由政府掌握，数据资源的挖掘与应用具有巨大潜力与价值。同时，数字时代下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亟需政府推进与监督，政府在保护数据本地化和是否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积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建立平台型政府。尽快推进政府服务端建设，建立统一的政府服务平台，制定完善的结构框架和业务流程，建立统一身份认证，打造便捷、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平台。第二，加强顶层设计，宏观把握政府数字化转型。成立负责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专业部门，整合省部级政府数据资源，打破组织壁垒，了解政府各部门协作流程，将分散的电子政务平台集中化，实现跨区域、跨部门合作。第三，提升政府数据管理和应用能力，加快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在保证数据隐私性、安全性良好的前提下，积极与企业、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群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建政府服务平台。第四，提高公务员的数字素养。政府的数字化改革推进与政务人员的数字素养能力密切相关，积极建立各部门数字管理团队，维护部门数字平台正常运转。

（三）进行数字经济规则和制度的创新

把握新时期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大国地位，增强自身话语权。当前，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国家积极探索制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和相关制度，试图通过优先构建单边或多边数字经济制度的方式，为其他国家提供数字经济规则和制度的范例或模板，主导制定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作为数字经济起步较早的国家，中国应积极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数字技术相关标准和治理规则，把握和引领全球数字规则主导权。第一，协调好国家经济发展与数据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灵活运用新兴数字技术的同时，加强对数据确权、跨境流动等关键环节的监管工作。第二，依托多边合作机制，坚持多平台合作共建，开展数字经济标准国际协调和数字经济治理合作，积极参与数字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加快构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和制度。第三，积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和法规体系，处理好垄断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为数字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四）加快布局域外数字治理体系

当前，美国与其盟友积极合作，构建了美墨加、美欧、美日等跨大西洋、太平洋的贸易治理格局，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关于未来数字秩序的竞赛。中国的理性应对措施是“深挖洞，广积粮”，不断扩展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中国政府应该在域外治理方面积极作为，彰显大国担当，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破时空限制，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第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推进国际海缆和陆缆建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第二，依托数字“一带一路”合作背景，利用陆缆建设优势，深化中俄、中俄

欧、中蒙俄欧等合作，建立欧亚信息大通道，以多边合作为导向，建立数字经济合作机制，打造健康、有序的数字经济生态圈。第三，积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增强区域集团、合作组织在全球的影响力，以吸引更多的相关国家加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及信息基础设施援助，不断提升中国对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话语权。第四，合作构建数字监管机制，为区域内数据跨境流动保驾护航，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积极开展反垄断工作。

（五）提高联合国议题设置权来分享数字发展红利

当前，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贫富差距加大，数字鸿沟问题严峻。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此伏彼起，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鉴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推动国际数字经济体系建设，在联合国机构提高话语权，展示中国立场。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在联合国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一，加强在联合国立法中的作用，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问题，关注数据主权和安全，代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数据安全、数据开放、数据利用等方面积极发声。第二，提高国家软实力，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处理，积累解决国际纠纷的经验，提升话语权。第三，发挥联合国协调大国关系的平台作用，努力跨越与西方国家原则性议题的分歧，开展深度合作，通过联合国分享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理念和经验，为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1. 夏广涛、张宇燕：《理解国家行为：一个基于相对利益的国家效用函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11 期。
2. 张晓慧、肖斌：《传播策略与大国数字外交——基于美俄关系下俄罗斯数字外交的案例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11 期。
3. 张杰：《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的博弈策略与共生逻辑》，《亚太经济》，2019 年第 4 期。
4. 肖河、潘蓉：《大国经济竞争策略的选择机制》，《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4 期。
5. 陈鹏：《论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争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1 期。
6. 张涛：《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7 期。
7. 杨楠：《大国“数据战”与全球数据治理的前景》，《社会科学》，2021 年第 7 期。
8.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 年第 2 期。
9. 陈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美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4 年第 1 期。
10. 曹祖平：《美德日不平衡发展透视》，《世界经济》，1997 年第 11 期。
11. 沈本秋：《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12. 陈友骏：《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日本学刊》，2020 年第 4 期。
13. Lynch III, F. 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 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20.

责任编辑：郭 霞

打通跨境电商的堵点与痛点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赵 瑾

摘要：近 20 年来，中国依靠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企业商务模式创新，迅速跻身世界电子商务大国行列，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要素流动限制、同质化竞争、贸易壁垒等仍影响跨境电商大发展。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为打通跨境电商堵点和痛点，稳住 2023 年外贸增长基本盘，中国应以开放和创新为引领，提升跨境电商的国家战略定位，以贸易数字化推动跨境电商创新发展，以要素市场开放打通制约跨境电商大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堵点，以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国内再生产良性循环，以制度集成创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丝路电商”建设为抓手推动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规则标准制定。

关键词：跨境电商 新发展格局 数字化转型 创新

作者简介：赵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2 年中国外贸虽取得了骄人业绩，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但新冠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大国竞争博弈等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存在。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涉及 1.8 亿人的就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 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的现状，以大变局下外贸逆势增长的新业态——跨境电商为抓手，打通跨境电商堵点和痛点，对稳住 2023 年外贸增长基本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变局下跨境电商逆势增长：中国与世界

从 2018 年中美贸易冲突，到 2019 年以来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大变局下世界经济增长停滞、国际贸易增速下降、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全球经贸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但从中国到世界，跨境电商一直逆势成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韧性。

从中国来看，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1 万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21.4%。其中，出口 21.73 万亿元，增长 21.2%；进口 17.37 万亿元，增长 21.5%。同期，我国跨境

电商进出口^①规模约 1.9 万亿元，^② 比 2020 年增长 18.6%，占进出口总额的 4.9%。跨境电商货物的 90% 以上为消费品。其中，出口主要是服饰鞋包、家居家纺及电子产品等，占比为 91.8%；进口主要是美妆及洗护用品、医药保健与母婴产品及食品生鲜等，占比为 96.6%。

近年来，跨境电商的加速发展，已成为数字经济下贸易发展的新业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近 10 倍，占外贸的比重由 2015 年的不到 1% 增长到 2021 年的 4.9%。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与世纪疫情中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19—2021 年，跨境电商的出口平均增速（22.2%）超过货物贸易（10.1%）、服务贸易（13.1%）的出口平均增速，上万亿美元的出口业绩格外亮眼。如图 1 所示，2019 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速（30.5%）高于商品出口增速（5%）、服务出口增速（8.9%），2020 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速（39.2%）远高于商品出口增速（4%）、服务出口增速（-0.1%）。2022 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同比增长 28.6%。

从世界来看，2021 年 5 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2019 年全球电子商务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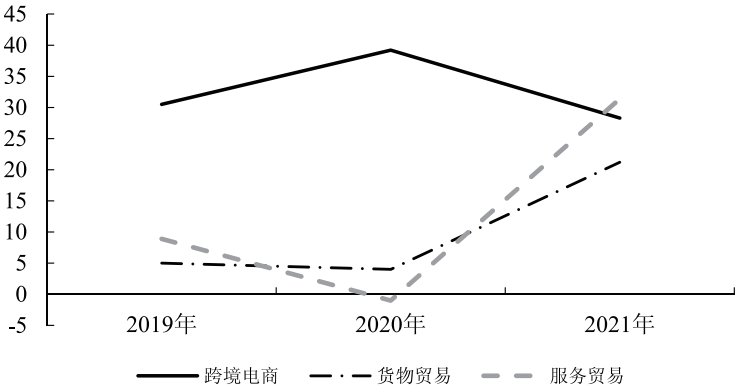


图 1 2019—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

表 1 2019 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全球前 10 国

	国家	电子商务总销售额 (十亿美元)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 GDP 的比重 (%)	B2B 电子商务销售额 (十亿美元)	B2B 电商销售额占电商销售总额的比重 (%)	B2C 电子商务销售额 (十亿美元)
1	美国	9580	45	8319	87	1261
2	日本	3416	67	3238	95	178
3	中国	2604	18	1065	41	1539
4	韩国	1302 *	79	1187 *	91	115
5	英国	885	31	633	72	251
6	法国	785	29	669	85	116
7	德国	524	14	413	79	111
8	意大利	431	22	396	92	35
9	澳大利亚	347	25	325	94	21
10	西班牙	344	25	280	81	64
合计		20218	36	16526	82	3691
世界		26673	30	21803		4870

数据来源：《2019 年全球电子商务评估和新冠疫情对 2020 年在线零售影响的初步评估》；表中数据为报告原始数据，作者未作修订。

注：* UNCTAD 的预估值。

①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本文中的跨境电商进出口为全业态口径，以在线成交的进出口货物为统计范围，包括并不限于海关监管方式“网购保税”（代码 1210、1239）、“跨境直购”（代码 9610）、“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直接出口”（代码 9710）及“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代码 9810）项下进出口货物。

②本文中的数据以年度统计调查资料等为基础编制，对已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予以修正。

估和新冠疫情对 2020 年在线零售影响的初步评估》显示，2019 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B2B 和 B2C）跃升至 26.7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GDP）的 30%，比 2018 年增长了 4%（见表 1）。其中，全球 B2B 电子商务销售额的预估值为 21.8 万亿美元，占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的 82%，包括通过在线市场平台的销售和电子数据交换（EDI）交易；B2C 电子商务的销售额预估值为 4.9 万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了 11%。按 B2C 电子商务销售排名，位居世界前三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美国 and 英国，但按照电子商务销售总额排名，位居世界前三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日本和中国，美国继续在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表 2 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前后部分国家在线购物情况

	网上零售额（十亿美元）			零售额（十亿美元）			网上零售的占比 （占零售额的百分比）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澳大利亚	13.5	14.4	22.9	239	229	242	5.6	6.3	9.4
加拿大	13.9	16.5	28.1	467	462	452	3.0	3.6	6.2
中国	1060.4	1233.6	1414.3	5755	5957	5681	18.4	20.7	24.9
韩国	76.8	84.3	104.4	423	406	403	18.2	20.8	25.9
新加坡	1.6	1.9	3.2	34	32	27	4.7	5.9	11.7
英国	84.0	89.0	130.6	565	564	560	14.9	15.8	23.3
美国	519.6	598.0	791.7	5269	5452	5638	9.9	11.0	14.0
合计	1770	2038	2495	12752	13102	13003	14	16	19

数据来源：《2019 年全球电子商务评估和新冠疫情对 2020 年在线零售影响的初步评估》；表中数据为报告原始数据，作者未作修订。

UNCTAD 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虽然许多国家放宽了限制，但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推动在线销售额显著增长。在有统计数据的 66 个国家/地区中，互联网用户中在线购物人数平均占比从 2019 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前的 53% 增加到了大流行后（2020/2021 年）的 60%。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阿联酋网上购物的互联网用户比例增长了 1 倍多，从 2019 年的 27% 增加到 2020 年的 63%；巴林增长了 3 倍，2020 年达到 45%。如表 2 所示，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引发电子商务销售额急剧增长，与 2018 年疫情前比，疫情后，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韩国、新加坡、英国、美国的网上销售占比均有提升。其中，英国提升幅度最大，占比从 2018 年的 14.9% 提升至 2020 年的 23.3%，提升了 8 个百分点；而韩国网上销售在销售总额中占比最高，2020 年达到 25.9%。

表 3 2019 年 B2C 跨境电商销售：十大商品出口经济体

排名	经济体	B2C 跨境电商销售额 （十亿美元）	B2C 跨境电商 销售额占商品 出口比例（%）	B2C 跨境电商销 售额占 B2C 电商 销售比例（%）
1	中国	105	4.2	6.8
2	美国	90	5.5	7.1
3	英国	38	8.2	15.2
4	中国香港	35	6.2	94.3
5	日本	23	3.3	13.2
6	德国	16	1.1	14.7
7	法国	12	2.2	10.6
8	韩国	5	0.9	4.4
9	意大利	5	0.9	13.9
10	荷兰	1	0.2	4.3
合计		332	3.4	9.0
世界		440	2.3	9.0

数据来源：《2019 年全球电子商务评估和新冠疫情对 2020 年在线零售影响的初步评估》；表中数据为报告原始数据，作者未作修订。

同期，2019 年，虽然世界商品贸易下降了 3%，但跨境电子商务占比显著提升。UNCTAD 估计，2019 年，网上购物人数达到 14.8 亿人。其中，约 3.6 亿在线购物者跨境购物，跨境购物的占比从 2017 年的 20% 上升到 2019 年的 25%，约占所有在线购物者的 25%。如表 3 所示，2019 年，跨境 B2C 电子商务规模约为 4400 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 9%。跨境销售额预计占 B2C 电子商务销售总额的 9%。

对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未来，UNCTAD 以“新冠病毒感染与电子商务”为题，对 9 个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巴西、中国、德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南非、瑞士和土耳其）的调查显示，新冠病毒感染加速世界向数字化转变，将永远改变人们网上购物行为。德勤《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报告》也显示，2019 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助推消费者网上购物，2020 年电商用户渗透率美国为 77%、英国为 84%、德国为 74%、法国为 71%，全球电商零售快速发展。2019—2020 年，欧美及亚太地区国家电商零售额增速超过 15% 以上，其中，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增速超过 40%。这表明，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未来跨境电商发展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制约中国跨境电商大发展的堵点与痛点

近 20 年来，中国依靠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企业商务模式创新，迅速跻身世界电子商务大国行列，但要素流动限制、同质化竞争、贸易壁垒等，制约了跨境电商的大发展。

（一）生产要素：数据、资金、人才等仍是困扰跨境电商发展的堵点

要素的自由便捷流动是企业从事生产和服务的前提及基础，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调研显示，影响中国跨境电商加快发展的要素流动关键堵点包括：一是数据不开放。因数据不开放，不仅地方统计数据与海关统计数据差异较大，且易引发以业绩为标准的政府补贴政策的错配。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成为大多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的政策诉求。二是融资渠道不畅。跨境电商集聚了大量的中小企业，轻资产、少抵押物的跨境电商企业很难符合目前银行对资信的认定标准，而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和业务所需流动资金较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困扰着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发展。三是高级和复合型人才短缺。跨境电商发展是一把手工程，领军人才奇缺是制约跨境电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兼具外语、法律、国际营销、供应链管理、跨境电商、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也成为影响跨境电商大发展的瓶颈。

（二）社会再生产：跨境电商生态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从 2015 年 3 月开始，经过 7 年多试点，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分 7 批次建立了 165 个综试区，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综试区的不断扩围，加快了外贸转型升级和国际市场开拓，形成了外贸新业态发展的新格局。但在快速发展、扩围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一是同质化竞争。不少地区为吸引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落地，短期给予免费仓储等资金支持，引发大型电商平台战略布局调整，致使跨境电商业务外流，综试区内部资源竞争加剧。综试区发展的内卷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产业集聚，也不利于综试区可持续发展。二是生态链分割。综试区试点以城市为中心，点状布局推进，如何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和生态链成为共性问题。东部某些地区跨境电商产业链虽然完整，但因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上游的平台型和生产型企业较少，大多是下游的服务型企业，影响当地跨境电商产业的长远发展。东北地区以传统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出口结构，与消费品占比超过 90% 的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结构缺乏适配性，大型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跨境电商实现数字化转型问题较突出。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广东省、浙江省依托外贸大省优势实行

创新发展，跨境电商实现数十倍增长；中西部地区受传统意识、产业结构、人才短缺、内陆所限，发展较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跨境电商竞争业态继续呈现头部效应，电商平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地区。出口货物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及江苏省，合计占比近 80%。进口货物的消费地集中在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北京市，合计占比 50%。

（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双循环：贸易壁垒成为跨境电商大发展的痛点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国在扩大进口产品种类、畅通进口渠道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试点，但以跨境电商方式开展国际贸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仍比较多，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的品质需求，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以及跨境电商出海。对综试区的调研显示，影响国际商品流动的主要堵点包括：一是对试点产品的地区限制。国家中医药产品试点只限定在北京市、河南省两地，国内消费中心城市广州市、跨境电商领先地位杭州市、高水平开放平台海南省等地都有扩大试点范围的需求。二是对试点产品的种类限制。2019 年 10 月，国家药监局虽同意北京开展跨境电商进口医药产品试点，但因试点产品范围限定为“在我国境内依法取得上市许可及财政部等部委《关于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清单的公告》所列的药品医疗器械产品”，中医药类产品在进口商品清单中种类较少（仅包括清凉油、橡皮膏、中药酒等 8 个品类）、市场需求小，不仅企业进口动力不足，难以形成试点带动效应，也无法满足消费需求。三是对试点模式的适用范围限制。“网购保税+线下自提”模式创新有利于消费者在线下体验后直接下单当场提货。因商务部等 6 部委《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 号）要求，“原则上不允许网购保税进口商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网购保税+线下自提’模式”，而大多数海关特殊监管区远离城市中心，人流少，抑制了国内消费。四是对购买额度的限制。2018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将 2016 年规定的跨境电商进口购物单次交易限值从 2000 元提高至 5000 元，年度交易限值由 2 万元提高到 2.6 万元后，至今没有调整（见表 4）。五是电商平台遭遇国际贸易壁垒。2021 年亚马逊以“不当使用评论功能”“向消费者索取虚假评论”“通过礼品卡操纵评论”等为由，对中国 5 万名卖家实行封号，行业损失预估超千亿元。随后，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贝宝（PayPal）、Shopify 等海外独立站平台对中国卖家进行整治，大量卖家关闭站点。2022 年 2 月 17 日，美国发布报告《2021 年度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审议报告》，又将微信、速卖通、淘宝、拼多多等多家企业列为“恶名市场”，国外对华电商平台的打压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最大痛点。

三、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政策建议

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打通跨境电商的堵点与痛点，确保大变局下 2023 年外贸稳增长，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中国应以开放和创新为引领，多点发力，多措并举。

第一，提升跨境电商的国家战略定位。目前，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等政策，均将跨境电商视为贸易发展新业态，即贸易交易的一种新模式。但实际上，随着 5G、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运用，数字技术对贸易的渗透率加强，跨境电商已逐渐脱离贸易交易方式变化的表象，成为未来数字贸易的重要内容。由美国主导的《美墨加协定》，已用数字贸易章节替代电子商务章节。2021 年 12 月，86 个世贸组织（WTO）成员宣布在电子商务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并计划在 2023 年加快谈判步伐。WTO 总干事也认为电子商务将是国

表 4 不同时期试点地区、购买额度变化

	政策文件	清单税目总数	品类限制	购买限额
2016 年 3 月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1240	部分食品饮料、服装鞋帽、家用电器以及部分化妆品、纸尿裤、儿童玩具、保温杯等 8 个税号商品	2 万元/人/年
2016 年 4 月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16）			2000 元/人/次
2018 年 11 月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1321	新增葡萄汽酒、麦芽酿造的啤酒、健身器材等 63 个税目商品	2.6 万元/人/年
2018 年 12 月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18）			5000 元/人/次
2019 年 12 月	关于调整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公告	1413	新增冷冻水产、酒类、电器等 92 个税目商品	2.6 万元/人/年
2019 年 12 月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19）			5000 元/人/次
2022 年 3 月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22）	1476	新增滑雪用具、家用洗碟机、高尔夫球用具、番茄汁等 29 个税目商品。删除刀剑 1 个商品税目。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际贸易发展的未来，谈判成果将促进数字贸易的大发展。为促使综试区工作领导小组转变思想观念，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推动地方政府精准出台相关促进政策，抢占未来数字贸易竞争的制高点，应提升跨境电商的国家战略定位，加快贸易数字化转型，提高中国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以贸易数字化推动跨境电商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是引发当代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国际商业模式重建、国际经贸格局重塑的决定因素，也是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实现跨境电商向数字贸易跃进的关键。为精准施策，落实《“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的综试区“创新专项行动”，建议中央和地方建立以数字技术推动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的专项基金，鼓励跨境电商综试区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推动中国贸易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贸易发展。

第三，以要素市场开放打通制约跨境电商大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堵点。打通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堵点，推动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快捷自由流动和集聚，要加快要素市场开放。一要加快构建跨境电商数据开放共享机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推动跨境电商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应加快完善跨境电商统计制度，构建数据开放的共享机制。二要拓展多元化跨境电商融资方式。适应外贸新业态发展，金融机构应加快创新贸易融资产品，扩大基于电商信用评分的金融服务模式应用，完善传统金融对跨境电商的风控测评体系，创新贸易融资抵押方式，加大对跨境电商发展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三要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在数字化时代，决定企业竞争力的要素已经由资本、技术转向人才。人才是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最大短板。为应对数字化转型对人才的需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商学院均设立了相应课程。致力于新业态的长期发展，建议启动跨境电商人才建设工程，建立国家级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基地，加强国际教育合作，探索中外联合办学模式，以云课堂等方式，加快国际高端人才培养。

第四，以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国内再生产良性循环。为确保国内再生产良性循环，统筹跨境电商发展与国家战略实施，加强区域协同创新，消除同质化内卷、生态链分割、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痛点，推动综试区差异化、特色化、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一是明确综试区发展定位，实行差异化发展。对接

自贸区发展国家战略定位。综试区应以面向不同市场的自贸区发展定位为基础，实行差异化发展。如青岛立足区位优势，应优先发展日韩、中东欧市场；广东应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机遇，优先发展东南亚市场。二是建立协同创新联盟，推动一体化发展。落实“十四五”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以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节点城市为中心，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协同创新联盟，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建立跨境电商产业链协同共赢的生态体系。三是建立帮扶机制，推动特色化发展。165 个综试区覆盖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和延安等部分革命老区，综试区各地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联合国将跨境电商视为提高妇女就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为实现共同富裕，建议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建立合作机制，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四是建立旨在打造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的 RCEP 国际合作平台。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跨境电商章节的相关规定，如推动贸易便利化、为电子商务创造有利环境、开展电子商务对话，以及 RCEP 重点提到的鼓励搭建跨境电商发展服务平台，推动配套物流服务体系，支持和建设更多的海外仓等，为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亚太地区贸易数字化领航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五，以制度集成创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试点产品、试点地区、试点范围的限制成为抑制国内消费需求，阻碍国际商品流动的堵点。调研显示，各综试区不同程度提出国家应减少对试点产品、试点地区、试点范围的限制，但因解除限制需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药监局、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合作，亟须加快政府主管部门制度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为加快释放国内消费潜能，满足消费者品质消费、医疗健康等消费需求，助力外贸稳增长，防止疫情后国外旅游解禁国内消费外流，建议在总结试点地区成功经验，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前提下，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扩大试点产品的地区范围。与国家战略对接，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建议将中医药产品试点地区由北京市、河南省扩大到上海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提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扩大试点产品种类。为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短板，特别是疫情期间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继续扩大正面清单进口范围，增加国内市场需求较大的其他中成药。三是扩大试点模式的适用范围。出台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探索开展“网购保税+线下自提”业务的新模式。四是提升进口商品购买额度。随着疫情后网上消费习惯的形成，网上购买高端消费品将成为跨境电商的新趋势，如 3C 产品、高档服装、奢侈品等。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由 2018 年的 9732 美元提升至 2022 年的 12741 美元，海南免税购物年度最高限额为 10 万元，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建议进一步提升进口商品购买额度。

第六，以“丝路电商”建设为抓手推动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规则、标准制定。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已经从本土发展进入海外发展的新阶段。目前跨境电商出海的主要障碍是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单边主义盛行。把握疫情后贸易数字化发展大势，应抓住“一带一路”国家重大倡议达成国际共识，各国为发展数字经济对华合作诉求增强的机遇，以“丝路电商”建设为抓手，突破国际对华贸易投资限制，推动跨境电商出海，并在“丝路电商”建设和国际合作中，推动企业参与跨境电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参考文献：

1. 谷歌、德勤：《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报告》，2021 年 3 月。
2. UNCTAD. Global E - Commerce Jumps to \$ 26.7 Trillion, Covid - 19 Boosts Online Retail Sales, 2021.
3. UNCTAD. COVID - 19 and E - commerce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Online Consumers in 9 countries, Jan 2020.
4. UNCTAD. COVID - 19 boost to E - commerce Sustained into 2021, new UNCTAD Figures Show, 25 April 2022.

责任编辑：李蕊

中美关系 50 年：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郭 达 迟 雪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走向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深刻演进的重大变量。2022 年是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 50 周年。回顾这 50 年的历程，可基于不同时期特征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从破冰到建交（1972—1978 年）；经贸人文交流全面开启（1978—1988 年）；摩擦中仍不断深化交流（1989—2000 年）；合作与竞争并存（2001—2017 年）；双边关系重大变化（2017—2022 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2*3”分析框架，从“理念—利益、认知—行动、议题—回应”视角解释中美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未来十年，既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走向再平衡的重要时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中美两国不仅面临着深化自身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更需要以“全球视野、长期视角、战略思维”重塑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世界格局 演变逻辑 结构性矛盾

作者简介：郭 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迟 雪，香港大学商学院学生。

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格局及中美两国各自发展进程的重要变量。1972 年 2 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由此迈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步，其中确认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框架和底线。^① 2022 年是《上海公报》发表 50 周年。50 年来，中美关系有风雨也有阳光，有合作也有竞争。总体来看，过去 50 年中美关系在较为稳定的状态中实现了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两国的经济增长以及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加大。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并由此带来的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和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感持续上升，中美关系面临着美国“自我臆想—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风险。因此，有必要在回顾中美关系 50 年历史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对中美关系进行分析。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分析框架，回顾中美关系 50 年历程，剖析其基本特点并分析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

^①关铭闻：《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回望“上海公报”发表 50 周年》，《光明日报》，2022 年 3 月 1 日。

一、50 年中美关系演变的进程

过去 50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粗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演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一）1972—1978 年：从破冰到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敌对状态，并曾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交过手。同时，中国在经济上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因此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发展与各国的经贸关系。但是，尽管当时经济总量并不大（1972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为 3%，美国为 33.6%^①），但在冷战格局下中国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美苏对抗等多重因素叠加，“联合抗苏”逐步成为两国的利益联结点和合作的战略基础，由此推动两国领导人开始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特别是开始从全球格局和自身安全等方面采取新的战略。例如，两国以“乒乓外交”作为试探基础，互相抛出橄榄枝。1972 年 2 月 21 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一历史性的行动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也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开启了新的一页。中美双方于 1972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从美国只承认国民党当局到承认一个中国的声明，这一破冰之举结束了中美长期的敌对关系，奠定了中美长期和平相处的重要基石。此后，又有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以及 1982 年 8 月 17 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二）1978—1988 年：开启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由此，中国开始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美两国也由此进入经贸、人文、科技、军事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时期。美国与中国的经贸规模迅速提升，双方经济互补性逐步提高。这也为后来中美关系每次面临波折，又都能够恢复正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当时主要的威胁是苏联，中国对于美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出于现实主义考虑，美国从战略层面将中国由所谓的“威胁”转变为友好国家。例如，1979 年 8 月，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访华时发表演讲宣称“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它的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②虽然中美间的矛盾问题仍然存在，且美国国内仍有较多人质疑中国对美战略安全的重要性，但在战略层面推进合作的大势下，中美之间仍然保持了总体稳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放松对华敏感科技封锁和出口限制，并逐步推进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进程。1988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尽管中美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但是美国继续相信，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③

在这 10 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年均增长 20%，^④中国通过国家公费渠道派出的留学人员累计约

①盛柳刚、赵洪岩：《中美经贸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0 页。

②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91 页。

③House W.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④周世俭：《中美贸易的现状及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1991 年第 2 期，第 54～56 页。

35000 人，通过其他各类渠道出国的留学人员有 40000 多人，其中主要是赴美留学；^① 美国的商业化开始进入中国。例如，其最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的牛仔裤，以及肯德基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店等。^② 尽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尚未进入到战略层面的范畴，但其快速发展为下一步深入合作做了铺垫。

（三）1989—2000 年：摩擦中仍不断深化合作交流

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结束，美苏对抗宣告终结，中美关系最大的粘合剂也不复存在，中美关系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1992 年中国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外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并推动自身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平衡者”的战略角色开始淡化。例如，1990 年 3 月老布什政府推出了其任期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并未在此报告中排名第一位的“美国的生存”部分出现，这也意味着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③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试探性的遏制战术。从美国 1993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见一斑，该报告提出“我们必须关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并在必要时通过支持、遏制或平衡这种崛起，以保护美国的利益”。^④ 克林顿上任后，改变了此前的对华态度，致力于将美式政治经济制度“扩展”到全球，在此框架下通过“接触”和“扩展”发展对华关系，并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合理作用。此后，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下，中美确立了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尽管出现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北约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斯拉夫大使馆等一系列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是使得中国融入由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内，并通过全面的接触，试图根据国家利益最大化需要影响中国发展方向。这 10 多年间，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到 2000 年，中国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比重分别为 3.58% 和 30.32%。^⑤ 中美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也明显提升。据中国原外经贸部统计，截至 1999 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 28628 个，实际投资 258 亿美元；2000 年，中国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 744.7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1%，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⑥

（四）2001—2017 年：合作与挑战并存

中美间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同时，也应对并处理了一系列挑战。从经济领域看，2001 年中国成功“入世”，中国逐步融入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中美经贸合作也被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规则标准促进了双边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企业也成为跨国集团外包工厂的最佳选择，并由此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17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837 亿美元，是 1979 年建交时的 233 倍，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 7 倍多。其中，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 19% 和 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 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 8%。^⑦

从战略层面看，美国对华战略考量经历了消极—积极—消极的变化历程。例如，在小布什上台初

①江波：《四十年出国留学与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2018 学术年会，教育国际化分会场报告。

②王缉思：《大国关系》，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53 页。

③达巍、蔡泓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 50 年》，《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④House 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3.

⑤盛柳刚、赵洪岩：《中美经贸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0 页。

⑥何伟文：《事实胜于雄辩——美国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光明日报》，2019 年 5 月 27 日。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新华社，2018 年 9 月 24 日。

期，提出“他们（此处指中国）需要被视为竞争对手……我们需要强硬和坚定，我们需要对我们在台湾的立场非常坚决”。中国对此的回应则是“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①“911”事件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对自己利益的估计，对外关系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改变了。^②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达成一致，设立了定期高层对话机制，商讨双方共同战略合作、经济合作、双边及全球安全合作等，^③由此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轨道。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客观上迫切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从合作反恐到应对经济危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彼此在众多方面合作的必要性。奥巴马也意识到中国作为当时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经济合作的最佳伙伴，对于想走出危机的美国与中国再次建立良好关系是必要的。例如，2010 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建立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在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扩散等优先事项方面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④

随着中美经济总量差距的日益缩小，中美关系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在悄然变化。2015 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在针对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积极介入亚太事务并弱化中国在此区域中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权重日益上升。此后，奥巴马政府更多利用国际规则压缩或约束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积极推动高标准、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利用所谓的“规则牌”“法律牌”在南海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仍然在相对稳定的轨道运行。同时，中国经济在此期间保持了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贸领域的融合度也日益提升。2017 年，中国 GDP 相当于美国的 63%；中国和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 15.16% 和 24.07%；^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达到 14.2%，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达到 16.6%。^⑥

（五）2017—2022 年：双边关系的重大变化

2017 年后，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特朗普上任，“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主导着美国的国家战略。美国“臆想”到中国的崛起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由此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借贸易逆差为由挑起对华贸易冲突，导致双边关系急转直下。与“尼克松转折”方向相反的“特朗普转折”，不仅对中美双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也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产生严峻挑战。

拜登上台后，并没有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在具体做法上和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拜登政府更加注重结盟（五眼联盟、印太经济框架等），但仍然继承了战略竞争的对华态度，经贸、科技关系政治化、安全化。在科技领域、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等都发动了对中国的“精准脱钩”，以此来围堵和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特别是乌克兰

①2001 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凤凰网，2007 年 3 月 15 日。

②时殷弘：《911 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及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爱思想网，2001 年 10 月 8 日。

③王缉思：《大国关系》，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53 页。

④House 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2010.

⑤盛柳刚、赵洪岩：《中美经贸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7 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新华社，2018 年 9 月 24 日。

危机后，国际关系再次回归地缘政治思维的趋势更加明显。^① 并且，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战略定位、战略竞争等已成两党共识。5 年来两国关系的风云突变，大大超出了各方预料；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 1972 年恢复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重大变化。

二、50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规律：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回顾 50 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始于“出乎意料”，又终于“出乎意料”。但出乎意料之外，仍有规律和逻辑可循。本文尝试建立“2 * 3”分析框架，从“理念—利益、认知—行动、议题—回应”角度来观察中美关系并总结其中的规律。

（一）“理念—利益”的双重考量

中美关系中，“理念—利益”的双重考量及权重变化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核心因素。中美关系在两国互动频繁的 50 年间，从冷到热再到冷，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国战略考量存在相似性，同时也互为镜像性。总的看，中美双方都谋求从合作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以及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一方面，中美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为美国提供了优质廉价的商品。同时，美国以其巨大的市场和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占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并将中低端环节外包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往来中都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各自也都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分析，“中国制造”产品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 1 至 1.5 个百分点，可帮助年平均收入 5.65 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节省 850 美元以上的支出；^② 中国依托自身比较优势，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并依托美国等国际市场，促进自身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理念的重要差异。美国对华战略中，有“传教士”“山巅之城”的理念考量。例如，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字眼纷纷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国的描述当中。2017 年以来，为了实现对中国的遏制，不惜将矛盾引向中国的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

总体来看，当美国内部发展顺利时，理念考量会占据主导位置，美国更愿意作为“世界警察”维护全球秩序，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来形成对华战略；当美国内部发展遇阻时，利益考量会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在战略上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对中国来说，“理念—利益”的平衡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理念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国家行为中是始终如一的；^③ 在利益上，“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三步走”都是基于国情现实的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发展战略。此外，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时，更加强调“中国的市场是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中美在“理念—利益”上的平衡度的差异，可以解释美国的战略转折以及对中美关系带来的重要变数。

（二）“认知—行动”的相互强化

中美关系中，“认知—行动”的相互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双方关系的局部细微变化并有可能带来“蝴蝶效应”。从美国视角看，对中国的认知以及结构分析不仅是自身的重要战略部署因素，

①毕洪业：《“战略三角”还是“三边互动”：新时代的中美俄关系》，《国际观察》，2022 年第 3 期，第 127 ~ 156 页。

②徐辰：《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得与失》，《清华金融评论》，2020 年第 7 期，第 101 ~ 104 页。

③[美] 卡拉贝尔：《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王吉美、吴雪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240 页。

也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变量。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由于中国还处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时期，美国对中国的主要认知便是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911”事件后，美国对中国的主要认知成为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者”。例如，2001 年 10 月小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时提出，“国际恐怖主义是我们面临的共同威胁，美中应共同携手合作，来打击共同的威胁”，并同意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① 2017 年，美国政府正式文件中，关于中国的描述由此前的“合作者”转变为“战略竞争者”，并在此认知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华竞争举措。这也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中国视角看，美国被认为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伙伴。正因如此，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大局，并将美国作为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者。2017 年以来，美国背离了自身长期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维护自身霸权利益为目标利用贸易工具肆意打压中国企业，并在中国核心关切方面不断试探。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对美国的认知也相应开始发生某些变化。

由此可见，当美国认为中国在各方面不具有与其抗衡的实力，是“可发展、可改变”的对象时，美国对华战略总体上呈现合作导向；但是随着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自我臆想—自我实现”恶性循环的形成，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导致一系列脱钩、竞争甚至对抗的行动。其中，特别是在事关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美国在战略模糊的同时故意采取“切香肠”的战术，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对中国来说，对美国认知总体较为稳定，但近年来应对美国“认知—行动”的变化，中国也在相机应对，并同时采取了更加主动的策略。^②

应当认识到，中美在经贸、环境、安全等领域仍有巨大空间，且肩负着重大责任。这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尽可能避免在相关领域出现“消极认知—冲突行动”的不断强化。例如，中美两国碳排放占全球的近 40%，^③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离不开中美全球气候领导力的共同发挥。从实际情况看，受佩洛西窜台严重影响，中国不得不暂停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商谈。也就是说，在政治互信程度较低、双方各自对对方认知偏消极的情况下，导致中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缺乏可靠的政治基础，也会使本就较为稀少且珍贵的合作共识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管控其他因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很有可能由“亮点”退化为又一不稳定因素或矛盾点。在空间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中美能够在太空治理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制定适当和互利的规则，实现基于规则的竞争合作，不仅为人类探索太空、合理利用空间资源提供重要利好，也将为中美两国管控太空冲突提供重要规则基础。

（三）“议题—回应”互动模式的变化

中美关系中，“议题—回应”互动模式的变化，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催化剂。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与 40 年前相比，双方议题与回应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比值，从 1978 年的 6.36% 提高到 2021 年的 77.01%。中美之间的经济议题，从过去美国设置议题中国回应，开始逐步转向中国与美国共同设置议题，再逐步转变为在某些领域中国设置议题美国回应。例如，最典型的是 2009 年开始的中美双方设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说明中国告别了单纯的回应议题的模式，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共同设置议题模式的开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

①佚名：《APEC 快递：布什说美中应携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中国新闻网，2001 年 10 月 19 日。

②[美]卡拉贝尔：《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王吉美、吴雪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年，第 233 页。

③杜受祐、杜珩：《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4～74 页。

国不适应中国主动在经济领域的议题设置。^① 比如中国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主动反向设置议题。除此之外，在地缘政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议题—回应”同样发生明显变化。

三、中美关系 50 年后的演变趋势分析

中美关系 50 年后的演变趋势，不仅是影响两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中美关系中，虽说潜在着众多双方可共赢的经济利益，但是两国所秉持的政治形态及理念差异巨大，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并会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加剧。究其根本，在于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以及估量是决定其行动的根本因素。这也意味着过去 50 年内大部分较稳定和可展望的因素或许变得不稳定和不可展望。由此，未来 10 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美国力图维护自己在全球的支配地位，明确把未来 10 年作为对华竞争甚至遏制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未来 10 年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

（一）理念的冲突将超越利益的合作，并成为塑造中美关系的核心变量

从利益角度看，中美间经贸互补性依然较强，中美合作将使得双方及世界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中国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美国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同环节。按照美方统计，2017—2021 年尽管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影响，中美货物贸易额仍然保持在 6500 亿美元左右；^② 美国智库测算，若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将使美国通胀率下降一个百分点。^③ 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容升级，美国资本从中国市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例如，2018—2021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 7.7%，高于其整体出口增速 6 个百分点；^④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内需潜力释放，将为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及优质消费品提供巨大市场。

从理念角度看，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中国作为所谓的“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角色将成为其的长期共识，遏制中国崛起是其核心目标。中国 GDP 有可能将在未来 10 ~ 15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将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国际秩序与规则重构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遏制或延缓中国崛起进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经济领域全面推动印太经济框架，在中国周边构建合作标准体系；第二，在科技方面拉拢盟友推动去中国化，推进中美科技与教育脱钩；第三，采取“以台制华”策略，不断挑衅中国国家主权；第四，利用自身国际话语权，妄图污名化中国；第五，在安全领域，强化诸如“五眼联盟”（FVEY，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边机制”（美日印澳“菱形同盟”）、“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AUKUS，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组成的联盟）等“小圈子”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围堵和孤立。

展望未来 10 年，美国继续维持在华经济利益在其国家战略中的权重明显下降，“战略竞争”的理念将长期存在。以科技为例。美国是个创新大国，中国是个创新应用大市场，两者结合将为全球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动力。反之，中美科技“脱钩”不仅对中美科技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也不利于全球科技的发展。2021 年，中国芯片进口额达 4326 亿美元，全球占比达 77.8%；市场销售额达 1925 亿美元，全球第一。当前，各大芯片企业在生产方面依赖美国的技术，但在市场需求方面依赖中国。波士顿咨

①米勒-怀特、戴敏：《中美关系新战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双赢之路》，中信出版社，2008 年，第 137 页。

②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

③外交部：《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央视新闻客户端，2022 年 7 月 25 日。

④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数据测算得出。

询公司预估，若美国执意对华采取技术硬脱钩，可能会让美国芯片企业损失 18% 的全球市场份额、37% 的收入。^① 但在美国“战略竞争”的理念下，特别是美国视中国为其最大、最直接、最实际、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美间的“竞争”力度很可能将不断加大，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也不断扩展，诸如科技脱钩、金融脱钩等非理性行为将很有可能发生。中美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最大的困惑在于如何正确评估彼此的理念以及深层次的战略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理念沟通、加强战略互动，特别是需要从 50 年来的对抗到破冰的战略行动中汲取营养，也让美国真正了解中国“天下大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是中美关系未来 10 年不“脱轨”的底层逻辑。^②

（二）认知障碍将带来行动的错判，并有可能成为激化中美矛盾的重要因素

从特朗普政府至今，美国对华负面认知严重偏执，不仅带来对华无底线的打压，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对华好感度。^③ 不乐观地看，这种“自我臆想—自我实现”下的非理性理念是对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如果这一认知不能得到有效逆转，未来 10 年中美关系将有可能加大矛盾、加剧风险。要改变这一认知，中美都需要反思自身战略，对本国长期利益需要有明确的认识，正确评估自身及对方，理性制定符合国情并能积累长期优势的战略，避免战略错判。从实际看，美国对华认知是处于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考量，超越某一届政府，将伴随着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进程。

对中国来说，需要清醒认识到，中美竞争是一场“持久战”。这是基于中美各自认知的战略判断：一方面，中国需要认识到，目前中美间的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在科技为重点的硬实力、文化软实力以及全球资源调配能力、规则制定能力等方面，中国都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追赶”。另一方面，未来 10 年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 10 年。从经济结构看，未来 10 年保持至少 5% 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保持 5% 左右的经济增长，未来 10 ~ 15 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是中国发展的大目标。从这个层面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尤为重要。此外，尽管美国在走下坡路，但美国的衰落不会一夜之间形成，而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美国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因而采用全局和局部的冲突来进行遏制，以维护其主导全球的霸主地位。

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需要坚定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在改革开放中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充分释放中国经济蕴藏的巨大增长潜力，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例如，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城乡服务型消费占比将提升至 60%，由此将释放数万亿元的新增消费市场，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提供重大利好；另一方面，需要稳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世界通行做法衔接，争取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多合作者、认同者、支持者。此外，中国还需要克服“软实力”不强的短板，扭转国际社会认知，在大变局下有效“讲好中国故事”，使外界能够客观理性认识当代中国，特别是认识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与世界融合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三）解决互为镜像的结构性矛盾，是未来 10 年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实现好转的重点

内政外交具有统一性。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决定外交。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①佚名：《美国〈芯片法案〉无法阻止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光明网，2022 年 8 月 24 日。

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两手准备，斗合并行：中美经贸博弈 2021 年评估及中国未来应对》研究报告，2021 年 12 月 1 日，第 28 页。

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两手准备，斗合并行：中美经贸博弈 2021 年评估及中国未来应对》研究报告，2021 年 12 月 1 日，第 34 页。

各自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双方如能加强合作，将为解决各自结构性矛盾提供重要动力。比如中国破解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失衡，客观上需要美国；美国破解经济结构性失衡，客观上也需要中国。^①这就需要中美双方努力求得最优解，并作出重大抉择：美国履行《上海公报》承诺，双方都应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与国际安全关切，在解决各自国内结构性矛盾方面破题发力，并在规则框架下开展竞争与合作。

当前，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并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从美国层面看，重要的是以结构性改革切实解决本国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是将国内矛盾转嫁于他国。例如，1971—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比由61%下降到了50%。从行业看，2009—2017年，美国的金融、信息从业相关人员的工资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61.48%和52.16%。相较而言，美国的建造、采掘等行业的工资增幅仅仅只有27.27%和35.86%，甚至低于平均水准。^②换言之，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引发国内群体、阶层利益关系的复杂变化，是造成美国自身矛盾的深层次因素。过去20年间，美国在产业转型中忽略了制造业的发展，美国的中低收入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没有真正受益，从而成为反对全球化、民粹主义的重要群体，成为造成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变化的一股社会力量。这就需要美国加快社会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化解自身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变化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短期内，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空间可能有限；从中长期来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众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具有众多共同且重要的利益，并且中美直接对抗的代价巨大。^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以平等磋商谈判妥善解决争端分歧、实现短期缓和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在于能否以“全球视野、长期视角、战略思维”重塑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美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做长远的考虑、做有效的沟通、做恰当的管控。中美两国若能客观认识彼此、求同存异，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加强合作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1. 盛柳刚、赵洪岩：《中美经贸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3. 王缉思：《大国关系》，中信出版社，2015年。
4. 达巍、蔡泓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
5. 时殷弘：《911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及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爱思想网，2001年10月8日。
6. 盛柳刚、赵洪岩：《中美经贸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7. 毕洪业：《“战略三角”还是“三边互动”：新时代的中美俄关系》，《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
8. 徐辰：《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得与失》，《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第7期。
9. 达巍、蔡泓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
10. [美]卡拉贝尔：《中美国从激烈对抗到超级融合》，王吉美、吴雪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11. 杜受祜、杜珩：《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谷 岳

①米勒-怀特、戴敏：《中美关系新战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双赢之路》，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②盘和林：《美国半数家庭比金融危机前更穷，繁华之下掩藏了哪些问题》，中国经营网，2018年8月14日。

③贾庆国：《“山穷水尽”还是“柳暗花明”？再议中美关系》，《国际观察》，2022年第2期，第50~71页。

三十而立：中韩服务业合作 回顾、展望与建议

洪群联

摘要：中韩两国互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建交 30 多年来，随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深，服务业合作稳步发展，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双向投资进一步扩展。中韩 FTA 和 RCEP 的签署落地标志着两国服务业步入制度型开放合作新阶段。当前，中韩两国服务业合作既来自贸协定落地、新科技革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等机遇，也面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美国等域外国家政治干扰，以及中韩同水平竞争等挑战。展望未来，要抓住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中韩 FTA 为制度基础，重点加强信息、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和金融、设计、环保等专业服务业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中韩 FTA 谈判，推动 RCEP 落地取得实效，出台更加开放的支持政策，携手开拓服务业第三方市场，提升中韩自贸区地方合作示范区发展能级，全方位、高质量推进中韩服务业深度合作。

关键词：服务业 服务贸易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洪群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中韩服务业合作的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中韩正式建交后，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双方经济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就服务业合作角度看，可简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中韩服务业非正式合作往来阶段（1978—1991 年）

1978 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韩之间经由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中转的间接贸易逐步发展。由于两国地理位置临近、贸易互补性强，中韩贸易总额不断攀升，从 1979 年的 1900 万美元增至 1984 年的 4.6 亿美元。^① 1988 年 3 月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作为中韩两国民间直接贸易的试点省份，1988 年 10 月韩国政府取消韩国公民前往中国旅游限制，同年 11 月韩国外汇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外汇交易业务协议，1991 年 1 月中韩两国分

^①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涉及的中韩经济贸易、投资的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外汇管理局以及韩国国家统计局、产业通商资源部、韩国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

别在汉城^①和北京设民间贸易代表处。在一系列开放政策推动下，中韩直接贸易、直接投资起步发展，经贸领域取得重大突破。1991 年，中韩货物贸易额增至 57.7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 23.7 亿美元、进口 34.0 亿美元，直接贸易占比达 60%。1988—1992 年，^② 韩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 943 个，合同金额 6.2 亿美元，实际金额 1.6 亿美元。两国建交前，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项目共 11 个，投资金额 464.6 万美元。

这一时期，中韩服务业合作规模小、类型少、层次低。1988—1991 年，韩国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项目仅有 14 个，主要涉及住宿和餐饮、运输和仓储行业，投资总额仅 150 万美元；1992 年，来华韩国游客人数为 11.2 万人次，访韩中国游客人数为 8.7 万人次。^③

（二）中韩服务业合作起步发展阶段（1992—2001 年）

1992 年 8 月，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先后签署《中韩政府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联委会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等一系列政府间协定，为两国经贸科技合作等打下坚实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在这一阶段，中韩双方经贸合作主要是商品货物贸易往来，绝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领域。1992—2001 年，中韩贸易总额从 63.7 亿美元增至 314.9 亿美元，其中韩国对华出口额从 26.5 亿美元增至 181.9 亿美元，进口额从 37.2 亿美元增至 133.0 亿美元。1994 年，中国成为韩国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

在这一阶段，随着中韩各自服务业市场的逐步开放，双方服务业合作快速发展起步，服务贸易类型和投资行业领域逐渐多元化，但规模总体还较小。1992—2001 年，中国对韩国服务业直接投资项目 2295 个，投资总额 1.64 亿美元，分别占全部投资项目数和金额的 86.6% 和 75.1%，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领域（见表 1）；韩国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项目 1605 个，投资额为 11 亿美元，投资规模主要集中在金融和保险、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房地产等行业（见表 2）。从 1994 年起，韩国朝兴银行、友利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等相继进入中国市场；1995 年，中国工商银行与韩国第一银行合资成立首家在华金融机构青岛国际银行，韩国海运在上海设立独资韩进海运（中国）有限公司；1997 年，韩国大型超市易买得在上海开办首店，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零售品牌。1995—2001 年，中韩服务贸易额从 27.4 亿美元增至 45.0 亿美元；2001 年，访韩中国游客为 48.2 万人次，来华韩国游客增至 167.8 万人次，来华韩国留学生为 1.64 万人。

表 1 1992—2019 年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个，百万美元

分时段	服务业投资项目数	投资金额	全部投资项目数	全部投资金额
1992—2001 年	2295	163. 60	2650	217. 80
2002—2015 年	5926	5301. 10	6638	7843. 00
2016—2019 年	1921	3823. 60	2391	6583. 10
合计	10142	9288. 30	11679	114643. 90

数据来源：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三）中韩服务业合作加快发展阶段（2002—2015 年）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不仅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明确对 12 个服务

①2005 年 1 月 19 日，“汉城”汉字名称正式更名为“首尔”。
②鉴于数据可得性，此处数据截至 1992 年，但不影响本文分析。
③鉴于数据可得性，此处用 1992 年的数据，但不影响本文分析。

表 2 1992—2001 年韩国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个，万美元，%

分行业	项目数量	投资额	项目数量占比	投资额占比
批发和零售贸易	474	21002.98	29.53	19.00
运输和仓储	136	8396.88	8.47	7.60
住宿和餐饮服务	362	24907.57	22.55	22.53
信息和通信	64	9074.92	3.99	8.21
金融和保险	15	25827.92	0.93	23.37
房地产	56	13900.99	3.49	12.58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71	1250.61	4.42	1.13
业务设施管理和支持服务、租赁服务	204	3507.87	12.71	3.17
教育	20	129.27	1.25	0.12
人类健康和社会服务	10	29.10	0.62	0.03
艺术、体育和娱乐相关服务	79	733.87	4.92	0.66
会员组织、维修和其他个人服务	101	859.19	6.29	0.78
其他	13	914.32	0.81	0.83
合计	1605	110535.49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

业领域做出开放承诺及时间表，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2004 年中国成为韩国第一贸易伙伴国，2008 年两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02—2015 年，中韩贸易总额从 411.53 亿美元增至 2273.80 亿美元，其中韩国对华出口额从 273.53 亿美元增至 1371.40 亿美元，进口额从 174.00 亿美元增至 902.40 亿美元。

在这一阶段，服务业合作随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加深而得到快速、稳定发展，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服务业双向投资进一步扩展。2002—2015 年，中国对韩国服务业直接投资项目 5926 个，投资额 53.01 亿美元，分别占全部投资项目数和金额的 89.3% 和 67.6%（见表 1）；韩国在华直接投资服务业项目 17096 个，投资额为 96.03 亿美元，从投资规模看，金融和保险占比超过 40%，从项目数量看，批发和零售占比达 43.54%（见表 3）；中韩服务贸易总额从 64.1 亿美元增至 357.0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服务出口从 34.7 亿美元增至 152.2 亿美元，进口从 29.4 亿美元增至 205.6 亿美元。2015 年，访韩中国游客人数达 598 万人次，来华韩国游客达 444.4 万人次，自 2005 年之后韩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旅游第一大入境客源国。^①

（四）中韩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合作新阶段（2016 年至今）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简称“中韩 FTA”）正式生效，进一步降低了商品服务和要素跨境流动的成本，极大推动了中韩两国服务业合作，也标志着两国进入了制度型开放合作新阶段。2017 年 12 月，中韩两国签署《关于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致力于实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更高水平的开放，截至目前，第二阶段谈判已举行九轮。2020 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和 2022 年 2 月 1 日分别对中韩正式生效，两国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合作更进一步。在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方面，中国解决了韩国在视听合作

^①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2015 年 1—12 月来华旅游入境人数（按入境方式分）》，2016 年 1 月 18 日，http://www.ctaweb.org.cn/cta/lysjsx/xsjl_3.shtml。

表 3 2002—2015 年韩国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个，万美元，%

分行业	项目数量	投资额	项目数量占比	投资额占比
批发和零售贸易	7443	251324.69	43.54	26.17
运输和仓储	652	45268.67	3.81	4.71
住宿和餐饮服务	1916	33146.59	11.21	3.45
信息和通信	1182	25497.96	6.91	2.66
金融和保险	385	396970.21	2.25	41.34
房地产	427	119108.82	2.50	12.40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1622	24316.68	9.49	2.53
业务设施管理和支持服务、租赁服务	1375	23809.56	8.04	2.48
教育	397	3965.32	2.32	0.41
人类健康和社会服务	117	1701.26	0.68	0.18
艺术、体育和娱乐相关服务	876	29131.60	5.12	3.03
会员组织、维修和其他个人服务	640	5516.95	3.74	0.57
其他	64	572.71	0.39	0.06
合计	17096	960331.02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

表 4 2016—2022 年上半年韩国在华服务业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个，万美元，%

分行业	项目数量	投资额	项目数量占比	投资额占比
批发和零售贸易	2749	122208.40	56.83	34.72
运输和仓储	158	6293.11	3.27	1.79
住宿和餐饮服务	228	13585.88	4.71	3.86
信息和通信	621	19646.24	12.84	5.58
金融和保险	143	87719.89	2.96	24.92
房地产	46	32135.36	0.95	9.13
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464	54177.77	9.59	15.39
业务设施管理和支持服务、租赁服务	146	2904.35	3.02	0.82
教育	115	2003.05	2.38	0.57
人类健康和社会服务	28	2441.36	0.58	0.69
艺术、体育和娱乐相关服务	77	4232.22	1.59	1.20
会员组织、维修和其他个人服务	59	4633.26	1.22	1.32
其他	3	20.54	0.06	0.01
合计	4837	352001.42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

合拍、出境游、环境等领域的核心关注，韩国满足了中国在快递、建筑、医疗等方面的核心要价，两国承诺将给予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内部往来人员两年期的就业和居留许可、商务访客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① 在这一阶段，中国持续推进扩大开放，不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增加和拓展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中韩深化服务业贸易和投资合作提供良好机遇。

2016—2019 年，中国对韩国服务业直接投资项目达 1921 个，投资额为 38.2 亿美元，分别占全部

^①马菲、陈尚文：《中韩自贸协定亮点扫描》，人民网，2015 年 4 月 8 日第 023 版，[http://finance. people. com. cn/n/2015/0408/c1004-26810392. html](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408/c1004-26810392.html)。

投资项目数和金额的 80.3% 和 58.1%（见表 1）；2016 至 2022 年上半年，韩国在华直接投资服务业项目 4837 个，投资额为 35.2 亿美元（见表 4）。2019 年中韩两国服务贸易总额为 324.7 亿美元。中韩服务业合作的领域、深度和层次明显提升。在文化娱乐方面，腾讯投资韩国手游公司网石游戏（Netmarble）、韩国电视台 JTBC 制作公司，两国影视制作者进行了翻拍、合拍、“一本两拍”等合作模式创新；在电子商务方面，京东、阿里、唯品会等知名电商纷纷在韩国设立海外办公室、海外仓和物流运转中心等；在金融投资方面，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获批在华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韩国私募股权公司 MBK Partners 收购了神州租车 4.43 亿股股份；^① 在研发服务方面，现代汽车集团在上海设立中国前瞻数据研发中心，韩国三星生物与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启德医药共同开发抗体药物偶联物。

中韩服务业合作呈现两大主要特点。一是投资方面，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以服务业为主，韩国对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双方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领域，且以小规模投资为主。1992—2019 年，中国对韩国服务业、制造业、农林渔业和其他行业投资项目分别为 10344 个、1356 个、161 个和 172 个，占投资项目总数的 85.96%、11.27%、1.34% 和 1.43%，数量上服务业一业独大。1988—2018 年，韩国对华产业投资存量约合 649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存量分别约占 75.25%、17.44%（见图 1）。2019 年，制造业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华投资的比重则高达 92.8%。从服务业项目投资额看，2019 年韩国对华服务业项目平均投资额为 50.6 万美元，中国对韩国平均投资额为 91.2 万美元，均未超过百万美元。二是贸易方面，中韩服务贸易呈现稳步增长势头，中国对韩国服务出口以制造服务、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为主，韩国对华服务出口以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为主，中方处于服务贸易逆差地位。2019 年，中国对韩国服务出口额 139.0 亿美元，其中制造服务、运输、其他商业服务、旅行分别占 36.8%、23.0%、16.7%、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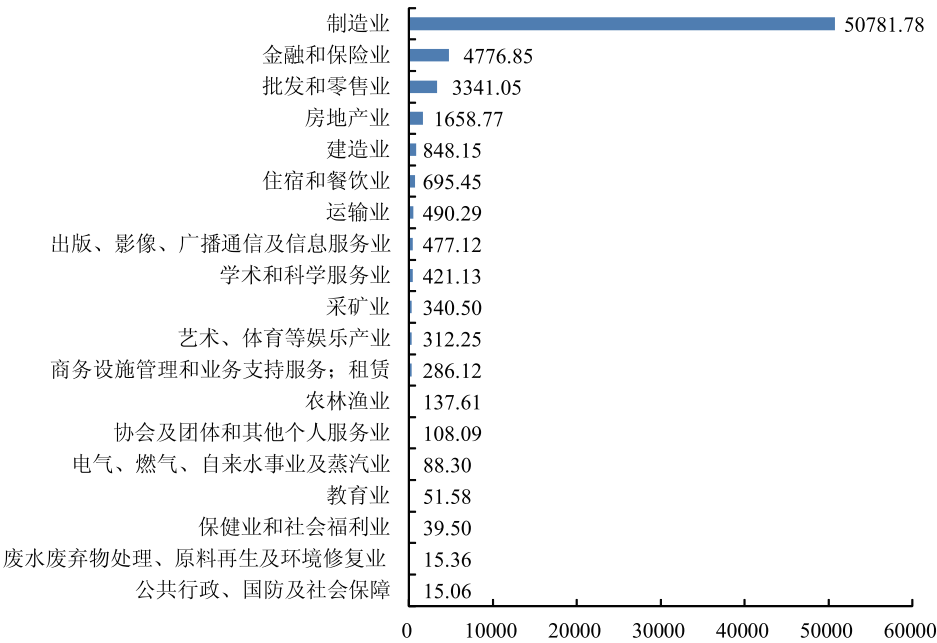


图 1 1988—2018 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情况（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韩国产业研究院北京代表处。

^①蒋柠璐：《神州租车成为 MBK Partners 全资附属公司 私有化退市完成》，中国经济网，2021 年 7 月 5 日，[http://finance. ce. cn/stock/gsgdbd/202107/05/t20210705_36692030..shtml](http://finance.ce.cn/stock/gsgdbd/202107/05/t20210705_36692030.shtml)。

自韩服务进口额 185.8 亿美元，其中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分别占 37.8%、28.8%、14.9%、7.4%。^①多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还有待增强。总的看，中韩服务业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相比，中韩服务业合作和服务贸易发展仍相对滞后。深化中韩服务业合作，既是两国各自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下一步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所在。

二、中韩服务业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韩服务业合作面临的机遇

1. 自由贸易协定持续推进为深化中韩服务业合作奠定制度基础。中国正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以中韩 FTA、RCEP 等为基本制度框架，中韩两国正在就跨境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等议题规则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磋商，持续推进 FTA 第二阶段谈判，共同推动消除影响跨境服务贸易的限制性、歧视性措施。这将为中韩服务业合作创造更加自由宽松的制度环境，特别是为拓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服务、文化旅游、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领域合作提供一个规范稳定可预期的框架。

2. 新科技革命深入演进为拓展中韩服务业合作提供新空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促进传统服务业创新变革和转型升级，极大地拓展了服务贸易的范围，^②使得一些原来无法开展跨境服务的活动变得可能、便捷和常见。例如，新冠疫情以来，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在线传播形式为国际间教育交流合作打开了突破口，促进了跨国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服务新业态，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网上交易会等业态蓬勃发展，为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增长及商业模式创新变革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也将进一步丰富中韩服务业合作的新内容。

3. 产业结构特征和消费结构升级为推动中韩服务业合作创造新需求。从产业结构特征看，中韩两国都是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出口大国，2021 年中韩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 4.86 万亿美元、4566 亿美元，货物出口额分别为 3.36 万亿美元、6445 亿美元。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货物出口量均位列全球第一，韩国制造业增加值、货物出口额均位列全球第五。中国已连续 17 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则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较快增长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例如，大量机电设备和生活消费品进出口，需要运输、维修、金融保险等服务相配套；中韩都在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韩国发布《科学技术未来战略 2045》，与创新相关的新型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两国在跨境研发、知识产权使用、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将越来越大。从消费结构升级看，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1 年韩国人均 GDP 达到 3.47 万美元，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对旅游、留学、医疗康复、文化娱乐、信息技术等服务需求更加旺盛，有望给两国服务业发展与合作带来强劲动力。

^①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时间序列（BPM6）》，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2022 年 9 月 29 日，[http://www. safe.gov. cn/safe/2019/0627/13519. html](http://www.safe.gov.cn/safe/2019/0627/13519.html)。

^②赵海娟：《隆国强：中韩服务贸易合作前景广阔》，《中国经济时报》，2018 年 7 月 16 日，第 5645 期。

（二）中韩服务业合作面临的挑战

1.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给中韩服务业合作增添不确定性。全球新冠疫情对人流、物流形成直接冲击，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不畅，特别是国际商务和旅游活动直接受疫情影响，服务贸易和人员往来仍将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如，2021 年到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约 21 万人，仅及疫情发生以前的 1.5% 水平。全球经济政治局势动荡不稳，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通胀危机等叠加，世界经济已经呈现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的滞胀态势，世界经济进一步减速乃至陷入衰退的风险明显加大。受此影响，中韩两国服务业企业的商业信心不足，两国贸易和投资增长不确定性增加。

2. 美国为主的域外国家干扰影响中韩服务业合作进程。一直以来，美国是韩国认为的最可靠的盟友。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联合盟友孤立和压制中国是惯用手段。在经济方面，美国竭力拉拢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芯片联盟”，构建韩美经济同盟、技术同盟，借“经济安全”名义阻挠中韩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行。^① 在安全领域，美国企图将韩国等国纳入“四方安全对话”，打造围堵中国的“亚洲版北约”，同时要求韩国就中国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内政和主权问题表态。来自美国的干扰因素愈发掣肘韩国对华政策，阻挠中韩服务业合作进程。

3. 中韩两国和世界各国间的同水平竞争正在加剧。就全球服务贸易格局来看，近年来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均处于逆差状态，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均处于相对劣势。2020 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1005 亿美元，韩国服务贸易逆差 154 亿美元。因此，中韩两国在发展服务贸易的同时都面临如何缩小贸易逆差、改变贸易结构的重要任务。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体系，这种面向全球市场的开放是一种非歧视、无差别的开放。韩国的产品和服务不仅面临中国乃至全球各国的竞争压力，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亦如此。中韩两国服务业合作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强大的国家的激烈竞争。

三、深化中韩服务业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韩建交 30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韩关系与时俱进全方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② 展望未来 30 年，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服务业合作是大势所趋、双赢选择。要抓住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趋势，以 FTA 为制度基础，发挥两国特色优势和共同基础，重点推进信息技术、文化旅游、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领域开放合作，努力拓展两国服务贸易空间，提升服务业发展合作水平。

（一）加强信息服务领域合作

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速突破应用，中韩两国都将发展信息服务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抓手，中国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重点攻坚的科技创新领域和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韩国提出《IT 韩国未来战略》。特别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底座，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之势日益凸显，中韩两国在信息服务领域合作空间巨大。建议加强信息技术、5G、人工智能、数据库、海外漫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建立信息服务领域人员互访、信息互通、学术研讨等交流机制，促进在互联互

^①唐晓：《中韩互利合作必须排除域外势力干扰》，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2022 年 8 月 29 日，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2-08/29/content_78393401.shtml。

^②新华社：《习近平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就中韩建交 30 周年互致贺函》，人民网，2022 年 8 月 24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824/c1024-32510688.html>。

通、技术标准等方面合作交流，持续推动数字转换等相关标准合作。加强规则合作，中国尽快启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中韩早日加入 DEPA，通过规范数字等新技术领域合作，确保电子商务顺畅化、数据转移自由化。^①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发展“互联网+”服务业。支持中国东北地区发挥区位、语言等优势，进一步承接韩国信息、软件等服务外包。

（二）加强文化服务领域合作

中韩两国都是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文化资源极为丰富，韩国文化产业发展成熟，双方在文化服务方面合作互鉴、共同发展的潜力巨大。建议探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动漫、数字音像、影视剧作、网络游戏、节目内容、媒体技术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进以中国传统文化、非遗以及韩国经典 IP、文化产品等重点领域的项目合作，共同打造一批在亚洲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高品质文化产品。积极扩大双方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进出口。在产品内容和产品版权交易方面，鼓励两国政府、行业协会共同发起各种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会，构建专业化的交流沟通平台，促进项目合作、人才交流和版权交易。^② 推动两国人文交流，持续办好东亚文化之都评选、中韩儒学交流大会、青少年文化交流大赛等活动，增进友谊与互信。

（三）加强旅游服务领域合作

中韩两国地理位置相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交通条件便捷，旅游资源丰富，双方互为彼此入境游最主要的客源国之一。后疫情时代，两国居民旅游消费需求旺盛，加强两国旅游服务合作势在必行。建议着力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硬件设施、软件服务，改善两国旅游接待环境。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开发突显资源与地缘优势的旅游产品，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和区位特点来选择细分市场。围绕两国共同或相似的文化旅游资源，依托友好城市等，合作开发一批旅游景点和跨境旅游线路，开发邮轮观光、跨境自驾游等产品。加强旅游商品、免税商品的开发，共同推荐“高品质的畅销旅游商品”。加强两国旅游资源联动和国际合作，联合打造东北亚地区旅游新板块，发展成为对欧美等远方市场的共同目的地，开拓第三方市场。^③

（四）加强医疗健康领域合作

中韩两国都积极发展医疗和中医药产业，韩国在医疗美容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医疗资源丰富，两国医疗健康市场需求广阔，合作潜力巨大。建议进一步放宽两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准入限制，积极引进韩国领先美容整形、康复医疗等领先机构和品牌，发展具有诊前咨询、诊前体检等业务的定制化、特色化专业美容整形诊前业务。支持韩国在华投资建设各类专业性、综合性医疗机构，推动中韩在康复保健、健康管理、抗衰老、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支持中韩两国共同打造医疗健康产业园、医疗科技产业园，推动两国生物医药企业在新药研发、临床试验、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探索双方综合医院的合作对接模式，以远程医疗、专家会诊组的方式，在重症医疗等领域建立合作模式，建设临床应用中心和联合研发中心。

①何诗霏：《聚焦数字经济 中韩联手展开全方位合作》，《国际商报》，2022 年 7 月 28 日第 010 版。

②穆宝江：《韩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中韩文化产业合作》，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150 页。

③洪欣、黄俊：《关于中韩旅游合作的几点思考》，《青年时代》，2017 年第 33 期，第 90 页。

（五）加强专业服务领域合作

加强中韩两国金融、设计、环保等专业服务领域合作。在金融服务方面，重点加强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支持微信、支付宝与韩国社交网络公司 Naver、Kakaotalk 进一步深化合作，推进绿色金融标准的相互认证和产品互通，支持韩国企业在中国发行熊猫债等方式增加绿色金融市场流动性。在工业设计领域，积极引进韩国高水平设计企业和设计师，支持中韩设计服务与制造业紧密对接，推进设计领域人才合作培养。在节能环保领域，适应碳达峰碳中和趋势，支持中韩两国节能环保服务企业与重点产业对接，以大气污染、污水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土壤修复等领域，推进技术研发和服务合作，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为载体引入双方技术支持单位、投融资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实现共同发展。

四、促进中韩服务业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建议

中韩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加强政治互信，增进民间友好，深化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围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立足中韩、面向全球，全面加强中韩服务业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努力为全世界提供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①

（一）持续推进中韩 FTA 谈判、RCEP 落地取得实效

积极推动中韩 FTA 第二阶段谈判，加大在 5G、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在跨境服务贸易、投资及金融服务等议题规则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方面早日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要加快推动出台实施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在工程咨询、会展、商务服务等领域，分层次逐步取消或放宽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模式的服务贸易限制措施，^② 进一步扩大对韩国服务业企业的开放力度。实施好《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划（2021—2025 年）》，聚焦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挖掘合作潜力。高质量实施 RCEP，在关税减让、海关程序简化、原产地规则技术准备、产品标准统一和互认等方面抓紧拿出实施协定的措施，对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养老服务、专业设计等诸多服务部门作出的新开放承诺逐一落实开放措施。^③

（二）研究出台更加开放、力度更大的支持措施

两国政府围绕深化服务业合作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中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将服务贸易出口退（免）税申报、支付结算、资质登记、自然人移动等纳入“单一窗口”管理。进一步简化企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及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在境内的支付使用业务办理流程，推动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积极探索软件实名认证、数据产地标签识别、数据产品进出口，对软件和互联网服务贸易进行高效、便利的数字进出口检验。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各类管制，鼓励中韩两国科技人员交流与

①梅克保：《加强中韩合作 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国质量新闻网，2019 年 8 月 22 日，https://www.cqn.com.cn/zg-zlb/content/2019-08/22/content_7449683.htm?ivk_sa=1023197a。

②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2020 年 8 月 30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1/content_5544926.htm?ivk_sa=1024320u。

③《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有关工作等》，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2 月 2 日，http://www.gov.cn/hudong/2020-12/02/content_5566490.htm。

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和技术攻关、课题合作、学术交流、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① 开展专业服务领域人员执业资质资格互认试点，推动中韩专业服务人员跨境便利执业。

（三）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开拓中韩服务业第三方市场

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丰富的合作经验与合作成果，遍及全球不同区域，涉及不同合作领域。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韩已有合作项目为基础，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和细化产业分工，增加产业上游设计与研发以及产业下游运营管理和市场分销的比重，拓展产业链上服务环节的合作。^② 结合第三方市场发展需求和中韩两国企业比较优势，推动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健康医疗等新兴服务业产业领域的合作，加强两国金融机构在专项贷款、股权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四）提升中韩自贸区地方示范区、中韩产业园区发展能级

更大力度推进中国威海、韩国仁川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率先推进一批开放力度更大、示范引领作用更强的服务业合作项目，深入研究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先行先试政策，不断深化涉外商事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构建中韩服务业合作新机制。及时总结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展经验，推广两国服务业开放合作的经验做法。加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韩（惠州）产业园、中韩（盐城）产业园、中韩（烟台）产业园、中韩（陕西）产业园等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引进新的韩国投资项目。支持在中韩产业园内复制推广中国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等改革经验，提升中韩服务业合作发展能级。

参考文献：

1. 沈铭辉、胡艺：《中韩贸易 25 年：转折点或新起点？》，《东北亚论坛》，2017 年第 5 期。
2. 董洁：《中韩建交中的中国外交决策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8 期。
3. 冯嘉琦：《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外资》，2019 年第 10 期。
4. 国洪飞、徐英超：《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经济研究导刊》，2007 年第 7 期。
5. 洪群联：《从服务大国迈向服务强国——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 年。
6. 马菲、陈尚文：《中韩自贸协定亮点扫描》，《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8 日。
7. 宁赋魁：《疫情下的韩国经济和应对策略及中韩经贸合作重点领域展望》，《东疆学刊》，2022 年第 1 期。
8. 王昌林主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趋势与对策：2017 年中韩经济合作研讨会文集》，中国计划出版社，2018 年。
9. 王金波：《〈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内涵、特征与中国参与国际数字治理的政策建议》，《全球化》，2022 年第 3 期。
10. 王晓红、夏友仁、梅冠群、梁鹏、郭霞、李蕊：《基于全链路跨境电商的数字化新外贸研究——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例》，《全球化》，2021 年第 3 期。
11. 王箫轲、王玉婷：《疫情冲击下中韩经济关系发展态势与前景展望》，《当代韩国》，2021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郭霞

^①李博英：《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韩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国际贸易》，2019 年第 8 期，第 19 页。

^②吴崇伯、丁梦：《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阻力与对策》，《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3 期，第 86 页。

中韩贸易 30 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李天国

摘要：中韩建交 30 年来，两国以经济互补性为基础，不断扩大贸易规模，深化经贸合作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中韩贸易逐步从原材料贸易发展到中间品的贸易模式，两国制造业竞争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活跃的创新活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这相应地改变了中韩贸易的商品结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也在增强，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将影响中韩经贸关系。中韩有必要继续拓展合作制度框架，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形成更加牢固的经贸关系。中韩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加强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挖掘两国产业合作互补性，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模式。中韩也有必要加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在投资、服务贸易、金融、市场准入等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不断升级中韩产业合作深度与广度。

关键词：中韩贸易 中间品贸易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全球价值链

作者简介：李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韩国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1992 年 8 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2022 年是建交 30 周年。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韩两国以经济互补性为基础，不断扩大贸易规模，深化经贸合作领域。中韩从 1998 年的 21 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 年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 年再次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前，中韩两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韩两国经贸合作需要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

一、中韩贸易合作 30 年的成就

中韩建交 30 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得到中韩两国政府、学界和产业界的充分认可。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大体上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 15.9%。2015 年中韩两国签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承诺在未来 20 年内，双方将在 90% 的贸易门类和 85% 的贸易产品领域，逐步实现零关税，成为当时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开放水平最高、开放程度最大、覆盖领域最广的协定。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国家风险形成机制研究”（15BGJ033）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中韩双边贸易总体发展态势

1992 年中韩两国建交后，签署《中韩政府贸易协定》，两国经贸合作随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制度红利，加大市场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建交前三年的中韩双边贸易保持年均 40% 以上的高速增长。1997 年韩国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大幅下滑，中韩贸易出现负增长。但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恢复，韩国的内需重新被激发，对外经贸活动开始复苏。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中韩贸易也迎来高速增长期。2003—2004 年，中韩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43% 和 42%。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韩贸易受到一定影响，但随后呈现出较快恢复和增长态势。2015 年中韩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往来，2021 年达到 3623 亿美元。这种“爆炸性增长”和“超常规增长”，体现出中韩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被长期压抑的增长潜力（梁亚滨，2022）。

从中韩贸易收支上看，中国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规模随着中韩贸易整体走势而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中韩贸易中的逆差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双边进出口贸易的下滑，逆差规模也出现相应下降。2013 年和 2018 年，中韩双边贸易出现阶段性的峰值，中国逆差规模也达到区间最大值，分别达到 919 亿美元和 955 亿美元。2018 年后，中国逆差规模逐渐下降，2021 年达到 646 亿美元（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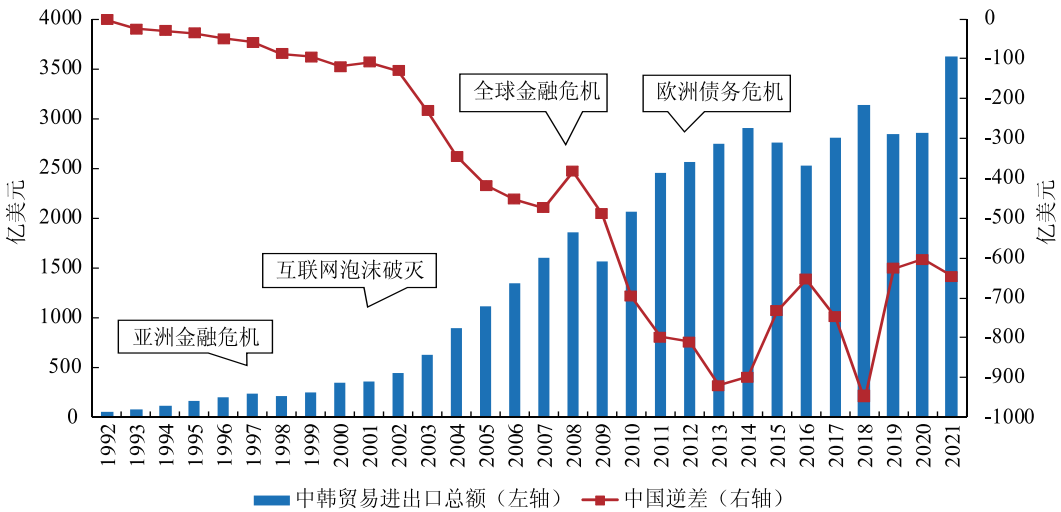


图 1 1992—2021 年中韩贸易总额与中国逆差规模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不断扩大的中韩贸易规模对两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自中韩建交以来，中韩贸易占韩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出现快速上升态势，但进口与出口比重呈现不同特点。出口方面，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快速上升，但 2010 年以后，该比重不再呈持续大幅上升态势，就保持在 25% 左右。2010 年该比重达到 25.1%，2015 年和 2020 年该比重分别为 26% 和 25.9%。但在进口方面，韩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占韩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则出现持续上升态势。2000 年韩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占韩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 8%，2005 年上升至 14.8%，2010 年达到 16.8%。到了 2015 年和 2020 年，该比重已经分别上升至 20.7% 和 23.3%，表明韩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进口，这对降低中国在中韩贸易中的逆差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趋势放缓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率的提升。随

随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国内厂商也开始生产大量中间品，降低了中国进口额中的韩国产中间品的比重。第二，东亚区域价值链正在经历重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过去投资于中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将生产工厂逐步转移至东南亚地区。2007 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速达到 18.5%，并且之后基本上保持在 8% 以上。2021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速达到 9.7%，实际增长 8.6%。^① 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韩国的新增对华投资企业数量出现下降趋势，对华直接投资更集中在原有在华韩资企业。2005 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大型跨国公司的比重只有 60.5%，但 2010 年达到 80.3%，2020 年上升至 88.8%，2021 年上半年达到 92.3%。

（二）中韩贸易的产业结构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韩进出口贸易中几乎所有产业都出现大幅增长。中国对韩国的出口方面，电气与电子产业增幅非常明显，1992 年出口额只有 0.51 亿美元，2000 年出口额为 19.4 亿美元，2010 年增至 200.1 亿美元，2021 年达到 475.5 亿美元，较 1992 年增长了 931 倍。此外，一般机械、化学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的出口额增长也比较快，1992 年出口额依次只有 0.42 亿美元、1.61 亿美元和 0.43 亿美元，但到 2021 年已经分别增长至 171.9 亿美元、215.6 亿美元和 117.5 亿美元。在过去的 30 年间，也有一些产业随着其相对竞争优势的变化，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例如，运输设备产业在 2000 年出口额为 4.5 亿美元，2010 年增至 33 亿美元，但 2015 年降至 22.7 亿美元，2021 年再次增至 43.4 亿美元。^② 中国自韩国的进口方面，也与出口产业变化有些相似。在所有产业中，电气与电子产业增长速度也最明显，1992 年进口额达到 2.23 亿美元，而到了 2021 年已增至 1094.9 亿美元，增幅达到 490 倍。此外，一般机械和化学制品的进口也持续增长，增幅分别达到 107 倍和 69 倍。精密仪器与运输设备等产业的进口则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中韩贸易的十大产品变化也反应了这种中韩进出口产业的变化（见表 1）。从中国进口角度而言，1992 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依次为钢铁、塑料制品、电机、电气及零部件、化学纤维短纤、锅炉与机械设备等、有机化学品、生皮与皮革、人造纤维长丝、纸与纸浆、矿物燃料与矿物油等。2007 年，生皮与皮革、人造纤维长丝、纸与纸浆等不再是中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产品，逐渐被车辆及其零件、铜及其制品、铝及其制品等产品取代。到了 2021 年，无机化学品与贵金属等、精油与香膏等产品新列入十大主要进口产品。从中国向韩国出口角度而言，1992 年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依次为谷物、矿物燃料与矿物油等、化学纤维短纤、盐、硫磺、石料与水泥、蚕丝、钢铁、棉花、电机、电气及零部件、动物饲料、有机化学品等。2007 年，谷物、盐、硫磺、石料与水泥、蚕丝、棉花、动物饲料等产品退出十大出口产品之列，取而代之的是非针织服装、家具与灯具、光学设备与精密仪器等产品。2021 年，车辆及其零件、塑料制品、钢铁制品等产品列入主要出口产品。

在这 30 年间，中韩贸易产品结构出现明显变化。1992 年两国建交时，中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谷物、棉花、蚕丝、盐、硫磺、石料与水泥、动物饲料等，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化，产业内贸易替代了产业间贸易，两国进出口十大产品已经相互重叠。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中韩产业之间的部分互补性转化为竞争性关系。中韩之间的贸易产品结构也随着这种变化发生重大改变。韩国仍在电子电气、石油制品、化学制品以及金属制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该类产业比重仍然在增长或者维持稳定水平，但像液晶显示器（LCD）、无线通

^①国家统计局：《2021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106837 元》，国家统计局网站，2022 年 5 月 20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5/t20220520_1857628.html。

^②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笔者将 HS 编码商品分类重新进行分类、合并后计算而得。

表 1 1992—2012 年中韩贸易的十大产品变化情况

排名	中国进口			中国出口		
	1992 年	2007 年	2021 年	1992 年	2007 年	2021 年
1	钢铁	电机、电气及 零部件	电机、电气及 零部件	谷物	电机、电气及 零部件	电机、电气及 零部件
2	塑料制品	锅炉与机器等	锅炉与机械 设备等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钢铁	锅炉与机器等
3	电机、电气及 零部件	光学设备与 精密仪器	塑料制品	化学纤维短纤	锅炉和机器等	钢铁
4	化学纤维短纤	有机化学品	有机化学品	盐、硫磺、石料 与水泥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无机化学品 与贵金属等
5	锅炉与机械 设备等	塑料制品	光学精密仪器	蚕丝	非针织服装	有机化学品
6	有机化学品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钢铁	钢铁制品	塑料制品
7	生皮与皮革	车辆及其零件	精油与香膏	棉花	铝及其制品	钢铁制品
8	人造纤维长丝	钢铁	铜及其制品	电机、电气及 零部件	光学设备与 精密仪器	光学设备与 精密仪器
9	纸与纸浆等	铜及其制品	钢铁	动物饲料	有机化学品	家具与灯具
10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铝及其制品	无机化学品与 贵金属等	有机化学品	家具与灯具	车辆及其零件

资料来源：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的 K - Statistics。

注：以上产品按照 HSK2 位码分类。

信仪器等方面，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大幅提升，韩国在这些领域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下降趋势。

二、中韩贸易的结构性特点

（一）中韩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

中韩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是中韩经贸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中韩建交 30 多年来，两国加强经贸合作与交流，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韩国对中韩贸易的依存度呈现出持续提升的特点，而中国对中韩贸易的依存度则呈现出先提升后又缓慢下滑的特点。1992 年中韩贸易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只有 4.0%，之后该比重持续提升。2003 年韩国对华出口额达到 431 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对美国出口，中国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韩国对华贸易额也首次超越对美贸易额，中国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此后，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持续加深，2018 年上升至 25.2%，到 2020 年仍然高达 24.6%。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半导体、面板和合成树脂等产品，对中国的平均依存度达到 30.8%。相比之下，中韩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出现上升趋势，但其幅度明显小于它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变化幅度。1992 年中韩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为 4.2%，2020 年提升至 6.1%。中韩贸易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也引发

了韩国产业界对自身产业安全 and 发展的担忧，这也成为韩国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原因。

（二）从原材料到中间品的贸易模式

中韩两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贸易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矿物燃料、化学纤维短纤、人造纤维长丝等初级产品和原材料。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纤维原料、石化制品、钢铁制品等，中国则向韩国出口农产品、纺织品、矿物燃料和钢铁制品。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电子电气产品的贸易迅速扩大，计算机及手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成为重要贸易产品。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由以原材料为中心转向以零部件与中间品为中心，产品也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进入 21 世纪之后，韩国向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与汽车零部件大幅增加，助推中国成为电子产业的世界加工组装中心。中国向韩国的出口中，中间品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48.6% 增至 2021 年的 64.5%；中国从韩国的进口中，中间品的比重也从 1992 年的 74.1% 增至 2021 年的 80.1%。中韩贸易中的这种特征也反映在加工贸易比重上。2020 年中国从韩国的进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达 39.6%，是中国全部进口中加工贸易比重 19.6% 的 2 倍。^① 如果把进口原材料的保税区加工计算在内，该比重将更大。虽然自 2000 年开始，中国的加工贸易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但中韩之间的投资—生产—出口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中韩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在过去 30 年里，中韩各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也发生重大变化（见图 2）。整体上，中国对韩国的贸易中，贸易竞争力指数呈逐渐上升趋势。1992 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指数为 -0.01，2010 年上升至 0.023，2020 年达到 0.142。从具体产业领域看，2020 年中国具有贸易竞争力的产业为其他制造业、农林水产业、纤维制品、其他轻工业、运输设备等，其贸易竞争力指数分别为 0.91、0.84、0.69、0.53、0.36。上述几个产业之中，除了农林水产业之外，在 1992 年建交初期，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明显负数或者几乎等于零。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贸易竞争力从弱势转为强势。此外，化学制品、金属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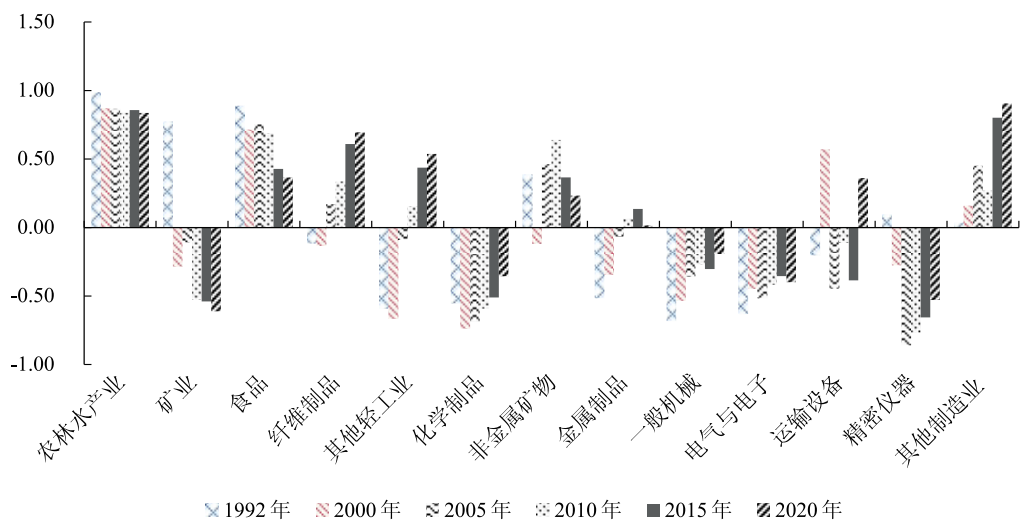


图 2 1992—2020 年中韩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作者自行计算而得。

①[韩] 金善金、李允静：《对华出口的结构性特征和启示》，《BOK Issue Note》，2021 年第 28 期，第 9 页。

一般机械、电气与电子等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也出现大幅上升。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竞争力下降的产业包括矿业、食品、非金属矿物、精密仪器等。对中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黄春山、李天国，2020）表明，近些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于韩国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这也体现了技术进步在中国制造业改造与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2017 年 8 月，美国宣布对中国重启“301 条款”调查，并在 2018 年 6 月正式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货物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美国又接连发布了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进一步激化了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深，对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图 3 为 1993—2021 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增长率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中韩两国贸易额同步性明显。在中韩两国建交初期，两国出口同步性并不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步性越来越增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率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率非常接近，可见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将对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产生重要影响。根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韩贸易产生直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华出口额中占 47% 的信息技术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值得关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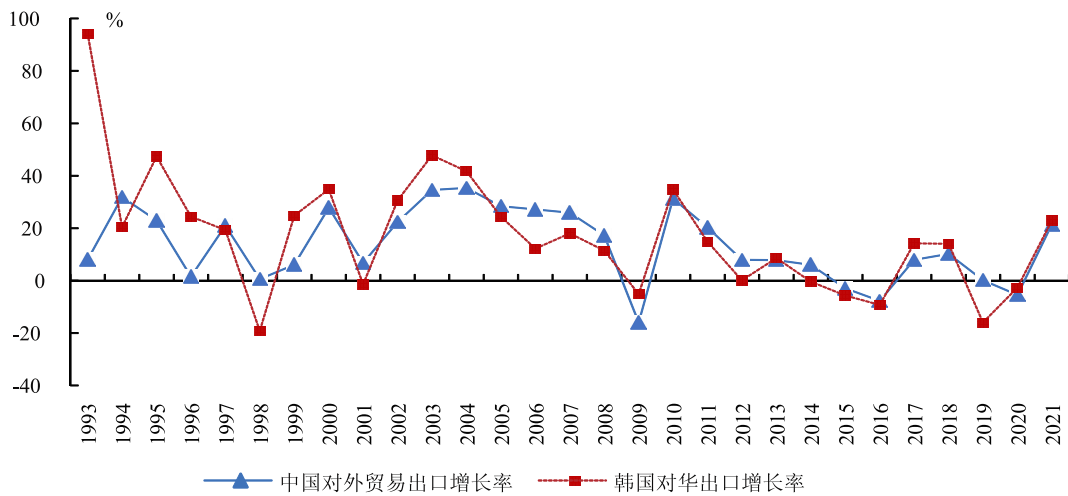


图 3 1993—2021 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率与韩国对华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1993—2020 年数据来自 UN Commtrade 数据库，2021 年中韩出口数据来自两国政府官网。

中美两国是韩国的最重要的两大贸易伙伴，韩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考虑到中韩两国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中美贸易摩擦必然影响中韩贸易，并会波及韩国的经济增长。很多在华韩资企业在加工和生产过程中，自韩国大量进口中间品，并向欧美等市场出口最终产品。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进行贸易调查的企业商品中涉及韩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和中间品。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也将受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的直接影响。当前，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加工与保税贸

^① [韩] Pyoung Seob Yang, Jiwon Choi: 《美中摩擦的主要争议点与韩中经济合作方向》，《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报告 21 - 03》，2021 年，第 115 页。

易比重达到 65.8% ,^① 因此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也会让韩国企业受到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如果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的 10%,中国的中间品需求也将相应下降,韩国对华的出口将减少 0.25%。

韩国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受制裁相关商品出现下降趋势。2016—2019 年韩国的对华出口额年均增长 3.1%,但美国对华实施贸易制裁后,韩国的对华出口额下降 16%。如表 2 所示,2017 年美国对华实施制裁之后,第一轮和第二轮制裁商品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并没有出现下降,但在随后的第三轮和第四轮制裁之下,韩国对华出口的相关商品出现明显下降。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中间品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而中韩产业间的贸易则具有较强灵活性,在两国贸易中的比重也相对小,因此受到的影响比较有限。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行为促使韩国部分企业研究调整产业链布局方案。

四、中韩经贸关系展望

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韩两国在过去的 30 年里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并且取得可喜的成就。未来中韩两国仍有很多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中韩两国要在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第一,中韩要继续拓展合作制度框架,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形成更加牢固的经贸关系。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暴露了产业链的脆弱性,引发各国对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反思,不少国家开始重构产业链(李天国、沈铭辉,2020)。国际上出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对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沈铭辉、李天国,2020)。中韩两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更加清楚地了解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损害各国利益,要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继续扩大市场开放,充分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作用,加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整合区域内资源,形成更加牢固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李天国,2021)。

第二,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将继续影响中韩经贸关系。当前,美国推进制造业复兴计划,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或排他性的经济合作框架来干扰正常贸易秩序,企图改变东亚生产网络的制度约束,促使全球产业链布局加速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对华企业实施制裁的同时,又启动“印太经济框

表 2 2017—2019 年韩国向中国出口受制裁商品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第一轮受制裁商品	第二轮受制裁商品	第三轮受制裁商品	第四轮受制裁商品
2017	第一季度	0.0024	35.9	131.8	8.1
	第二季度	0.0002	31.6	121.9	6.5
	第三季度	0.0012	33.5	134.1	7.7
	第四季度	0.001	40.7	132.9	9.1
2018	第一季度	0.0055	39	126.4	8.6
	第二季度	0.0049	41.6	139.1	9.1
	第三季度	0.0043	41.9	147.9	8.7
	第四季度	0.0011	39.9	137.2	7.4
2019	第一季度	0.0024	33.5	123	7.3
	第二季度	0.0033	33.8	125.1	7.4
	第三季度	0.0013	34.2	118.1	7.1
	第四季度	0.0071	38.8	119.1	7.8

数据来源:[韩]金秀东、薛允、姜知铉、冰贤志、郑善仁:《美中贸易战带来的通商政策变化与产业波及效果》,韩国产业研究院,2020 年。

①[韩]金恩英、郑慧善:《中美通商争端的进展方向与对我国出口影响》,《Trade Focus》,2017 年第 6 期,第 26 页。

架”，旨在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单向的贸易安排。“印太经济框架”强行制定对美国有利的规则，并非是一个双向让渡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试图在高新技术领域构筑一个封闭和对抗性的供应链体系，在战略上带有明显的遏制、针对中国的意图。目前，“印太经济框架”的启动与 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存，形成互相涵盖、互相竞争的“三足鼎立”之势。韩国方面表示，将努力避免相关事宜与国家安全挂钩，为与中方建立互相尊重关系并扩大双边利益全力以赴。中韩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意味着中韩关系已经超越简单双边关系层次，两国可以共同探讨地区及世界范围的多边问题、战略性中长期合作问题（李春福，2022）。未来，中韩有必要继续加强互信，冲破各种阻力与干扰因素，开拓面向未来的中韩经贸关系。

第三，中韩两国有必要根据现实需要，探索中韩经贸关系新模式。数十年来，中韩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基于中韩两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互补关系。但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在一些产业组装加工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被削弱。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一些韩国中小企业考虑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突飞猛进，中国企业正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进发，中国在东亚区域内部的“上游供给者”地位不断提高（葛阳琴、刘晴，2020），在很多产业领域正在快速地赶超韩国，而这种东亚区域分工体系重构对中韩贸易产生影响。近些年，韩国对华投资的新增企业数量出现减少现象，但韩国企业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却在稳步上升，两者形成明显的对比。新冠疫情、生产成本以及技术进步改变了东亚国家外部约束条件，新的东亚区域分工体系呼之欲出。东南亚将成为新的世界组装工厂，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将持续提升，变成一个全套型全球制造中心（刘洪钟，2020）。面对这种变化，中韩有必要积极调整经贸合作思路，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加强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持续挖掘两国产业合作互补性，充分利用日益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模式。中韩两国也有必要加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在投资、服务贸易、金融、市场准入等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不断升级中韩产业合作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 梁亚滨：《中韩建交 30 年：现状、问题与未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 年第 2 期。
2. 黄春山、李天国：《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韩制造业生产率比较》，《生态经济》，2020 年第 2 期。
3. 李天国、沈铭辉：《疫情危机下东亚生产网络协调机制与合作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4. 沈铭辉、李天国：《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区域合作》，《当代世界》，2020 年第 8 期。
5. 李天国：《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的角色》，《中国发展观察》，2021 年第 24 期。
6. 李春福：《建交三十周年的中韩关系：成果、机遇与挑战》，《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1 期。
7. 葛阳琴、刘晴：《东亚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基于区域内外生产关联的视角》，《亚太经济》2020 年第 6 期。
8. 刘洪钟：《超越区域生产网络：论东亚区域分工体系的第三次重构》，《当代亚太》，2020 年第 5 期。
9. [韩] 金善金、李允静：《对华出口的结构特征和启示》，《BOK Issue Note》，2021 年第 28 期。
10. [韩] 金秀东、薛允、姜知铉、冰贤志、郑善仁：《美中贸易战带来的通商政策变化与产业波及效果》，韩国产业研究院报告，2020 年。
11. [韩] 吴来恩、李洪裴：《中韩出口竞争力变化与结构特征考察》，《中国地域研究》，2022 年第 1 期。
12. [韩] 金恩英、郑慧善：《中美通商争端的进展方向与对我国出口影响》，《Trade Focus》，2017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郭 霞

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对华影响及政策建议

——基于各成员国对中美贸易投资状况的对比分析

董惠梅 刘 丹 曹怡婷 刘 琪

摘要：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印太经济框架服务于整个印太战略。美国希望通过在互联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及公平的经济四个领域，建立新的规则及标准，以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塑地区分工新格局。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均高于美国，中国对各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整体呈增长态势，但从进出口依赖度、进出口品类结构、直接投资依赖度、直接投资行业结构领域看，各成员国出于各自利益考量或因各国资源禀赋不同，美国更具优势，但中美差距日趋缩小。随着美国强力推进，若在不同领域达成协议，将对中国传统贸易产生替代效应，对数字贸易竞争力产生遏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各成员国对中国的依赖，并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性“脱钩”。为此，中国应在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积极促进区域融合，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基础上，鼓励科技自主创新，以最大限度降低其可能造成的冲击。

关键词：印太经济框架 中美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开放

作者简介：董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 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曹怡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 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进入 21 世纪，在太平洋地区依然保持传统地缘优势的同时，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季慧、魏丽，2019）。在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等多方助推下，“印太”（Indo - Pacific）这一概念作为地缘政治的产物在世界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印太”正式成为美国的区域战略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但是当时的“印太”战略因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原因，导致战略缺乏区域制度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并且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支持和充足的资源投入，收效甚微。自拜登任美国总统以来，“印太”战略逐步推进落实。2021 年 10 月，拜登在出席第 16 届东亚峰会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构想。2022 年 2 月，酝酿已久的《美国印太战略》发布，其重点是军事安全。2022 年 5 月 12 日至 13 日，推迟了两个月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召开。期间，拜登重提 IPEF，宣布拨款 1.5 亿美元协助东盟国家发展清洁能源、推动教育，以及加强海事安全和卫生防疫工作。美国也将借此次峰会之际向东盟展示其对该地区持久的承诺。2022 年 5 月 20 日起，拜登开始任期内的首次亚洲行，访问韩国和日本。5 月 23 日，拜登在访问日本时正式宣布启动 IPEF。美国、

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和文莱 13 国成为 IPEF 的初始成员。5 月 26 日，斐济加入 IPEF。仅就 IPEF 的初始成员国而言，其中既有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也有增长快速、充满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 32% 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 GDP 总量的 40%。IPEF 的提出，表明美国政府对印太地区经济价值的高度重视，希望通过利用东南亚国家较低的生产成本，寻求产业链多元化，同时达到削弱各成员国对中国经济依赖的目的。IPEF 可以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一、IPEF 的目标及主要内容

IPEF 的具体方案虽然仍在谈判中，但目前发布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已经明确了 IPEF 的目标和大体内容。《声明》指出，IPEF 旨在增进成员国经济的韧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公平性和竞争力，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公平、包容、互联互通、有韧性、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① 从《声明》涉及的内容来看，作为一项非传统的经济协定，IPEF 由四项支柱内容构成。

支柱一是贸易，即互联的经济。IPEF 成员国将就广泛的国际贸易问题展开合作，通过建立高标准、包容、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承诺，以及制定新型的贸易和技术政策，推动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造福劳动者和消费者，最终创造一个更加互联互通且有韧性的经济。美国贸易代表 Katherine Tai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贸易合作的具体领域，包括数字经济和新兴技术、劳工承诺、环境、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和良好的监管实践、企业责任六大领域。其中，数字经济在当今世界市场上作用突出，对工人、消费者和企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是 IPEF 成员国进行贸易合作的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数字经济中存在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标准、在线隐私、歧视性和人工智能的不道德使用等问题，都是 IPEF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②

支柱二是供应链，即韧性的经济。缺乏韧性的供应链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新冠病毒感染对供应链的冲击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因此，IPEF 将首创供应链方面的承诺，致力于改善供应链的透明度、多样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使得供应链更具韧性、更加一体化。这就要求成员国协调危机反应措施，扩大合作以保证连续经营，提高物流效率和支持力度，确保关键原材料和加工材料、半导体、重要矿物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获取。

支柱三是清洁能源、去碳化和基础设施，即清洁的经济。实现清洁的经济将要求成员国在清洁能源、去碳化和促进高薪工作的基础设施方面作出前所未有的承诺。此外，各国要在可再生能源、碳减排、能效标准和降低甲烷排放的新措施等领域加强合作，提高抵御气候影响的能力。^③

^①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on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The White House Website, 2022 – 5 –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②The White House. On – the – Record Press Call on the Launch of the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The White House Website, 2022 – 5 –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5/23/on-the-record-press-call-on-the-launch-of-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③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 – 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The White House Website, 2022 – 5 –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支柱四是税收和反腐败，即公平的经济。IPEF 成员国将在现有的多边义务、标准和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高效且有力的税收、反洗钱和反贿赂制度，从而有效遏制印太地区的逃税和腐败行为，促进经济公平公正。

二、IPEF 成员国与中美贸易状况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 2012—2021 年 IPEF 成员国（美国除外）的进出口数据，从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贸易依赖度、贸易结构三方面分析成员国与中美贸易状况，数据来源为 UNComtrade 数据库。

（一）IPEF 成员国与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比较

出口方面（见图 1），IPEF 大部分成员国对中国出口总额比对美国出口总额更大。从 2012—2021 年成员国对中国出口总额与对美国出口总额比率^①的平均值来看，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这一比率平均分别为 30.99、8.63、2.26 和 2.01，这说明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对中国出口远高于对美国出口。另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总额也相对更高。在除美国外的 13 个成员国中，只有斐济、印度、越南和菲律宾对美国出口总额大于对中国出口总额，并且这些国家的中美出口总额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尤其是近年来越南对美国出口总额增长迅速。这意味着斐济、印度、越南和菲律宾对中美两国的出口存在一定“替代效应”。2019 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总额（1405 亿美元）稍高于对中国出口总额（1346.7 亿美元）；2020 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总额降至 11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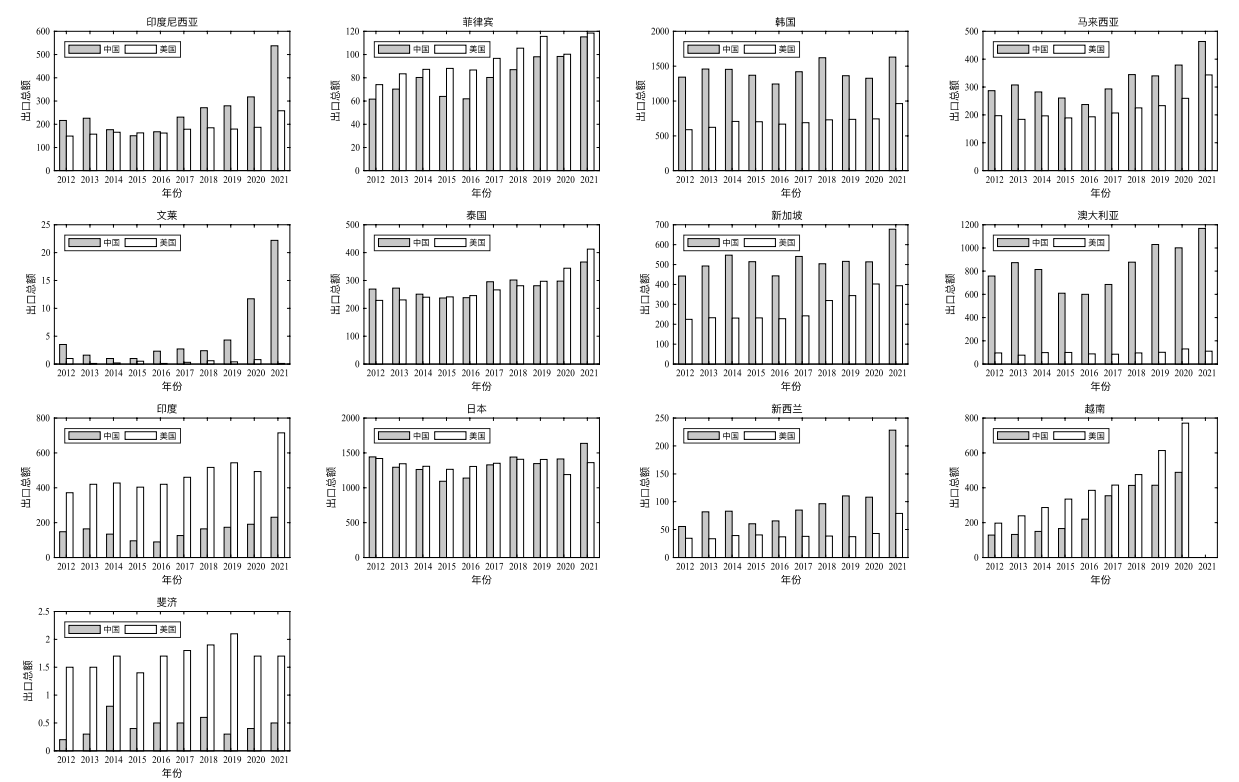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21 年 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总额（亿美元）

①i 成员国 t 年对中国出口总额与对美国出口总额比率 = i 成员国 t 年对中国出口总额 / i 成员国 t 年对美出口总额。

亿美元，而对中国出口总额则增长至 1410 亿美元；到 2021 年，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仍然高于对美国出口总额，这可能是新冠疫情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

进口方面（见图 2），IPEF 成员国对中国进口总额均高于对美国进口总额。从 2012—2021 年成员国对中国进口总额与对美国进口总额比率^①的平均值来看，越南、斐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比率的平均值较高，都在 3 以上，即平均来看这 4 个成员国对中国进口总额是对美国进口总额的 3 倍以上，其中越南更是达到 6.09 倍。就 2021 年而言，IPEF 成员国中（除美国和越南），从中美进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依次是日本和韩国，占成员国（除美国和越南）对中美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 42.77% 和 48.62%。此外，2021 年成员国（除美国和越南）整体对中国进口总额为 7581.8 亿美元，对美国进口总额只有 3221.5 亿美元，对美国进口总额不到对中国进口的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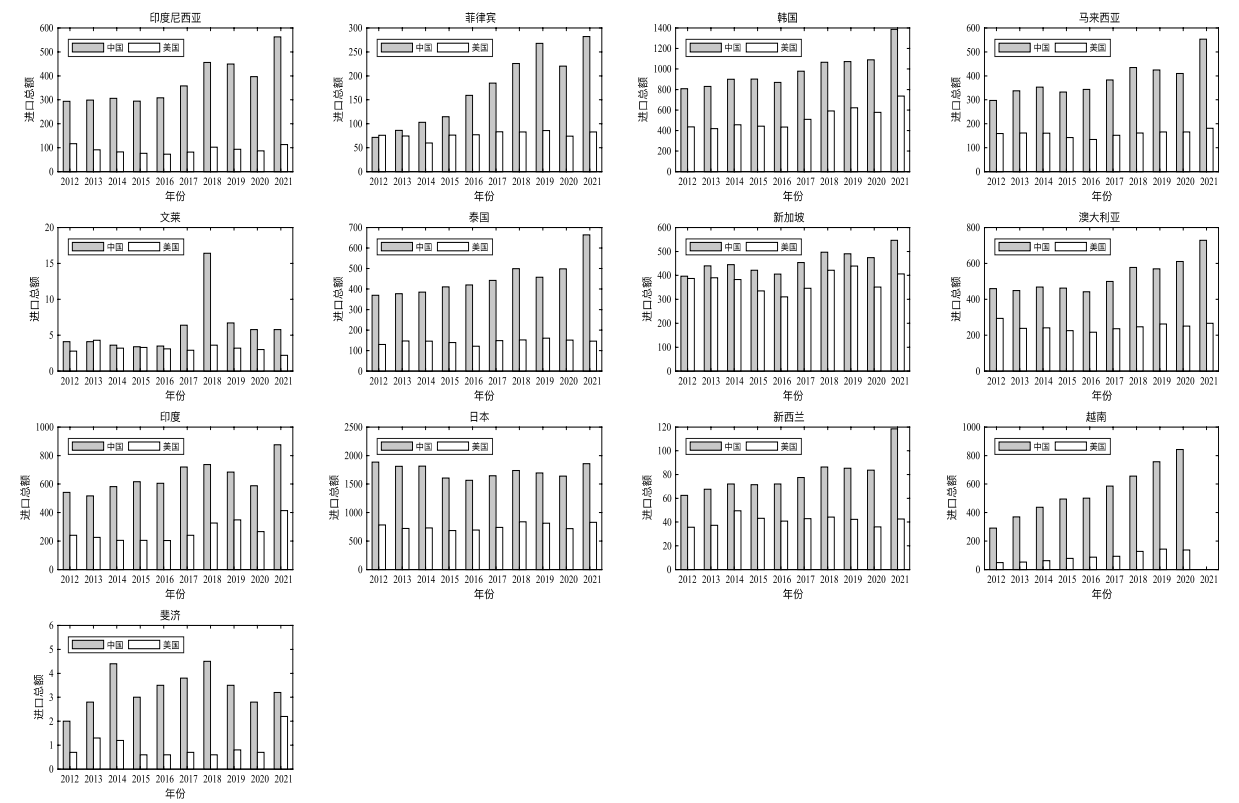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21 年 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进口总额（亿美元）

（二）IPEF 成员国与中美两国的贸易依赖度比较

比较 IPEF 各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依赖度发现（见图 3）：第一，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文莱对中国出口依赖度更高，澳大利亚 2019—2021 年对中国出口依赖度平均值更是高达 37.89%。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和文莱对中国出口依赖度上升趋势明显，对中美出口依赖度差距逐年拉大；其他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依赖度变化稳定，依赖度差距波动不大，其中澳大利亚和韩国始终对中国保持较高的出口依赖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口虽然也更依赖中国，但对中美的依赖度差距不大。第二，越南、斐济、印度和菲律宾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更高。印度、越南和斐济对中美出口依赖度差距较大，且近年来有扩大趋势。菲律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自

①i 成员国 t 年对华进口总额与对美进口总额比率 = i 成员国 t 年对中国进口总额 / i 成员国 t 年对美进口总额。

2015 年以来，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逐年稳步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变化趋势不明显，对中美依赖度差距逐渐缩小，截至 2021 年，菲律宾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依赖度已极为接近。第三，泰国和日本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依赖度不相上下。2018 年以来，泰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依赖度均逐年提高，而日本从 2015 年起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缓慢降低，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则呈现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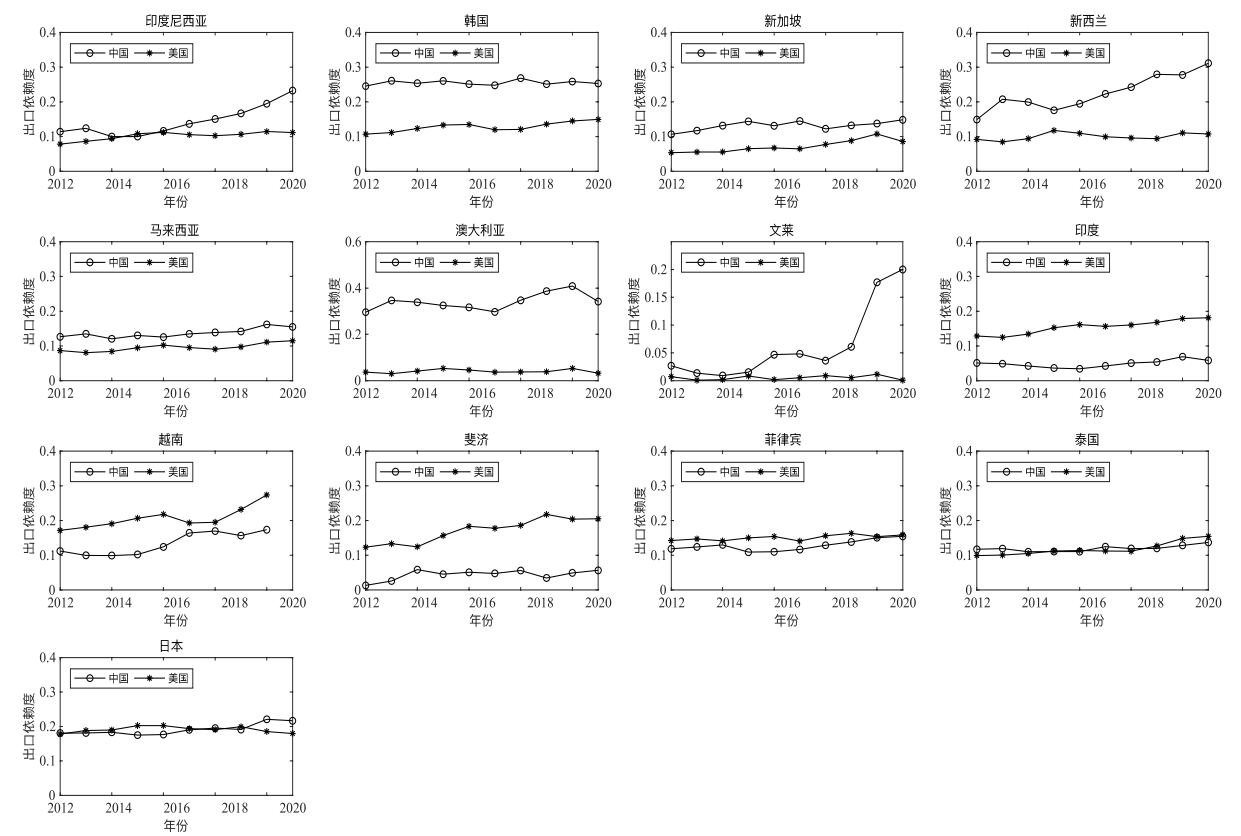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21 年 IPEF 成员国对中美出口依赖度比较 (%)

比较 IPEF 各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进口依赖度发现（图 4），各成员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均高于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都在 20% 以上，相对其他成员国更高。2017—2021 年，越南对中国进口依赖度最高，为 29.29%，而其对美国进口依赖度只有 5.18%。从各成员国对中美两国进口依赖度的差距来看，新加坡的差距始终较小，且 2015 年至今新加坡对中美两国的进口依赖度都没发生明显变化。与新加坡情况相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显著大于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且依赖度差距正在扩大。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发展中成员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的平均增速高于发达成员国；其中，2012—2021 年菲律宾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提高最快，年平均增长 8.74%。

（三）IPEF 成员国与中美贸易品类结构分析

本文根据联合国第四版《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将 IPEF 成员国进出口产品划分为消费品、中间品、资本品和其他产品，并根据成员国对中国（或美国）某类产品的进口（或出口）占该成员国对中国（或美国）总进口（或总出口）的比重计算 2017—2021 年 IPEF 成员国与中美两国的贸易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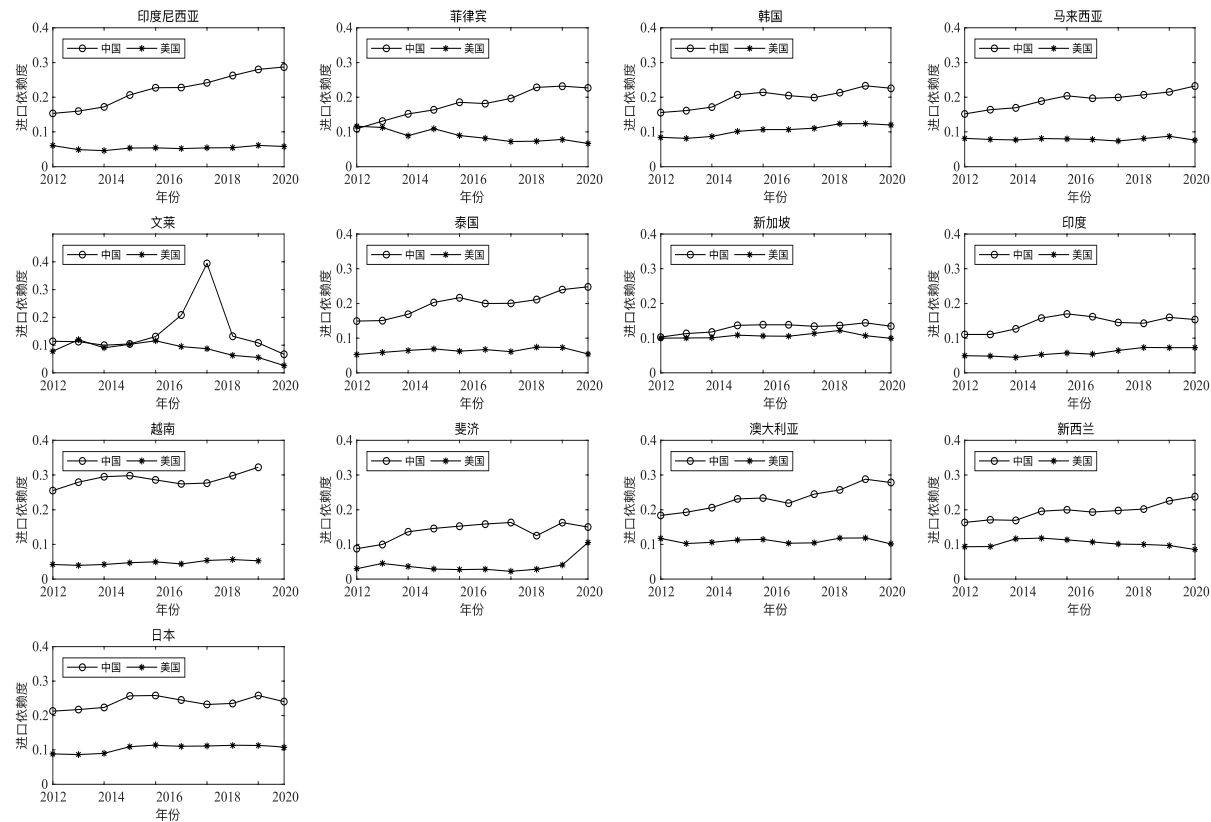


图 4 2012—2021 年 IPEF 成员国对中美进口依赖度比较（%）

类结构。

首先分析 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品类结构（见表 1）。消费品出口方面，越南、新西兰和印度尼西亚对美国出口中消费品占比超过 50%，印度、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对美国出口中也有超过 20% 的消费品。相比于美国，成员国对中国的出口中消费品占比普遍不高，只有新西兰的占比达到 57.97%，其次是越南和泰国，消费品占比分别为 20.08% 和 18.50%，其他成员国对中国出口中消费品平均只占 5.48%。对比来看，新西兰对中美出口都以消费品为主，这是因为新西兰主要出口乳制品、肉类和木材等消费品。此外，除了日本，其他成员国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比例都比对中国的低。中间品出口方面，成员国对中国出口以中间品为主，中间品占比平均高达 72.35%，而对美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平均为 43.72%。这一方面反映成员国对中国中间品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承接了成员国较多的中间产品加工制造，在供应链方面成员国与中国联系紧密，美国处于供应链的相对高端环节，所以成员国对美国出口中间品比重不高。资本品出口方面，成员国对美国出口资本品的比重更高，平均份额为 18.04%。

其次分析 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进口品类结构（见表 2）。第一，发展中成员国（除文莱外）对中美两国进口的 50% 以上是中间品，且对美进口的中间品份额更高，超过 70%。其中，越南从美国进口中间品的比重最高（82.14%），其次是印度（81.79%）和马来西亚（80.90%）。越南从美国进口钢铁、肥料、石油产品、金属、电线和电缆等中间品，加工成机械设备、纺织品和电子零件等产品出口到中美及其他国家。第二，不同于发展中成员国，发达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进口结构并非单一的以中间品为主。一方面，中间品、消费品和资本品三类产品进口份额相对均衡的成员国有澳大利亚、

日本和新西兰；另一方面，韩国和新加坡从中美进口中间品份额较大。韩国和新加坡从中美两国进口机电和其他中间品，通过结合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并销往其他国家。

表 1 2017—2021 年 IPEF 成员国对中美出口产品的品类结构 单位：%

成员国	对中国出口产品			对美国出口产品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澳大利亚	5.77	85.10	0.71	33.01	51.01	11.63
文莱	0.19	92.56	2.10	19.46	58.67	4.68
印度	5.97	75.79	4.61	38.01	46.72	4.80
印尼	7.82	89.87	0.97	51.88	35.58	6.80
日本	5.25	59.44	24.41	4.70	39.95	22.00
马来西亚	3.96	83.47	8.58	21.35	49.05	29.05
新西兰	57.97	33.41	1.19	53.93	28.88	15.25
菲律宾	8.52	65.96	25.09	21.21	51.69	26.76
韩国	4.34	75.71	15.54	6.67	49.70	18.45
新加坡	7.50	70.30	15.20	15.38	56.47	23.25
泰国	18.50	68.06	9.81	28.52	38.57	29.39
越南	20.08	68.56	9.89	56.83	18.34	24.43

注：根据联合国第四版《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消费品代码为 61、62、63、112、122、522；中间品代码为 21、22、31、42、53、111、121、322；资本品代码为 41、52。越南 2021 年的进出口数据未更新。本表未展示 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其他产品的出口份额。

表 2 IPEF 成员国对中美进口产品的品类结构 单位：%

成员国	对中国进口产品			对美国进口产品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澳大利亚	29.74	33.55	32.64	19.46	41.63	31.09
文莱	12.24	57.51	21.38	7.08	68.71	20.63
印度	6.86	66.95	25.41	6.33	81.79	10.71
印尼	12.16	60.45	26.68	8.11	79.56	10.99
日本	29.49	37.44	31.40	19.26	61.43	15.28
马来西亚	12.42	58.69	22.33	6.41	80.90	11.45
新西兰	32.50	33.83	31.57	21.84	46.93	24.08
菲律宾	15.46	57.46	16.99	12.31	77.55	9.17
韩国	13.85	63.57	21.89	13.80	61.96	18.85
新加坡	8.88	48.41	30.45	6.70	69.99	18.28
泰国	11.79	56.31	30.60	10.09	70.57	13.75
越南	6.69	73.69	18.49	10.29	82.14	6.80

注：根据联合国第四版《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消费品代码为 61、62、63、112、122、522；中间品代码为 21、22、31、42、53、111、121、322；资本品代码为 41、52。越南 2021 年的进出口数据未更新。本表未展示 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其他产品的进口份额。

三、IPEF 成员国与中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分析

（一）中国对 IPEF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分析

由 2011—2020 年中国对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可知（见表 3），除个别国家外，中国对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对马来西亚、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扩大趋势较明显。其中，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流量从 2011 年的 0.95 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3.7 亿美元，增长高达 13.4 倍；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流量增长次之。2016 年 10 月中国与菲律宾签署《中国与菲律宾联合声明》，伴随中菲关系改善，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流量也从 2016 年起呈现增长态势，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建特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对接下，经贸合作蓬勃发展。近年来，受国际关系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个别国家的投资流量有所降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流量从 2017 年的 31.65 亿美元下降至 2020 年的 12 亿美元，最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无端设限，挫伤了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的信心。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在奥巴马时期快速增长，但在 2017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大幅缩减。由于缺乏美国数据，本部分内容仅对各成员国对中国投资依赖性变化趋势做简单分析。

表 3 2011—2020 年中国对 IPEF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流量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国	文莱	印度	印尼	越南	斐济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2011	267.19	95.13	230.11	20.11	180.08	592.19	189.19	19.63	341.72	149.42	3268.96	1811.42	3165.29	27.89
2012	74.90	199.04	478.60	0.99	276.81	1361.29	349.43	68.32	942.40	210.65	1518.75	4047.85	2172.98	94.06
2013	54.40	616.38	755.19	8.52	148.57	1563.38	480.50	58.32	268.75	434.05	2032.67	3873.43	3457.98	190.40
2014	224.95	521.34	839.46	-3.28	317.18	1271.98	332.89	-37.16	548.87	394.45	2813.63	7596.13	4049.11	250.02
2015	-27.59	488.91	407.24	3.92	705.25	1450.57	560.17	12.40	1324.55	240.42	10452.48	8028.67	3401.31	348.09
2016	32.21	1829.96	1121.69	142.10	92.93	1460.88	1279.04	44.61	1148.37	344.01	3171.86	16980.81	4186.88	905.85
2017	108.84	1722.14	1057.59	71.36	289.98	1682.25	764.40	17.06	660.80	444.05	6319.90	6425.49	4241.96	596.61
2018	58.82	1662.70	737.29	-15.09	206.20	1864.82	1150.83	16.23	1033.66	468.41	6411.26	7477.17	1985.97	257.46
2019	-4.29	1109.54	1371.91	-4.05	534.60	2223.08	1648.52	17.46	561.80	673.78	4825.67	3806.68	2086.67	11.40
2020	130.43	1374.41	1882.88	16.58	205.19	2198.35	1875.75	22.80	139.14	486.83	5923.35	6018.67	1198.59	0.16

数据来源：《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IPEF 成员国对中美的投资依赖性比较

本文利用中美两国对 IPEF 各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 IPEF 各成员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值反映 IPEF 成员国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见图 5）。数据比较可知：除了缺少对美国投资依赖度数据的文莱、越南和斐济外，其他成员国对美国的投资依赖度都高于对中国的投资依赖度。其中，2018—2020 年，对美国投资依赖度最高的两个成员国依次是日本和澳大利亚，3 年的依赖度平均值分别为 53.24% 和 22.45%；此外，新加坡、韩国和新西兰对美国的投资依赖度也都在 10% 以上，对美国投资依赖度最低的国家是菲律宾，为 5.62%。相比于美国，IPEF 成员国对中国的投资依赖度较低。对中国投资依赖度最高的两个成员国依次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3 年的平均依赖度分别为 6.52% 和 5.37%，中国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投资来源国、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国。对中国投资依赖度最低的国家同样是菲律宾，不到 1%。从趋势来看，从 2015 年起，IPEF 成员国对美国的投资依赖度都有或多或少的降低趋势。成员国对中国的投资依赖度虽然不及对美国的高，但除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外的大部分成员国对中国的投资依赖度都在上升，其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投资依赖度提高最快，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依赖度在 2020 年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依赖度。由此可见，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投资依赖度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对中国的依赖度正在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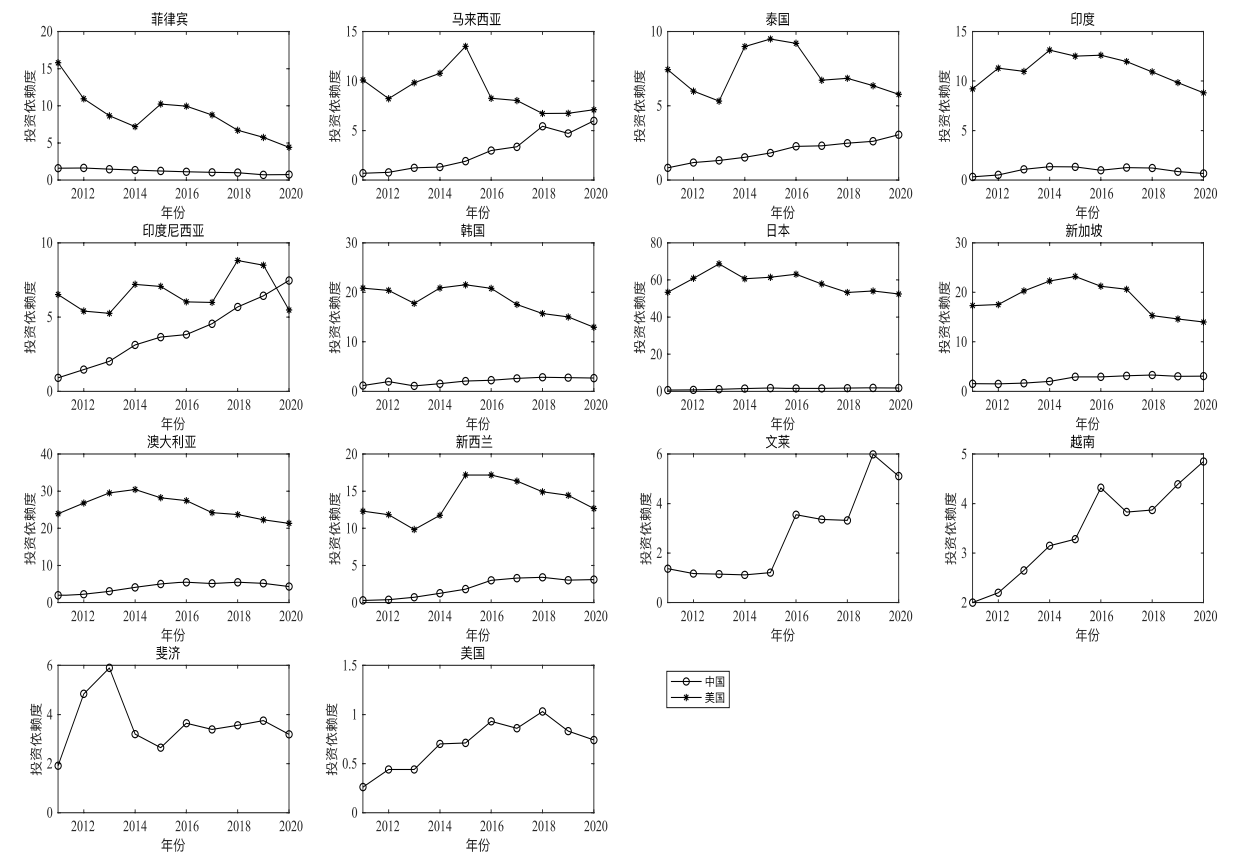


图 5 2011—2020 年 IPEF 成员国对中美投资依赖程度 (%)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源于《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鉴于数据可获得性，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用基于历史成本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表示，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成员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来源于 UNCTAD 的 FDI/MNE 数据库。

（三）中美对 IPEF 各成员国投资结构分析

从存量角度分析中美两国对 IPEF 成员国的投资领域。截至 2020 年末，中国对 IPEF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集中在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占对 IPEF 成员国投资存量的 80.61%。从行业结构看，中国对 IPEF 成员国的投资整体上集中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异。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有 29.3% 投向制造业，14.6% 投向金融业，11.6% 投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是中国对新加坡投资的前两大行业。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主要投向采矿业（46.8%），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3.8%）和金融业（10.1%）。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对 IPEF 成员国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① 2021 年，美国对 IPEF 成员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主要投向非银行控股公司、制造业、金融（存款机构除外）和保险行业等，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以电脑和电子产品制造、化学品制造等高端制造为主。具体而言，美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的 60.63% 投向非银行控股公司，12.64% 投向制造业，且对制造业的投资中 51.12% 是电脑和电子产品制造。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也以非银行控股公司为主，占比 52.69%；此外，澳大利亚农牧业发达、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制造业（其中 38.77% 是食品制造）和采矿业也是美国的主要投资领域。美国对日本的投资以金融（存款机构除外）和保险行业为主，占比 44.95%；其次是制造业和信息行业，分别占比 23.94% 和 8.91%。印度是美国投资最多的发展中成员国，美国对印度的投资 34.21% 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其次是制造业（21.28%）和信息行业（15.31%）。^② 对各成员国的投资因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存在差异。

四、IPEF 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与印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已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势头。IPEF 部分成员国在贸易的部分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度均高于美国；在投资领域，虽然对美国的依赖度较高，但对中国的依赖度在上升，IPEF 成员国对中美两国的投资依赖度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为该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开局顺利，而且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更是表明了中国与该地区持续深化合作的决心。但是，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IPEF 成员国对中美贸易、投资出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若美国全力推进 IPEF，并在相关领域达成协议，必将进一步对中国的贸易投资及区域影响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贸易领域

1. 在传统贸易领域，IPEF 通过提高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及企业责任产生部分替代效应

“宽松”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是一些国家竞争力间接提升的原因，也一度部分体现了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严格劳工和环境标准将会抑制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同时为中国产品设立新的、更高规格的市场准入门槛，由此将造成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同时也会造成中国向 IPEF 其他成员国出口的减少（陈靓，2022）。IPEF 成员国在中国总出口中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27.26% 增长到 2021 年的 28.18%，2019 年曾达到 28.86%，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区域市场，远远大于欧盟、美国 and 东盟在中国总出口中的比重。^③ IPEF 的推进大概率仍处于美国对华高关税壁垒的背景下，由此中国产品因高关税而无法进入的那部分美国市场，将在 IPEF 成员国中重新分配，若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将增强各成员国对美国在传统贸易领域的依赖，并进而冲击中国在这一区域的供应链，甚至是全球供应链的地位。

2. 数字贸易领域，通过制定更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提升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遏制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①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网站，2021 年 9 月 29 日，<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111/20211112140104651.pdf>。

②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2021 年基于历史成本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

③数据来源：HIS Market Connect 数据库。

数字经济作为各国未来竞争的新兴重点领域，其规则的制定直接关系各国数字经济的竞争力。针对中国在数字经济治理中施行的合理数据流动模式，美国将基于所谓开放原则，整合统一“印太”区域数字规则，推行高标准承诺，实现以所谓“民主价值观”为标准的“可信数据自由流动”，包括成员间原则上放开数据自由跨境，尤其是增加区域内与美国“志同道合伙伴”之间的数据流动（李莉，2022），试图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脱钩，并在印太区域将中国“孤岛化”，同时确保合作伙伴能够抓住机会，解决数字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定规则，掌握数字经济的主导权和制高点。若达成相关协议，必会贯彻美国的数据长臂管辖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围堵，制约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二）投资领域

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是 IPEF 的动机之一，也是美国推动 IPEF 的落脚点。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供应链弹性”，2021 年 2 月推出《供应链行政令》，完成针对国防、公共卫生、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交通以及农业等领域关键供应链评估报告，并且在七国集团（G7）、四国联盟（QUAD）、电信技术委员会（TTC）等多边和地区合作平台，将安全、人权等问题与供应链重塑等紧密结合。在此背景下，美国必将高度重视推进 IPEF 供应链支柱落地，由此将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格局产生影响。

1. 在战略性产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通过“控链”加强与主要成员国高科技产业链合作，对中国选择性“脱钩”

在 IPEF 框架下，美国加强与主要成员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合作，使中国面临更大的技术封锁压力。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统计，若按一国或地区半导体产业占全球比重超过 65% 计算，在芯片设计环节，韩国 DRAM 占主导地位；在芯片晶圆加工环节，韩国同时是先进工艺和成熟工艺主要加工方，韩国和日本在存储芯片领域占主导地位，在封装测试环节，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和韩国共占全球比重超 65%。日本是芯片制造的光刻胶、硅晶封装基板等主要装备和材料提供方。^① 美国通过加深与日本、韩国的合作，在确保半导体等关键材料供应链安全方面动作频频，如利用双边与多边机制来保障供应链安全，减少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在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业对中国形成全方位遏压，同时在重点领域形成国际合作分工新格局。

2.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通过“转链”使 IPEF 成员国有替代中国的新的选择，降低各成员国对中国的投资依赖，重塑地区分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推进 IPEF 就是让地区国家有“选择中国”之外的替代选项。美国通过与部分国家双边、多边频繁互动，确认合作范围、紧密信息共享、联合制定计划、快速双边磋商、引入私营部门等，鼓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减少在华投资，增强在其他成员国布局，进而将产业链条引导至对美国“友好”地区。同时通过强有力的环境及劳工标准，重塑地区分工。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各成员国对自身产业链安全需求上升，部分国家希望抓住机会，承接调整出中国的产业链，以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对于 IPEF 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中国应未雨绸缪，最大限度降低其可能造成的冲击。

第一，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美国期望通过更高标准的数字贸易、劳工及环境标准在“印太”区域引入新的竞争模式，并直接影响该地区的投资及贸易格局。

^①孙立鹏：《“印太经济框架”对华影响初评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2 年 7 月 29 日，<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d68e85df-9e98-47dc-8ad4-80c21526bae9>。

但是这些新的标准、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同时，并不一定能给其他发展中成员国带来切实的利益。因此，中国应继续扩大合作范围，拓宽合作领域，坚持多边治理，推动国际合作规则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立足 RCEP，积极加入 CPTPP，促进区域融合发展。积极推进由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区域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化解 IPEF 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一方面，高质量实施 RCEP。推动印太地区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并且进一步推进 IPEF 所不包含的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加入 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努力在数字经济、供应链贸易等前沿领域贡献开放包容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第三，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往来日益紧密。中国已与约 150 个国家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王卓，202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 1000 亿美元，投资集中于制造业、采矿业以及租赁商务服务业。其中，中国在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300 多亿美元。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9.4% 和 29%，高于中国全国引资增速。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要鼓励企业在与“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合作过程中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性与非机制性合作相结合，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也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网络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自贸区网络的良好平台，中国可充分借助这一平台实现与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接轨，以此提升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邢瑞利，2022）。为印太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四，在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基础上，鼓励科技自主创新。IPEF 核心指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应链安全，二是核心技术管控。美国希望借助 IPEF 加速对整个印太地区核心技术管控，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现状。^① 应对美国排斥中国供应链与中美技术竞争，一是寻找可能的突破口，通过加强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实现技术引进；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核心技术的自立自强，这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为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创造敢于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和政策氛围。

参考文献：

1. 季慧、魏丽：《“印太”概念的发展演进：从理论到实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 年第 22 期。
2. 陈靓：《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下的“印太经济框架”》，《国际展望》，2022 年第 6 期。
3. 李莉：《美国的印太数字经济外交：推进与前景》，《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 年第 2 期。
4. 王卓：《介于 TPP 和 CPTPP 之间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的另起炉灶、日本的追随与中国的应对》，《东北亚经济研究》，2022 年第 5 期。
5. 邢瑞利：《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动因及前景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22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李蕊

^①刘青：《“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思维的变与不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2 年 7 月 6 日，<http://ier.ruc.edu.cn/docs/2022-07/38f4e13ac05a4ea8ab86750b3f87e9b1.pdf>。

借助全球环境基金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周亚敏

摘要：全球环境基金运行 30 余年以来，在绿色技术转移、撬动公私融资、提升能力建设和构建环境认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作为全球环境基金最大的受援国家，在不同领域的项目实施中均取得了成功经验。中国同时也在积极承担发展中大国责任，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不断提高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力度。鉴于全球气候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形尚未得到扭转，在环境治理领域更加凸显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共同价值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前全球环境基金被发达国家所主导，在资金分配和议程设定上带有环境议题政治化色彩，不利于全球环境善治的实现。中国未来将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大国，将在议程与标准设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博弈中努力争取全球环境治理议程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化。借助全球环境基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通过观念层面的话语联接、实践层面的行动协同以及制度层面的兼容并包来实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环境基金 环境善治 绿色技术

作者简介：周亚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提出要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主张，凸显出环境议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资金机制和关键环节，应当且能够为全球环境善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迄今国内外对 GEF 的研究，或是总结 GEF 的成功经验，或是剖析过往增资期的政策，或是介绍 GEF 项目运行特点及成果，但缺乏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 GEF 所能发挥的作用。^①本文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GEF 项目的具体量化指标由西方国家制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多倚重经济收益的倾向。中国作为 GEF 项目实施较好的国家，是各类 GEF 项目青睐的投资地。应该利用好中国当前的市场权力，在 GEF 项目的评估和考核中加入于中国有利的指标。第二，中国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在 GEF 捐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中国自身需要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不断提高

^①于宏源：《全球环境基金与中国环境外交》，《当代亚太》，2006 年第 2 期，第 40 页；陈兰、王文涛等：《全球环境基金第七增资期政策分析与预测》，《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8 年第 2 期，第 201 页；马超德、赵新华等：《UNDP 与中国合作实施 GEF 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与经验》，《生物多样性》，2021 年第 2 期，第 212 页。

影响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推行的“毕业政策”也将促使中国更多捐资。因此，未来中国在提升捐资额度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自己的治理诉求，而环境议题是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话语的有力抓手。

GEF 运行 30 余年以来，在绿色技术转移、撬动公私融资、提升能力建设和构建环境认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作为 GEF 最大的受援国家，在不同领域的项目实施中均取得了成功经验。如何将这种成功经验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 GEF 第八增资期谈判进程和公布的文本，归纳其资金分配方向及可能影响，为中国借助 GEF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路和方案。

一、GEF 的历史回顾及最新进展

（一）历史回顾

GEF 成立于 1991 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具体执行。GEF 的宗旨是通过提供贷赠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改善气候环境的能力。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五个国际公约的资金机制，GEF 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此外，GEF 曾经与《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维也纳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多边基金互为补充，为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地区逐步淘汰臭氧层损耗化学物质发挥过积极作用。

目前 GEF 有 184 个成员国和 32 个理事国，中国是 GEF 的主要创始成员国和理事国，也是最大的受援国。^① GEF 每 4 年增资一次，增资资金来自 40 个捐赠国。自 1994 年重组以来，GEF 已进行了 7 次增资：第一增资期（GEF - 1，1994—1998 年）增资 20 亿美元；第二增资期（GEF - 2，1998—2002 年）增资 27.5 亿美元；第三增资期（GEF - 3，2002—2006 年）增资 30 亿美元；第四增资期（GEF - 4，2006—2010 年）增资 31.3 亿美元；第五增资期（GEF - 5，2010—2014 年）增资 42.5 亿美元；第六增资期（GEF - 6，2014—2018 年）增资 44.3 亿美元；第七增资期（GEF - 7，2018—2022 年）增资 40 亿美元。^② 第八增资期（GEF - 8，2022—2026 年）正处于谈判收尾阶段。

（二）主导国家

GEF 的治理模式是将捐资额度与话语权直接挂钩，因此极大激励了发达国家对 GEF 的持续捐款。根据 GEF 治理导则第 25 条，在协商一致未能通过的情况下，GEF 理事会将举行投票，决议通过需获得 60% 理事国赞成且其代表的累积捐款额达到总额度的 60%，即“双 60%”混合投票权制度。从表 1 可以看出三个重要结论：首先，按累积捐资额度排名，日本第一，美国第二，德国第三；其次，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捐资额度超过总额度的 60%，意味着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在 GEF 资金分配方案中占据绝对的话语主导权；最后，在 GEF 捐资额度排名前 17 位的国家均是美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捐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此三国加总所占比例仅为 1.21%。因此，GEF 是由北方国家主导的、致力于帮助南方国家提升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能力的一种资金安排。在 30 余年的运行过程中，GEF 的主导权并没有随着全球“东升西降”格局而旁落他国，美日德英法一直牢牢把控着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资金主导权，继而主导全球环境资金分配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为了护持北方国家

^①GEF 的 32 个理事国中有 14 个是发达国家，16 个是发展中国家，2 个是转型经济体。

^②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 7 Replenishment, 2018. <https://www.thegef.org/who-we-are/funding>.

在环境治理领域中的优势地位，GEF 改革持续下调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助比例。

主导 GEF 的前五位国家的排序，在 GEF 第七增资期时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自 GEF 成立之初到 GEF 第六增资期，美国一直是 GEF 累积出资最多的国家。但到 GEF 第七增资期，日本一跃成为累积捐资额度最多的国家。美国在 GEF - 7 中大幅削减捐资规模，降幅达到 50%，表明美国借助环境议题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能力和意愿均出现下降。日本目前是 GEF 累积捐资最多的国家（33.8 亿美元），美国居第二（30.3 亿美元）。图 1 显示出美国和日本在历次 GEF 增资期的捐款占比，可以看出，在 GEF - 6 时期日本的单期捐款额度已经超越美国。GEF - 7 时期正值美国特朗普政府全面退出多边环境条约，因此美国对 GEF 的捐资也出现锐减。日本对 GEF 的持续高额捐款是符合日本环境外交的大战略的。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开展环境外交的国家，无论是在双边、地区甚至全球性的环境合作领域，都能发现日本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因为这有助于日本实现其政治、经济、安全、文化、道义等多领域的外交诉求。^① 日本立足于环境外交来促进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思路，激励日本在全球环境基金这一国际平台上不断提高捐资水平以提升影响力。

表 1 GEF - 1 至 GEF - 7 时期各国捐资累积额度占总资金盘子的比例

排名	国家	占比（%）	排名	国家	占比（%）
1	日本	17.64	11	比利时	2.33
2	美国	16.51	12	丹麦	2.00
3	德国	12.87	13	澳大利亚	1.87
4	英国	8.76	14	挪威	1.63
5	法国	7.92	15	芬兰	1.61
6	加拿大	5.31	16	奥地利	1.40
7	瑞典	4.38	17	西班牙	0.93
8	意大利	4.17	18	中国	0.46
9	荷兰	3.55	19	印度	0.40
10	瑞士	2.95	20	俄罗斯	0.35

资料来源：GEF. Eighth GEF Replenishment: Overview of Financial Structure, 2018.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council-meeting-documents/GEF% 208% 20First% 20Meeting% 20Financial% 20Structure% 20Note. pdf](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council-meeting-documents/GEF%208%20First%20Meeting%20Financial%20Structure%20Note.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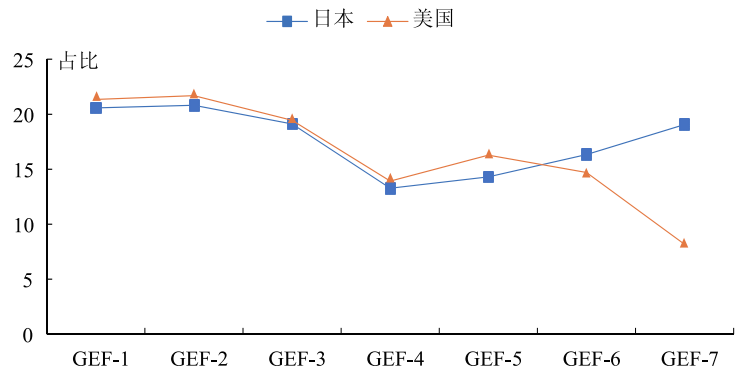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和日本在历次 GEF 增资期的捐款占比。

数据来源：GEF 官网。

（三）资金分配领域

GEF 以支持受援国履行国际公约为导向，因此其资金分配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化学品和国际水域等五大重点领域，GEF - 8 将总资金盘子的约 90% 投入到上述领域。如表 2 所示，GEF - 8 在三种不同的捐资情景下对各项支出进行分配。总体来看，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资金占比显著增加，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占比显著降低，而其他三项的资金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在总资金盘子扩大的条件下，GEF - 8 的资金比例调整带来的后果是，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保持不变，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资金规模显著提升，土地退化、化学品和国际水域三项的资金规模有所上升。实际上，从图 2 可以看出，全球环境基金自第六次增资期后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分配规模呈现持续下调态

①周英：《日本环境外交的主体、动因和效果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 页。

势，如果考虑到通胀的影响，则气候变化领域从 GEF 获得的实际资助力度的下降则更为明显。通过对比图 1 和图 2，可以发现，气候变化领域资金规模下调的时间节点与美国不再追求 GEF 捐资第一大国地位的时间节点是相对应的。

表 2 GEF-8 与 GEF-7 的资金分配领域及占比情况的对比分析

目标领域	GEF-7, 40 亿美元		GEF-8, 50 亿美元		GEF-8, 65 亿美元		GEF-8, 70 亿美元		趋势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资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生物多样性	1292	31.80	1800	36	2340	36	2489	35.60	比例增加
气候变化	802	19.70	802	16	920	14.20	920	13.10	比例明显下降
土地退化	475	11.70	580	11.60	731	11.20	731	10.40	比例基本不变
化学品	599	14.70	750	15	917	14.10	917	13.10	比例基本不变
国际水域	463	11.40	530	10.60	768	11.80	768	11.00	比例基本不变
其他项目	285	7	351	7	637	9.80	988	14.20	比例基本不变
运行预算	152	3.70	187	3.70	187	2.90	187	2.70	比例基本不变
总计	4068	100	5000	100	6500	100	7000	100	

数据来源：GEF. Updated GEF-8 Programming Scenarios, 2022.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2-03/GEF_R_08_Interim_presentation_updated_gef8_programming_scenarios.pdf。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从加拿大、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到生活在低纬度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报告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以及全球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① 在全球气候风险不断升高并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情况下，GEF 不断调低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为自身应对气候风险留存资源，另一方面极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2006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十二次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12）指出，GEF 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绝大部分分配给了长期减缓项目，建议 GEF “适当优先注意适应行动”。^② 2010 年坎昆气候大会正式授权成立“绿色气候基金”（GCF），决定应当通过 GCF 来提供大部分多边适应资金，并指出要确保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开展的项目、方案、政策和其他活动。《巴黎协定》第二条特别提出了气候资金发展的长期目标，即“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但鉴于 GCF 的资金规模远不及 GEF，因此 GEF 主导国家不断调低气候变化资金规模及比例的做法，实质上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可获得气候资金，无疑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GEF 能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和减缓所需的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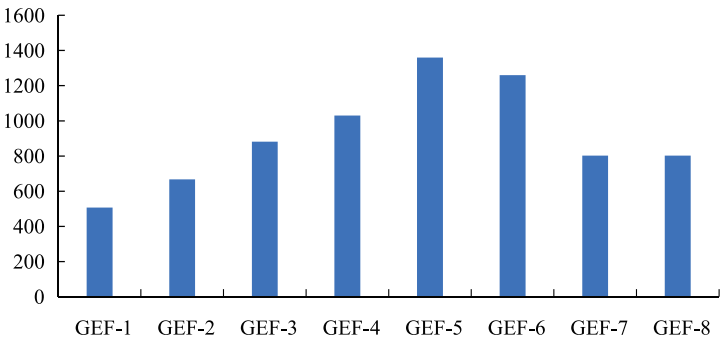


图 2 历次 GEF 增资期投入到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

数据来源：GEF 官网, <https://www.thegef.org/>。

^①UNFCCC. Action Taken by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t Its Twelfth Session, 2006.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06/cop12/eng/05a01.pdf>.

^②同上。

资金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重点。^①

二、GEF 的正向溢出效应

GEF 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从产业链角度而言，GEF 促进了绿色技术转移；从融资效果而言，GEF 撬动了受援国公私部门的资金流入到与环境治理相关的领域；从能力建设角度而言，GEF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提供的培训、教育和交流，综合提升了相关领域的机构及人员的业务能力；从文化价值角度而言，GEF 项目成功经验的推广，提高了公众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认知和意识，为全社会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认知基础。

（一）绿色技术溢出效应

GEF 是一项集绿色融资与技术援助于一体的国际公共产品。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承受着经济欠发达和环境高污染的双重压力，既缺乏环境治理的资金，也缺乏技术创新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必须同时解决资金和技术的问题。绿色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有利于提升全球福祉，但囿于国家竞争力考虑，发达国家在绿色技术转移问题上一直持保留态度。全球环境基金通过设立“增量成本”（incremental costs）这一方案来促进绿色技术转移。《GEF 修订文本》第 2 条指出，GEF “提供赠款和优惠资金来覆盖为实现全球效益而产生的增量成本”。^②“增量成本”指的是将国内环保项目转化为全球项目时采取附加行动所需的资金，比如同样是发电，煤炭发电可以低成本满足国内用电需求，但太阳能发电既能保障用电需求也能减少碳排放，唯一不足在于初始成本过高，而这两种技术方案之间的成本差距就是“增量成本”。GEF 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绿色技术转移的成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匈牙利能源效率联合融资项目中的节能减排技术、西非节能建筑技术、中国世博会的燃料电池城市客车技术，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综合应用商业化推广，以及孟加拉国节能窑炉项目中的中国混合霍夫曼窑（HHK）技术等。^③ GEF 赠款在帮助中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④

（二）融资撬动效应

国际援助机构向来希望援助资金能够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GEF 在第 9 条准则中就正式提出，“为寻求全球环境效益的最大化，GEF 强调其催化作用以及从外部渠道撬动更多资源”。^⑤ GEF 将催化作用理念运用到项目管理中，在项目监测评估中跟踪关注其放大和复制的效果。^⑥ 从资金筹措角度而言，GEF 将自身捐赠视为“种子资金”，希望能带动更多公私部门的资金流入环境保护项目。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中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巨大，单纯靠 GEF 捐资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GEF 运用多元化融资工具，以“种子资金”模式带动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社会团体等对环境技术的投资和落地。自 GEF 成立以来，GEF 已经为 165 个国家提供了 135 亿美元赠款，并撬动了约 650 亿美元的

①佚名：《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环境基金”表示关切》，《中国气象报》，2009 年 12 月 14 日，第 3 版。

②GEF. Instru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tructured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2015.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GEF_Instrument-Interior-March23.2015_1.pdf.

③彭亚媛、马忠法：《全球环境基金促进绿色技术转移的路径及启示》，《国际商务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91 页。

④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赠款帮助中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传播》，《国际融资》，2012 年 7 月，第 68 页。

⑤GEF. Draft Operational Strategy, 1995. 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council-meeting-documents/GEF_C.5.3.pdf.

⑥陶蕊：《催化作用在国际环境保护项目中的体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第 S2 期，第 402 页。

配套资金。依据不同国家的基金管理绩效，GEF 对各国的配套资金实施差异化管理，比如中国 GEF 项目赠款和配套资金的平均比例是 1:10.8，巴西、墨西哥和印度分别是 1:4.7、1:5.8 和 1:9.6。^① 中国受到 GEF 资助的项目达 244 项，争取赠款超过 14 亿美元，撬动配套资金 164.8 亿美元，是 GEF 资助额度最大的国家，也是撬动配套资金量最多的国家。以生物多样性领域的 GEF 项目为例，撬动了中国政府 5~10 倍的配套金用于相关工作。^②

（三）环境治理能力提升效应

GEF 重视资金使用效率，因而建设了一套完备的管理体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以评价相关项目的绩效水平。具体而言，GEF 采用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评估机构三分的管理模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相分离，有利于发挥不同机构的专业优势，并鼓励各执行机构之间展开竞争，有利于提高有限资金的高效率使用。在项目的监督评估环节，GEF 成立独立的监督评估小组，来监督实施、评估单个项目绩效、执行机构的业绩以及 GEF 的总体政策。

GEF 第六次全面评估指出，GEF 在支持各国履行国际多边环境协定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上发挥了催化作用，相应的资助活动开始产生回报，在环境治理方面产生了示范性影响。项目实施国家的环境治理水平、能力和体系效率均有所提升。中国密切结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将 GEF 项目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目前累积捐款 9554 万美元，积极争取赠款 14 亿美元。^③ 财政部作为中国与 GEF 合作的窗口单位，指出 GEF 项目加强了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荒漠化防治等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促进了一批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建设，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机制。^④ 因此，GEF 以“种子资金”为手段、以弥补“增量成本”为路径、以制度化执行与评估为框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干中学”，不断吸纳国际先进经验用于本土环境治理并提升全球环境福祉。

（四）认知建构效应

GEF 在项目推行过程中，利用各种平台和窗口，广泛开展宣传和研讨，提高了公众对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为长期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群众基础，有助于全球共同实现《昆明宣言》所倡议的“到 2050 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耶鲁大学发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能够显示环境治理绩效的领导者和落后者。2020 年在参评的 180 个国家中，全球 EPI 排名前 50 的国家或地区均属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分布在后 2/3 的范围内。^⑤ 一国环境治理绩效取决于其技术水平、发展阶段以及环境意识。自 1992 年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被提上国际议程，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意愿和水平仍不足。GEF 以其良好的项目运行和示范效果，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主流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GEF 所推行的跨界治理实践，为形成跨国、跨区域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共识提供了良好的案例基础。比如，GEF 参与的欧洲多瑙河—黑海区域水污染跨国治理项目，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跨国治理机制和经验，为弥合区域间的环境治理分歧提供了可行方案。多瑙河—黑海区域的水污染治理面临的

①王爱华、陈明、曹杨：《全球环境基金管理机制的借鉴及启示》，《环境保护》，2016 年第 20 期，第 72 页。
②马超德、赵新华等：《UNDP 与中国合作实施 GEF 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与经验》，《生物多样性》，2021 年第 2，第 212 页。
③GEF. Recipient Country: China, 2022. <https://www.thegef.org/projects-operations/country-profiles/china>.
④财政部：《我国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财政部网站，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gjs.mof.gov.cn/dhjz/gjrz/hjj/hjjhz/zkhz/201011/t20101126_357610.htm.
⑤Wendling, et 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2020. <https://envirocenter.yale.edu/2020-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dex>.

一个重要挑战是，沿河流域的 18 个国家并未就水污染问题形成共识，并且也缺乏相应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政策体系。^① 事实上，在解决跨境环境问题时，共同价值理念的重要性远高于其他事项，只有当可持续发展理念超越国家利益纠葛时，才可能进入资金筹措和执行方案等环节。GEF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力量介入跨境环境治理问题，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共同利益为价值导向，形成了有效的跨境治理机制。

三、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阐述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全面阐释，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③ 实现全球环境善治则是建成“美丽清洁”世界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承认国家之间存在深度相互依赖，而且承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自然之间也存在深度相互依赖。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其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因此，需要摒弃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发展阶段差异和单个国家利益，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使得各国将自身的国家理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理性相协调，为各国摆脱全球环境治理困境指明出路。^④

GEF 的目标是“投资我们的星球”，实际上也是将人类看做一个整体来考虑的环境投资项目，投资的受益方是全人类。尽管从项目执行情况来看，GEF 投资的每个项目在环境指标和经济指标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绩效，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整体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以气候变化为例，全球距离实现《巴黎协定》所确定的温控目标仍有巨大的排放差距，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测算，要确保实现 2℃ 温控目标，2030 年的全球排放量应比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少 1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⑤ 随着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石油及天然气价格飞涨，煤炭作为低成本燃料的应急功能凸显，为全球脱碳进程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此这种排放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GEF 第六次全面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环境趋势持续恶化，人类正在接近地球的边界和极限，因此 GEF 的资源调动和战略选择必须反映全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⑥ GEF 自第六增资期以来，不断致力于推动自身的深化改革，以更好促进 GEF 的绩效表现。但由于其主导国家均是发达国家，且 GEF 的托管机构世界银行本身是美国推行自由国际秩序的抓手，因此 GEF 带有一定的地缘政治诉求，有悖于为“星球”服务的初衷，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GEF 在历次改革中刻意持续削减对新兴经济体的环境资金分配。按照“双 60%”的混合

①陶希东：《欧洲多瑙河—黑海区域水污染跨国治理经验——以全球环境基金为例》，《创新》，2018 年第 3 期，第 3 页。

②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网，2013 年 3 月 23 日。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0 月 27 日。

④王曦、郭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摆脱全球环境治理困境的启示》，《环境保护》，2021 年第 6 期，第 61 页。

⑤UNEP.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1.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1>.

⑥GEF 独立评估办公室：《全球环境基金面临提升影响力的关键抉择》，GEF 官网，2014 年 6 月 4 日，https://www.thegef.org/sites/default/files/council-meeting-documents/OPS5_Final_Report_Summary_Version_-_Chinese.pdf。

投票权制度，GEF 毫无疑问是由七国集团（G7）主导的。GEF 改革已经连续两次持续降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受援资金量、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并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完善治理结构等。发达国家普遍希望加大改革力度，倾向于更多地尝试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方式，将资源向低收入国家倾斜，减少对发展中大国的资金投入。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尚未实现碳达峰，还处于碳排放增长阶段，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处于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之下。无论是从绿色技术的转移转化角度，还是从环境资金的需求量角度而言，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是急需环境援助的对象，而且这种援助将对全球环境质量的边际改善更为显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全球资源环境安全共同体文化，正是对全球环境议题政治化的一种有力回应。^① GEF 以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环境资助力度的做法，本质上有悖于全球环境安全共同体这一基本前提，因此出现了项目成功而无助于全球整体环境绩效改善的结果，实则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在 GEF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日欧等经济体，激进要求引入“毕业政策”。所谓“毕业政策”，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履行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责任与义务。“毕业政策”的演化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中要求改变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作为目前 GEF 中捐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 GEF - 7 中的捐资规模达 2200 万美元，同

表 3 主要国家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捐资增速比较

国家	GEF - 6 捐资额	GEF - 7 捐资额	捐资增速	GEF - 7 捐资占比
日本	6.01 亿美元	6.37 亿美元	6%	19.06%
德国	4.6 亿美元	5.02 亿美元	9%	15.02%
英国	3.24 亿美元	3.37 亿美元	4%	10.07%
法国	3.0 亿美元	3.0 亿美元	0%	8.97%
美国	5.46 亿美元	2.7 亿美元	- 50%	8.17%
中国	2000 万美元	2200 万美元	10%	0.66%

数据来源：GEF 官网。

比增长 10%，捐资增速高于 GEF 捐资前五位的发达国家（见表 3）。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议程中，一贯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秉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愿为相关国家提供援助。这一特点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对 GEF 的自愿捐款也是在恰当评估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后所做出的发展中大国的应有贡献。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将与 GEF 协同增效，更有效保护全球生态完整性和多样性。GEF 改革议程中对发展中大国的持续减资和“毕业政策”，是将环境援助议题政治化的表现，并没有从人类整体出发来处理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是掺杂了地缘政治经济考量，有悖于通过合作来寻找集体理性的初衷。

第三，GEF 所秉持的观念是环境问题需要用市场办法来解决，即采用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从微观层面而言的确属于外部性问题，但从宏观层面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而言则属于公共物品问题，更涉及到公平发展权益问题。正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增长方式，加速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环境退化。比如，经济全球化加速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而资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无形中提升了经济活动水平和能源消耗水平，从而导致全球人为碳排放不断上升并引发气候变化。GEF 最核心的问题是用高度政治化的考虑取代了对某个项目或国家环境状况的评估。^② 比如，GEF 自第五增资期后就持续削减气候变化项目的援助资金，这一政策倾斜的直

① 郇庆治：《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全球资源环境安全文化构建》，《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② Susanne Soederberg, American Empire and "Excluded States":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and the Shift to Preemptive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4, 25 (2).

接后果是影响发展中大国的受援资金总规模。应对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在全球碳排放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其他类型和来源的气候资金，GEF 作为最早发起的关乎环境治理的专项基金，不应以削减气候资金来达到削减发展中国家受援资金总量的目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环境治理方案，主张通过破除资本的霸权逻辑，以对话协商和合作共赢的方式来化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强调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才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①

四、借助 GEF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如果以东西方两个世界来区分的话，GEF 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并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东方发展中大国提出并为之努力的世界图景。前者偏向微观，后者则更为宏观。因此，借助 GEF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通过观念层面的话语联接、实践层面的行动协同以及制度层面的兼容并包来实现。

首先，在观念层面寻找共同价值以实现二者的话语联接。GEF 的宗旨是“投资星球”以支持环境友好工程，因此其在设计框架上偏向于微观领域，并且注重资本在环境领域的盈利性和可持续性，属于追求资本回报与环境回报的类公共产品，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种单向资金流动，最终目标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在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如和平、发展、公平和正义，在于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生缺陷，在于化解人口、环境、资源、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与化解全球环境挑战的此类议题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宏观视野和天下胸怀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因此，无论是 GEF 所表述的“星球”观，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述的“同命运”观，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GEF 作为环境资金的一种微观运作框架，是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添砖加瓦的，关键在于东西方两个世界对“大同”的理解与沟通。

其次，在实践层面寻找共容利益以实现二者的行动协同。当前，GEF 的一个重点改革方向是减少对新兴经济体的资助力度转而投向更不发达地区。这一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非全球可持续发展观，“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了西方世界的焦虑，从而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遏制崛起中大国的战略方向。众所周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需要各国间的合作，而能否顺利合作取决于双方的技术差距和能力差距。正如产业经济学中的“雁型模式”所描述的，技术和产业的转移是从第一梯级地区逐级向第二和第三地区转移，如果直接从第一梯级地区向第三梯级地区转移，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力资本都无法与先进技术完全配套。事实上，在环境治理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与技术进入新兴经济体后，二者之间的技术差距与能力差距尚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各项配套从而推动项目进入正轨；但相同的技术和经验进入最不发达地区则需要更长时间，仅仅是基础设施效率就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西方主导的 GEF 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最大的共容利益在于如何将全球环境资金的治理绩效最大化，即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全球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而非局限于提升单个项目的治理绩效。在实现这一共容利益的过程中，微观层面的构架

^①王雨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67 页。

不可或缺，但宏观层面的设计同样重要，二者应协同行动。构建一个以发达国家为先导，带动发展中国家环境绩效改善，进而共同带动全球其他地区环境绩效改善的全球框架才是正确选择。

最后，在制度层面寻找问题根源以实现二者的兼容并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及其驱动的全球分工模式。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环境问题作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不断累积并持续恶化。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全球性问题，需要以系统观念整体推进，而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的具体项目无异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中国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宣布 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都是基于系统观和整体观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GEF 运行 30 余年以来，其微观治理结构取得显著成效，如果能在系统观和整体观的指引下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必将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五、结语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资金来源，GEF 在资金供给、技术转移、撬动社会资源和构建文化认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以 GEF 第七增资期为例，中国获得赠款达 2.38 亿美元，自愿捐款 2200 万美元，有效提升了中国对全球环境条约的履约能力。发展中国家参与和履约的能力，决定了全球性环境条约能否成功实施。^① GEF 的确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升了对国际环境协定的履约能力，但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鉴于此，在环境治理领域更加凸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 GEF 主导国家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削减援助资金和推行“毕业政策”的做法，无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风险。为了建成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以“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避免在环境治理议题中掺杂地缘政治经济考虑，真正为实现全球环境善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 年 4 月 22 日。
2. 解振华：《中美应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从遏制竞争走向共赢》，《全球化》，2021 年第 2 期。
3. 潘家华、张蕾、周洪双：《碳中和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光明日报》，2021 年 12 月 29 日。
4. 周大地、高翔：《应对气候变化是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 年第 9 期。
5. 石井菜穗子：《全球可持续发展及中国与全球环境基金（GEF）的合作》，《财政科学》，2017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①何艳梅：《全球环境条约对发展中国家激励机制的实证分析与比较》，《武大国际法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中国消费研究状况 1990—2020 年： 知识图谱分析^{*}

逯万辉 荆林波

摘要：本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发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 刊引文数据库（简称 CHSSACD），通过领域专家构建消费领域的重要关键词，以作者标注的关键词为主，同时采用文本挖掘算法从题目和摘要中再抽取重要关键词作为补充，绘制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分析研究主题、发表论文机构与作者的状况。根据论文发表数量的分布时段，本研究将消费领域的的数据划分为 1995 年以前、1996—2000 年、2001—2005 年、2006—2010 年、2011—2015 年、2016—2020 年等六个时间段，对各个时间段内的研究内容分别绘制知识图谱。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清晰了解过去 30 年期间，我国消费经济研究领域的波动情况，掌握研究主题的变迁轨迹，通晓各研究机构的发文状况，以及高产作者的发文状况与分布。本研究是国内首次进行此类研究，希望得到广大同行的关注。

关键词：消费 消费模式 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逯万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本研究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发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 刊引文数据库（简称“CHSSACD”），通过领域专家构建消费领域的重要关键词“消费需求、消费预期、消费意愿、消费模式、消费心理、新消费、消费升级、消费降级、扩大内需、经济增长、奢侈品、必需品、选购物品、体验、千禧一代、Z 世代、消费者、消费量、消费结构、消费观、消费群体、炫耀性消费、时尚性消费、休闲娱乐、消费者权益、消费者主权、消费信贷、消费主义、消费支出、绿色消费、体育消费、生活方式、收入、阶层、下沉市场、消费分层”等构建检索式，进行消费领域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检索情况来看，消费领域的相关研究一直非常活跃，最早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到 1993 年，陈君石等发表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的《我国人民膳食结构的变化及正确导向》，其后该领域的研究一直较为活跃，文献产出量巨大。为便于抓取文献进行分析，本文将分析对象锁定在中文核心期刊，并对检索文献进行过滤，共得到相关文献 9.19 万余篇，本文以此数据源展开相关研究与分析。基于上述检索式和数据检索方法，本研究从 CNKI 数据库共检索得到消费领域 91917 篇相关研究论文。论文的年度分布曲线如图 1 所示。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项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研究”（pjy202201）的研究成果。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引文数据库的支持。

从论文发表数量分布情况来看，1995 年以前，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论文产出相对较少，这一时段的累计发文量仅占该领域全部发文量的 4.48%。之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 2000 年时，这一时期的论文发表量累计已达到全部发文量的 19.52%。进入 21 世纪后，该领域持续发展，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在波动中平稳发展，因此，在分析时段的划分上，将该领域的数据划分为 1995 年以前、1996—2000 年、2001—2005 年、2006—2010 年、2011—2015 年、2016—2020 年等 6 个时间段，对各个时间段内的研究内容分别绘制知识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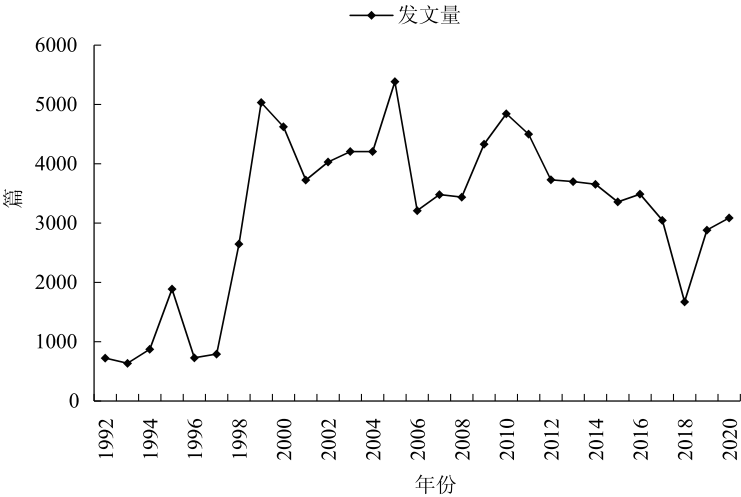


图 1 1992—2020 年消费领域研究论文发文量

一、1995 年以前消费领域研究知识图谱与发表论文情况

图 2 展示的是 1995 年以前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这一时期，我国消费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个聚焦领域是消费物价，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物价上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学者们都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第二个聚焦领域是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需要建设对应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服务体系。第三个聚焦领域在消费者，包括消费者支出能力、消费品市场的供给、城镇居民收入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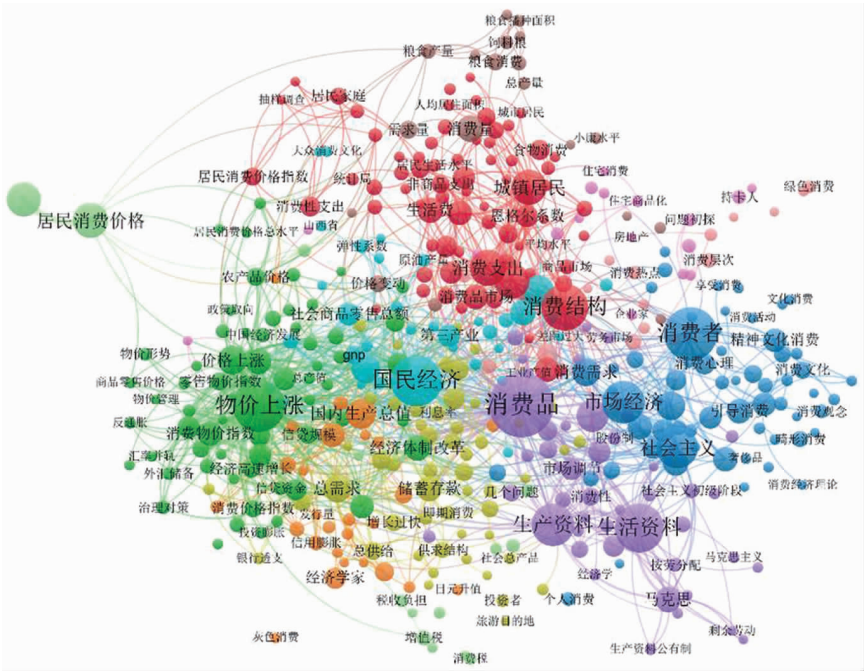


图 2 1995 年以前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1995 年以前发文超过 15 篇的机构有 25 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居榜首，发文数量达到 81 篇；个人作者发文超过 10 篇的有 25 人，山东大学的臧旭恒位居第一，发文数量为 33 篇（详细情况参见表 1）。

表 1 1995 年以前前 25 家发表论文的机构/作者与数量 单位：篇

机构	发文数	发文作者	发文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	81	臧旭恒@ 山东大学	33
中国人民大学	63	毛中根@ 西南财经大学	24
国家统计局	58	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8
湖南师范大学	47	袁富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17
山东大学	45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17
北京大学	41	刘凯强@ 安徽大学	17
国家信息中心	41	成升魁@ 中国科学院	16
中国人民银行	35	王财玉@ 信阳师范学院	14
湘潭大学	32	盛光华@ 吉林大学	1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6	黄海燕@ 上海体育学院	14
东北财经大学	25	邓光耀@ 兰州财经大学	13
西南财经大学	25	王宁@ 中山大学	13
南开大学	24	金晓彤@ 吉林大学	13
南京大学	24	陈利锋@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13
复旦大学	22	龚敏@ 厦门大学	12
厦门大学	22	朱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	22	许宪春@ 清华大学、国家统计局	12
武汉大学	20	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2
中国工商银行	20	张忠杰@ 兰州财经大学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	19	杭斌@ 山西财经大学	11
辽宁大学	19	杨碧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1
农业部	18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	11
中国科学院	17	任保平@ 西北大学	10
中山大学	15	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	10
上海财经大学	15	张瑞林@ 吉林体育学院	10

二、1996—2000 年消费领域研究知识图谱与发表论文情况

图 3 展示的是 1996—2000 年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这一时期，我国消费领域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个是关注扩大内需，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实现经济软着陆，当时我国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构想，发挥内需对经济的稳定作用，产生了积极成效。第二个热点是与城乡消费相关的消费市场，如何提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第三个热点是与住房消费相关的消费信贷。

1996—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保持发文数量第一的位置，发文总量达到 287 篇；而个人发文最多的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胡少维，发文数量为 45 篇（详细情况参见表 2）。

续表 3

机构	发文数	发文作者	发文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5	耿莉萍@ 北京工商大学	19
南开大学	193	郑剑@ 国家计委经调司	19
厦门大学	192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	19
暨南大学	191	胡少维@ 国家信息中心	18
中山大学	190	成升魁@ 中国科学院	18
清华大学	186	资树荣@ 湘潭大学	18
北京师范大学	185	刘卫@ 山东理工大学	18
吉林大学	173	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	18
华中科技大学	171	李树@ 西南政法大学	17
中国科学院	168	王冰@ 武汉大学	17
中央财经大学	160	何炼成@ 西北大学	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55	刘福垣@ 国家发展改革委	16

注：湘潭大学以 147 篇位居 26 名，也说明该校在此领域的研究比较多。发表论文数量同样为 16 篇的作者还有暨南大学的周显志、吉林大学的刘金全等。

四、2006—2010 年消费领域研究知识图谱与发表论文情况

图 5 展示的是 2006—2010 年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这一时期，我国消费领域的研究热点有三个变化：第一个热点领域集中在消费与消费结构，关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持续消费以及体育消费等。这与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紧密相关。第二个热点领域关注经济增长。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如何规避外来风险、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成为当时的主要话题。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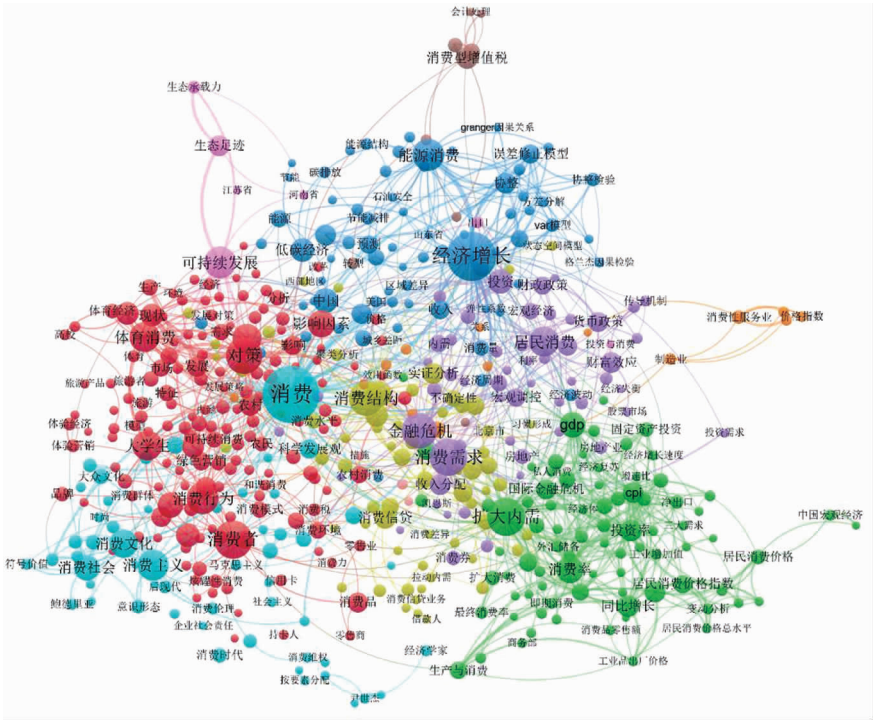


图 5 2006—2010 年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个热点领域仍然集中在扩大内需，研究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消费差异、消费信贷等问题。

2006—2010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为 424 篇，领先第二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近 100 篇，优势非常明显。排在第 25 位的中央财经大学的发文量只有 133 篇，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形成悬殊对比。个人发文量方面，发文量下降比较明显，第一位的发文量只有 31 篇（详细情况参见表 4）。

表 4 2006—2010 年前 25 家发表论文的机构/作者与数量 单位：篇

机构	发文数	发文作者	发文数
中国人民大学	424	顾尧臣@ 国家粮食局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	327	郑宇劼@ 综合开发研究院	29
北京大学	281	尹世杰@ 湖南师范大学	25
南开大学	278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
西南财经大学	256	刘伟@ 北京大学	19
复旦大学	248	张雷@ 中国科学院	18
南京大学	245	柳思维@ 湖南商学院	17
西安交通大学	235	金三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6
上海财经大学	221	祁京梅@ 国家信息中心	16
中国人民银行	214	文启湘@ 西安交通大学	15
四川大学	206	王启云@ 湘潭大学	15
武汉大学	193	龚六堂@ 北京大学	15
清华大学	192	聂锐@ 中国矿业大学	14
厦门大学	192	金晓彤@ 吉林大学	14
湖南大学	186	魏杰@ 清华大学	14
暨南大学	184	郭新华@ 湘潭大学	14
吉林大学	177	任保平@ 西北大学	14
北京师范大学	170	何炼成@ 西北大学	13
中国科学院	168	田立新@ 江苏大学	1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64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	13
中山大学	162	许进杰@ 玉林师范学院	12
湘潭大学	138	周庭锐@ 西南交通大学	11
湖南师范大学	137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	11
华中科技大学	135	梁达@ 国家统计局	11
中央财经大学	133	严先溥@ 国家统计局	11

注：发表 11 篇的作者还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刘尚希、陕西师范大学孙根年、兰州大学牛叔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建伟和余斌。

五、2011—2015 年消费领域研究知识图谱与发表论文情况

图 6 展示的是 2011—2015 年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这一时期，我国消费领域的研究热点较多，既有传统的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扩大消费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居民消费与消费结构的研究，也有比较新的话题研究，比如碳排放与低碳经济、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消费主义与消费社会问题的研究。

2011—2015 年，机构发文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继续领跑，达到 532 篇，比第二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文量多 100 多篇。相对而言，个人发文量方面则继续下降，排在第一位的学者发文量为 27 篇（详细情况参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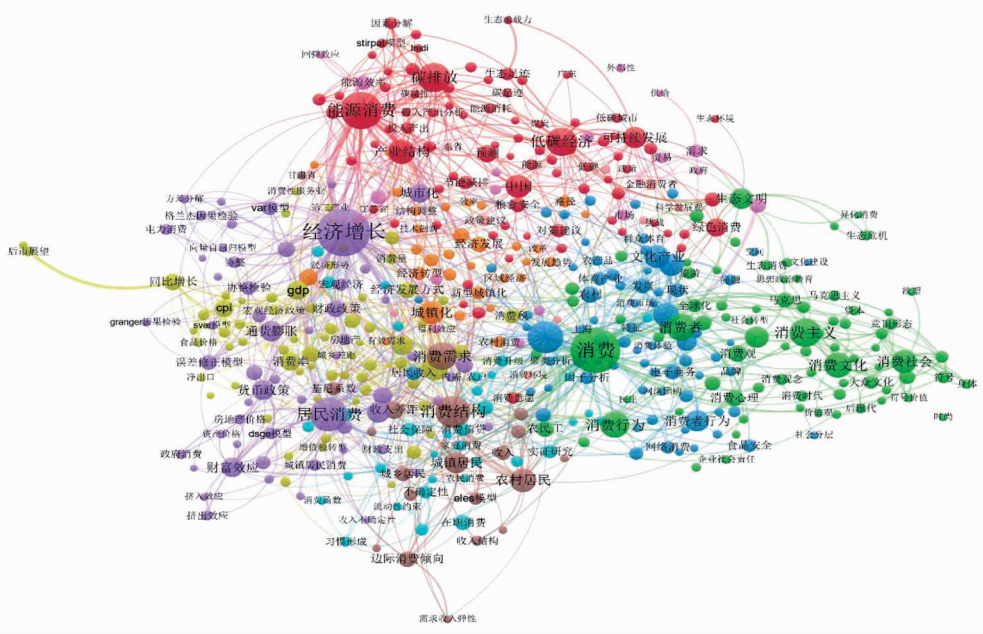


图 6 2011—2015 年消费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表 5 2011—2015 年前 25 家发表论文的机构/作者与数量 单位：篇

机构	发文数	发文作者	发文数
中国人民大学	532	金晓彤@ 吉林大学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	424	刘晓红@ 南京晓庄学院	24
北京大学	330	梁达@ 国家统计局	20
南京大学	302	李建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
西南财经大学	259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	17
吉林大学	246	易行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5
上海财经大学	245	钟宏@ 国家统计局	15
南开大学	245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15
武汉大学	244	王宁@ 中山大学	15
中国科学院	222	杭斌@ 山西财经大学	15
清华大学	211	孟范昆@ 江西师范大学	14
中央财经大学	206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	14
厦门大学	205	毛中根@ 西南财经大学	1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5	龚六堂@ 北京大学	14
复旦大学	192	代刚@ 贵州师范大学	13
暨南大学	189	潘虹@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13
西安交通大学	187	余芳东@ 国家统计局	13
中国人民银行	180	严先溥@ 国家统计局	13
山东大学	172	王晓芳@ 西安交通大学	13
四川大学	171	任保平@ 西北大学	13
北京师范大学	157	刘东皇@ 江苏理工学院	13
东北财经大学	152	尹世杰@ 湖南师范大学	12
国家统计局	150	余根钱@ 国家统计局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48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2
中山大学	144	赵昕东@ 华侨大学	12

续表 6

机构	发文数	发文作者	发文数
吉林大学	197	成升魁@ 中国科学院	16
西南财经大学	196	王财玉@ 信阳师范学院	14
中山大学	192	盛光华@ 吉林大学	14
南开大学	177	依绍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14
上海财经大学	177	黄海燕@ 上海体育学院	14
清华大学	170	邓光耀@ 兰州财经大学	13
山东大学	167	王宁@ 中山大学	13
中央财经大学	166	金晓彤@ 吉林大学	13
厦门大学	146	陈利锋@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13
复旦大学	145	龚敏@ 厦门大学	12
北京师范大学	141	朱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	12
中国农业大学	137	许宪春@ 清华大学	1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	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5	张忠杰@ 兰州财经大学	11
中国人民银行	124	杭斌@ 山西财经大学	11
四川大学	118	杨碧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1
中国矿业大学	115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	11
中国科学院大学	111	张瑞林@ 吉林体育学院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	110	任保平@ 西北大学	10

七、小结

本研究是国内第一次通过关键词和作者为主，采用文本挖掘算法，绘制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分析研究主题、发表论文机构与作者的状况。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过去 30 年期间，我国消费经济研究领域的波动情况，掌握研究主题的变迁轨迹，通晓各研究机构的发文状况，以及高产作者的发文状况与分布。

（一）消费领域作者合作状况分析

从消费领域学术论文产出的合作情况来看，合作创新已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的学术产出动力，在产出的论文中作者成果在 2020 年已经达到 60.88%，跨机构合作论文占比也将近 40%，图 8 展示了该领域内部分主要作者合作网络的图谱情况。

（二）发文主题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

前文通过每 5 年统计的状况，可以看出每个时段的研究主题会有所变化。从大的方面看，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较大，扩大内需日益成为研究的中心话题。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消费领域也开始探讨消费升级的相关话题，而节能减排则对绿色消费、消费行为等产生较大影响。从上榜的机构和高产作者来看，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机构与学者加入到消费问题的研究队伍中。

（三）高产机构呈现高度集中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个机构排名遥遥领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次排名中都位居前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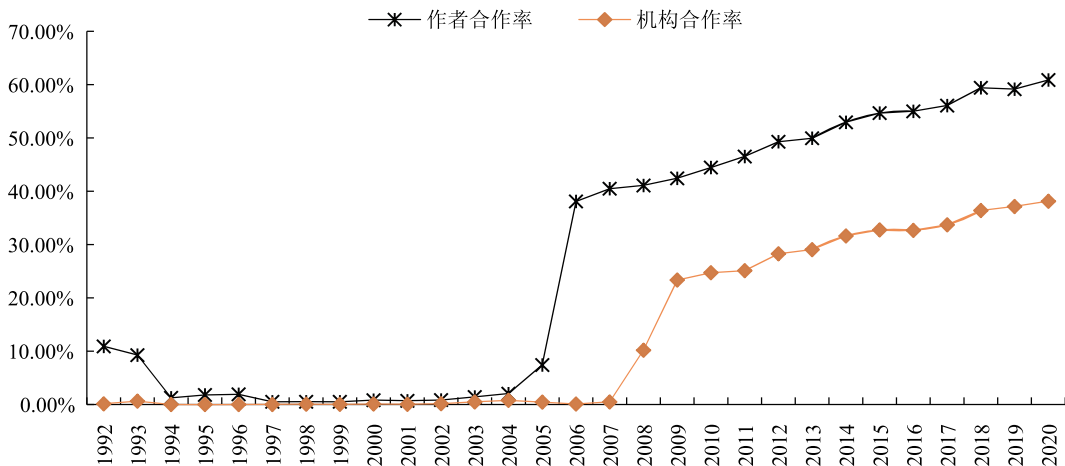


图 8 1992—2020 年消费领域学术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与机构合作率变化情况

名，发表论文数量非常稳定，是唯一一家机构做到如此业绩的，1990—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发表论文 2019 篇，总排名第二。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在 2006—2015 年发表论文较多，10 年期间比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论文多了 200 篇左右。1990—2020 年，中国人民大学共发表论文 2214 篇，总排名第一。其他发表论文较多的机构包括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知名大学。

（四）高产作者出现高度集中的现象

例如，从 1995 年以前的发文情况来看，臧旭恒发表了 33 篇论文，而山东大学这一时期的发文总量只有 45 篇，臧旭恒一个人的发文量占山东大学发文量的 73.3%。再如，尹世杰在 1996—2000 年发表了 35 篇论文，占同期湖南师范大学总发文量 101 篇的 1/3 强；2001—2005 年，该作者发表了 73 篇论文，占同期湖南师范大学总发文量的近 1/3。可以说，高产作者成为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人物，也带动了相关研究在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传承。

众所周知，发文数量与发文质量并不等同，如何客观评价发表论文的质量？如何鼓励更多发表论文的同时鼓励学术创新？如何把发表论文与消费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未来评价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 陈君石、陈孝曙：《我国人民膳食结构的变化及正确导向》，《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3 年第 5 期。
2. 荆林波、王雪峰：《消费率决定理论模型及应用研究》，《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11 期。
3. 荆林波：《关于我国扩大消费需求若干问题与政策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10 年第 17 期。
4. 荆林波：《中国贸易经济研究 1999—2016：知识图谱分析》，《财贸经济》，2018 年第 12 期。
5. 臧旭恒：《消费结构国际比较和借鉴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1 期。
6. 臧旭恒、张倩：《代际扶持视角下的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7. 尹世杰：《关于加强消费经济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2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郭 霞

· 产业 发展 ·

综合施策解决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痛点问题

景春梅 陈 妍

摘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明确了推进我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回答了“氢是什么”“为什么发展氢能”“怎样发展氢能”三个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氢能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绿色制取、储运畅通、应用多元的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还是创新协同、政策配套等发展环境方面，均存在痛点难点问题。现阶段应完善配套政策，加快形成氢能发展的“1+N”政策体系，构建形成有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并做好规划评估准备工作。同时，需加强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等相关政策协调，加强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的相互促进；尽快开展有针对性的试点示范，打通产业链堵点，以示范带动技术提升和成本下降；坚持创新引领，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氢能产业创新体系，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氢能 燃料电池 制储输用 关键核心技术

作者简介：景春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部长、能源政策研究部负责人、研究员；
陈 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2022 年 3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首个氢能产业中长期规划。《规划》对我国氢能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积极部署，首次明确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氢能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支撑作用。目前，我国氢能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基础、管理规范、政策体系等方面仍有完善空间。落实好《规划》，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把握好几个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一、《规划》的核心内容及其政策信号

在近些年国内外氢能产业高热发展和国内氢能属性待定、产业定位未明的背景下，《规划》作为我国首个氢能产业顶层设计，回答了“氢是什么”“为什么发展氢能”“怎样发展氢能”三个根本性问题，向国内外释放了我国对于氢能产业的基本态度。

（一）“4344” 核心内容

《规划》核心内容和释放的政策信号可归纳为“4344”，即氢能产业发展四大原则、三大定位、四大重点任务、四大应用场景。

四大原则。一是创新引领，自立自强。在尚未完全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背景下，《规划》指出，我国氢能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集中突破氢能产业技术瓶颈，建立健全产业技术装备体系。二是安全为先，清洁低碳。《规划》指出，要将安全作为氢能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三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产业规范发展。四是稳慎应用，示范先行。积极发挥规划引导和政策激励作用，因地制宜拓展氢能应用场景。

三大定位。关于氢的燃料和原料的定位，一直是业界、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并开创性地明确了氢能的三大战略定位：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氢能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四大重点任务。《规划》从创新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示范应用和政策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包括系统构建支撑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体系，统筹推进氢能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氢能多元化示范应用，加快完善氢能发展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

四大应用场景。《规划》以实现多元应用为目标，明确了氢能在交通、储能、发电、工业等四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包括有序推进交通领域示范应用，重点推进氢燃料电池中重型车辆应用；积极开展储能领域示范应用，发挥氢能调节周期长、储能容量大的优势，促进电能、热能、燃料等异质能源之间的互联互通；合理布局发电领域多元应用，开展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示范应用；逐步探索工业领域替代应用，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在合成氨、甲醇、炼化、煤制油气等行业替代化石能源的示范应用。

（二）三大主要政策信号

绿色发展是主线。与一些能源短缺国家不同，我国发展氢能源的目的在于解决能源“绿不绿”而不是“够不够”的问题。因此，我国氢能的初心使命是助力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能源供给端。作为大规模、长周期储能载体，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高效利用提供解决方案；作为二次能源，实现氢能—热能—电能灵活转化、耦合发展。二是在能源消费端。逐步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减量替代，如减少交通领域汽油、柴油使用；作为高品质热源直接供能，减少工业领域化石能源供能等。三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作为还原剂，在冶金行业替代焦炭；作为富氢原料，在合成氨、合成甲醇、炼化、煤制油气等工艺流程替代化石能源等。《规划》将“清洁低碳”作为基本原则，明确了“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的战略定位，指出了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并提出了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每年 10 万~20 万吨的目标，在重点任务和应用场景等具体规划和措施方面也都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的主旋律。

鼓励多元应用，全面挖掘脱碳潜力。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应用主要集中在交通领域，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燃料电池汽车和加氢站的发展规划，对其他氢能关键应用领域关注不足。全球碳中和大背景下，氢能在工业生产中的替代应用明显加速，在储能、发电等领域的应用也得到广泛关注，各种模式探索不断涌现。所以，《规划》提出坚持以市场应用为牵引，合理布局、把握节奏，在有序推进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用的同时，拓展在储能、分布式发电、工业几大领域的应用，推动规模化发展，旨在全面挖掘氢能在用能终端的脱碳潜力，为实现双碳目标添加助力。

积极推动，稳慎发展。氢能产业在发展初期拥有一定热度有助于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但目前各个地方的氢能规划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而且燃料电池车和加氢站规划总数不仅超出国家总体规划，还超出市场的承载量。氢能产业发展需要充分考虑“氢从哪里来、运到哪里去、如何运过去”的问

题。《规划》强调，要积极发挥规划引导和政策激励作用，推动地方结合自身基础条件理性布局氢能产业，实现产业健康有序和集聚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在供应潜力大、产业基础实、市场空间足、商业化实践经验多的地区稳步开展试点示范；坚持点线结合、以点带面，积极拓展氢能应用场景。

二、氢能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痛点难点

当前，我国氢能产业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产业链，也掌握了主要的生产工艺，在一些地方实现了一定规模的示范应用，但是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痛点依然存在。

（一）灰氢如何变绿

据测算，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时，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需从目前不足 16% 提升至 80% 以上，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需从目前的 34% 提升至 90% 左右，^① 这意味着未来必须大幅降低化石能源消费。《规划》中提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年制氢产量约 3300 万吨。这些氢气大多作为工业原料使用，制取基本上都来自于化石能源。根据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数据，2019 年我国的氢气生产结构，煤制氢所产氢气占 63.54%、天然气制氢占 13.76%、工业副产气制氢占 21.18%、电解水制氢占 1.52% 左右。对我国来说，大规模低成本低碳化制氢技术路线还不明确。碱性电解水（ALK）制氢技术较为成熟，成本相对低，但对于风光电力的间歇性和波动性适应性较弱；质子交换膜（PEM）制氢则成本高、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仍存在短板；阴离子交换膜（AEM）、固体氧化物电解水（SOEC）、光解水制氢、热化学循环水解制氢技术还处于基础研发或试点示范阶段。

（二）储运如何通畅

我国可再生能源基地基本聚集于“三北”地区，将来可再生能源制氢生产地点也将多在“三北”地区。但矛盾在于，东南沿海城市对氢气需求较大，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亟需储运技术的突破来解决，而我国目前储运链条不通畅。

气态储氢仍是最常见的储氢方式。我国气态储氢基础材料、加氢设备关键器件等部分依赖进口，输氢成本在氢气终端售价中的比重高达 40% ~ 50%，成为氢能规模化发展的掣肘。目前，我国氢气储运主要通过高压长管拖车解决，规模小、效率低，单车载氢量在 300 ~ 400 公斤，经济半径在 150 ~ 200 公里。液氢主要用于航天，受液化成本、能耗等限制较大，民用暂不具备商业化条件。管道输氢是大幅降低氢能成本、支撑氢能大规模和多场景应用的必然选择。《规划》发布后，氢能项目加快落地，一些示范城市已经出现“缺氢”现象。管道输氢在产业链中扮演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也是匹配供需的关键环节。如能形成类似天然气多点供应的氢气管网，不仅可解示范城市氢源之忧，还能通过规模化输送摊薄氢气储运成本，也有利于形成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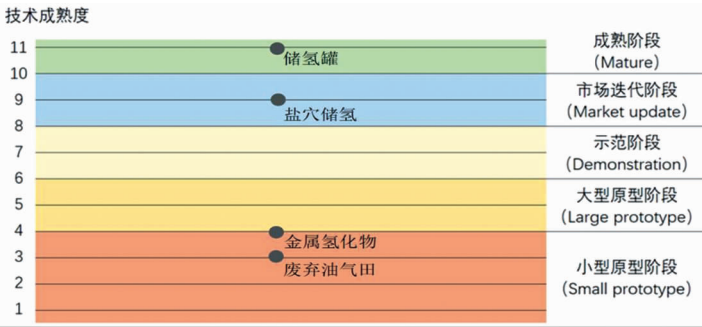


图 1 氢气储存技术成熟度图示

资料来源：IEA《全球氢能回顾 2021》《能源技术远景——清洁能源技术指南》。

^①佚名：《统筹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转型发展——访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章建华》，《中国电力报》，2021 年 4 月 16 日。

的氢能价格体系，推动氢能产业整体降本提效和推广应用。

规模化储氢技术也有待突破。通过发挥氢能作为长周期、大规模、跨季节储能载体的作用，带动我国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发展氢能产业的重要初衷。目前国际上大规模氢能应用的技术、成本、商业模式问题尚未解决，国外储氢项目多处在实验探索阶段，而我国则基本没有布局发挥好氢储能作用，将我国新能源第一大国的资源优势转变为转型优势还任重道远。

（三）应用如何多元

《规划》中提出推动氢能可在交通、工业、发电和储能等四大领域的应用，与对氢能作为能源体系的重要部分、用能终端低碳转型载体的定位一脉相承。但实践过程中，上述四个领域的应用进展有较大差别。新增氢能应用主要在交通领域，也是有可能较快实现商业化的领域。双碳目标提出后，可再生能源制氢在工业生产中替代化石能源制氢的相关应用明显加速，各种模式探索不断涌现。同时，氢能在储能、发电等领域的应用也得到广泛关注，但商业化前景和路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目前各应用场景均存在一些问题，决定了氢能能否在“难脱碳”领域发挥更重要作用。

一是在中远途、中重型的运输需求领域，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进展较为缓慢。在耐低温、远距离、高载重方面，氢燃料电池汽车比纯电动汽车具有明显优势，是未来交通领域深度脱碳的重要选择。经过几年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试验，我国燃料电池技术和工艺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配适中重型商用车的大功率电堆和系统成为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技术要求，国家“以奖代补”政策的支持方向也向此倾斜。从我国柴油汽车保有量看，大型货车占比很高，在双碳目标要求下，对此类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的大型货车的替代空间很大，但对大功率电堆和系统的技术要求更高，成本也更高。从各城市或区域的情况看，此类车型的实际推广运营数量比规划数量低很多，是否能完成规划目标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二是在工业领域的替代应用潜力最大，但面临可再生能源制氢的高成本制约。工业用氢是氢能应用的传统场景，每年用氢量超过 3000 万吨，仅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替代现有化石能源制氢就是对工业领域减碳的很大贡献。我国大型炼化企业都在积极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替代利用，以达到减碳降碳目标，目前最大的障碍仍是制氢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氢在工业领域要实现规模化应用，对价格的接受度要低于交通领域。据中国氢能联盟研究院预测，2025 年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可降至 25 元/千克左右。但这个成本仍远高于化石能源制氢成本，意味着在工业领域的规模化替代应用仍较为困难。

三是在分布式发电和储能领域的规模化应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不能忽视其巨大潜力。在分布式发电领域，美国、日本分别在大型商用分布式发电站、小型家用热电联供系统上有较成熟的实践，我国也有以“氢进万家”等为代表的类似示范项目，可为我国建筑领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新的选项。在储能领域，氢

表 1 2018 年我国各类柴油汽车保有量

单位：万辆

类型	微型	轻型	中型	大型	合计
货车	0.2	1009.4	123	685.4	1818
客车	0	158.3	42.3	84.4	285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

表 2 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及成本预测

年度	可再生能源制氢 总量（万吨）	可再生能源制氢 占比（%）	制氢成本 （元/千克）
2025	35	1	25
2030	500	13	15
2060	10000	80	<7

资料来源：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编著，《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报告 2020》，人民出版社，2021 年 9 月。

能是实现长周期、季节性储能的重要选择，可带动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也是我国氢能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这两个领域，氢能利用前景是较为明确的，但由于目前面临更高的技术瓶颈，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应用。

（四）创新如何提速

持续推动技术创新是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保障，《规划》中也对全领域推进氢能技术攻关做了布署，但当前的创新体系仍存在问题。

一是基础研究创新不足。《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要加强机理和规律研究，“持续开展光解水制氢、氢脆失效、低温吸附、泄漏/扩散/燃爆等氢能科学机理，以及氢能安全基础规律研究”。基础研究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氢能科技领域，国内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独到创新不多，包括《规划》中强调的，与燃料电池、氢储运相关的材料科学，与氢安全技术相关的泄露、燃爆基础理论等机理性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尚存“卡脖子”风险。氢能领域不少关键材料和零部件还依赖进口，关键组件制备工艺亟须提升。燃料电池技术方面，国内已基本掌握了燃料电池汽车整车、动力系统和关键部件的集成技术，但是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国产燃料电池产品性能指标仍存在较大差距。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炭纸等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加氢技术方面，压缩机、阀门等关键零部件国内还没有量产的成熟产品，导致建设成本过高。氢气品质检测和氢气泄露等重要测试装备的国产化也尚欠缺。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装备、车载储氢罐和碳纤维材料等均与国外水平差距明显。

三是创新活动缺乏统筹。氢能产业链长，涉及能源、材料、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我国开展氢能和燃料电池的相关研究历史很长，由于缺乏统筹，导致实验室研发出的样品和样机，与产业化之间是割裂的。现阶段，我国已经将氢能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部分，未来科学有效地组织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尤为重要，需要产业链集群协同努力，从关键材料到应用各环节的工程验证，解决实际应用的关键技术难题，也可避免当前存在的企业纷纷开展全产业链技术攻关，导致研发资源分散、互相抢人才、低效竞争等问题。

（五）政策如何配套

《规划》明确了氢的能源属性，但由于缺乏相关管理细则，仍无法解决氢能的规范管理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对于氢能安全使用和产业健康发展产生了较大制约。

一是明确主管部门和管理细则是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多部门都承担着与氢能发展相关的职责，但由于主管部门未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也不清晰，导致无法形成相互协同的管理体系；由于缺乏将氢能作为能源进行管理的相关规范和细则，导致很多地方仍只能按危化品管理新增用氢项目，不适应当前氢能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新情况，影响产业发展。另外，氢能标准体系建设工作需加快推进。我国工业领域涉氢的安全标准与规范体系相对健全，近年来针对氢能新型应用的相关标准也取得了较快进展，但还存在标准欠缺或需要更新的情况，需系统性推动相关工作。

二是产业规范发展仍需政策引导。氢能产业被地方政府作为重要的新动能来培育，投资热情高，同质化发展、无序竞争现象已显现。从地方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量规划目标看，到 2025 年目标合计数已高达 10 万辆，与当前年均不足 2000 辆的产销量差距较大。另外，近两年来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投资加快。据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多个省市规划布局风光氢一体化项目，项目数量合计接近 190 项，其中大部分为在建及规划项目，建成运营的仅十几项。当前需警

惕一拥而上、盲目布局问题，迫切需要政策规范和引导，以免造成大量项目“烂尾”，导致国家资源浪费。

三是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需加快推进。2020 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采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模式，推动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方式由财政直接补贴转变为“以奖代补”方式。这项工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产业链上优秀企业所在城市进行联合，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对于基于产业链条推动区域间优势互补、优化布局起到积极作用。但奖补资金的拨付需建立在对现有五大城市群各项指标的考核评价基础上，其中对部分关键产品指标设置和技术评价存在难度，影响奖励资金拨付效率。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协作也存在难度，还需要探索形成更有效的合作机制，真正实现政策目标。

三、现阶段解决发展痛点的相关建议

《规划》发布后，我国氢能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从供给体系、应用场景到创新体系建设都在持续推进。现阶段，加快构建形成有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解决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对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一）加快完善配套政策，形成“1+N”政策体系

《规划》中提出要聚焦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大问题，打造氢能产业发展“1+N”政策体系。从当前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看，亟需体系化的政策保障。一是应基于氢的能源属性尽快出台相应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主管部门，理顺管理体制，明确氢能制储输用各环节运营规范和安全监管责任。二是完善氢能产业发展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多元标准体系，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开展国家标准制（修）订，鼓励相关社会团体制（修）订团体标准，构建标准多元供给体系。加快推进关键技术装备和产品的检验检测体系，建立完备的氢能相关产业检验认证和监督体系，推动建立专业的检测检验平台，优化关键产品和环节的检测流程与要求。三是出台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围绕制氢设施、储运网络、加氢设施等，尽快出台相关建设规范，鼓励先行先试和适度超前布局，支持开展管理模式创新。四是做好规划评估准备工作。通过对规划实施的跟踪分析、成效评估等工作，可及时发现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氢能发展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部分，要结合双碳工作进展，特别是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工作，做好氢能利用的碳减排数据统计及核算等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氢能产业发展涉及全产业链各环节多方面投资，需要科学全面地分析全生命周期的效益，核算全产业链投入产出效益，做好全产业链发展成效评估的准备工作。

（二）加强政策协调，强化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相互促进

我国发展氢能最大的价值是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在《规划》中也把“可再生能源制氢”放在突出位置。当前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高，是制约氢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氢能产业发展过程中，需加强与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相关政策协调，实现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一方面，加强与电价支持政策相协同。在现阶段网电价格较高背景下，可探索对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给予电价补贴，特别是利用谷电制氢时，可通过免收容量电费，加大销售侧峰谷电价执行范围等优惠政策，降低制备成本。落实“隔墙售电”政策，鼓励探索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离网发电制氢。对于制氢项目的风光电量存在上网需求的，给予政策支持。对于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可按制氢量规模的一定比例配置新能源装机规模，且可以不再要求配置电化学储能，体现可再生能源制氢

的储能功能。氢储能作为新型储能形式进入电力市场参与调峰，探索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加强与碳交易市场政策相协同。可研究将氢能应用减排量开发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支持氢能项目的碳减排量参与碳市场交易，通过市场交易体现出绿色氢能的真实价值。同时，支持可再生能源制氢在工业领域的替代应用，随着相关工业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氢能的绿色低碳价值可得到更好体现。

（三）统筹区域布局，实现供需匹配

《规划》中多处强调有序开展应用示范，避免地方盲目布局等，引导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信号十分明确。当前我国氢能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尚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件，再加上氢气大规模储存、运输等技术瓶颈尚未突破，现阶段氢能发展应鼓励就近消纳，减少氢能长距离运输。一是引导地方依据自身特色条件理性布局。各地在引进项目、建设投资时需充分考虑本地氢源供应、产业基础、市场空间等基础条件，科学理性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避免一哄而起，无序竞争。鼓励各地结合氢能产业主要环节和关键技术，开展小范围技术和产业示范，待成熟后，再扩大推广应用范围，避免脱离产业发展阶段和当地实际，盲目打造全产业链。二是在供需统筹基础上推动应用示范。在碳达峰碳中和约束下，低碳低成本氢源是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城市推动氢能应用应根据各自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实力考量，加强氢能的供需匹配，避免“缺氢”瓶颈。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可以开展制氢示范，但需与终端应用结合，避免“弃氢”现象，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三是加强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加强区域协同是产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探索建立城市间氢能发展战略的联动机制，加强政策协调、重大项目建设协调。根据各地优势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工体系，探索突破行政边界实现产业优化布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以产业规划推动产业协同，发挥政府间合作及规划引领和政策协调作用，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区域氢能产业发展规划，使得产业规划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科学指引。四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多元化输氢方式，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支持开展多种储运方式的探索和实践，推动高压气态储运、有机液态储运、液氢储运、管道输氢等多种路线的技术示范，加快储氢输氢相关技术材料工艺创新，破解储运方式对氢能发展的制约。

（四）开展试点示范，打通产业链堵点

《规划》提出氢能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示范先行”，强调因地制宜拓展氢能应用场景。结合氢能产业发展阶段、技术水平、经济成本等情况，现阶段宜针对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开展试点示范，以示范带动技术提升和成本下降。具体示范类型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氢能应用为牵引的综合示范，基于工业、交通等不同应用场景的减碳需求，发挥氢能作为用能终端低碳转型载体的作用；另一类可就产业链关键薄弱环节、技术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示范。

综合示范可包括：以不同技术路线的电解水制氢与就近利用相结合，在风光水资源丰富、有用氢需求地区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和应用一体化示范，试验电解槽制氢效率、灵活调节能力等。同时可开展离网制氢示范，在支持性电价政策上寻求突破，探索降低制氢成本的方式路径。在沿海地区，可基于氢能产业发展实际，开展海上风电制氢示范。在用氢需求大的地区或园区等，开展副产氢提纯检测利用、分布式低碳制氢、低谷电制氢等不同模式试点，多种路径解决低成本低碳化氢源问题。在条件成熟的综合示范区域内，可开展区域化氢能输送网络示范，探索全流程安全、高效、低成本用氢形态。

专项示范可包括：可再生能源制氢、储氢和发电调峰一体化技术示范，发挥氢能大规模、长周期储能优势，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并探索氢储能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同步开展

大型储罐、盐穴储氢等规模化储氢技术示范。特定场景下的分布式发电或热电联供系统示范，探索分布式供热供暖新的技术路线。燃料电池船舶及氢能港口等示范项目，拓展燃料电池有效应用场景。遵循“纯掺同步、由低到高、由短到长、由点及面”的推进思路，开展管道输氢试点示范；开展点对点纯氢管道、短距离天然气掺氢管道示范，适时选择钢级较低、压力不高的长输管道开展试验论证工作。研究水路、铁路输氢的技术经济可行性，适时开展技术示范。开展重型燃气轮机阶梯式掺氢试验示范。

（五）坚持自主可控，打造产业创新生态

氢能技术体系涉及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科技密集度高，有望成为承载新动能的一片蓝海，应加快构建产业创新体系，完善创新生态。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和技术创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避免导致新的“卡脖子”问题。处理好技术自主可控与终端市场推广节奏，在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前不宜过快追求终端市场应用的拓展，防止将国内市场变为国际技术迭代场。加大对氢能产业基础研发的财政资金投入，优先支持自主创新。二是开展氢能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重大工程。在支持燃料电池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同时，应开展氢能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重大工程，加快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材料研发及装备制造国产化。同时，应注重对氢能多元应用技术装备的支持力度，包括氢能在船舶、储能、工业等领域的应用。三是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当前氢能技术攻关力量不够集中，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产业发展联盟、国家级创新平台等机制，依托产业链龙头企业打造攻关联合体，全面提升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原始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国产化进程。鼓励支持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按照市场化原则支持氢能创新性企业，推动建立研发型风险投资生态系统，降低技术孵化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国家能源局网站，2022 年 3 月 23 日。
2. 张晓强：《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态势及建议》，《Engineering》，2021 年第 6 期。
3. 景春梅：《积极有序发展氢能 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专家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公众号，2022 年 3 月 24 日。
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中国氢能产业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
5. 刘坚、景春梅、王心楠：《氢储能成全球氢能发展新方向》，《中国石化》，2022 年第 6 期。
6. 国际能源署：《全球氢能评估报告 2022》，国际能源署网站，2022 年 10 月。

责任编辑：谷 岳

我国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的 机制与路径

温 灏 田惠敏

摘要：建设现代金融系统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关系到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针对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可以弥补我国金融系统专业化监督评估的制度空白，实现金融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借鉴我国政府督查工作机制，探索完善我国金融系统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建立两级评估体制，组织国家高端智库、金融系统智库承接重大专项评估，发起设立市场化机构开展专业评估。针对金融改革发展成效、金融系统服务国家发展和金融智库建言献策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在基础数据收集、智库信息系统、资金保障机制、合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保障机制建设。

关键词：金融系统 第三方评估 绩效监督 机制建设

作者简介：温 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高级经济师；
田惠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对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有助于提升管理质效，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风险预警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第三方评估是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得到有效运用和积极推广，针对金融系统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具备实践基础和现实需要。由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组织国家高端智库、金融系统智库承接重大专项评估，发起设立市场化机构开展专业评估，将其作为中央巡视、金融监管、考核评价的配套补充机制，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服务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实施。

一、第三方评估在政府绩效监督中的重要角色与功能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第三方评估作为评价和改进社会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绩效的治理工具，^① 被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广泛运用。第三方评估作为外部制衡机制，具有独立、客观、公正等显著优势，已经成为衡量和改善政府绩效、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我国政府督查工作率先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此举是深化改革的重大创新举

^①卢敏：《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体系的结构解析与优化建议》，《学会》，2020 年第 6 期。

措，在地方各级政府、各领域也获得广泛使用，对提高公共政策绩效具有把脉会诊和促进完善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式。

（一）第三方评估的基本涵义

第三方评估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形式。作为必要而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弥补了传统的政府自我评估缺陷，在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关注对社会组织及非营利组织的评估，并于 90 年代建立大量中介性或者学术性的民间评估机构，采用定量与定性方法，对社会组织开展包括绩效、项目、组织管理以及综合能力等方面的评估。^①

从西方国家经验看，第三方是指处于第一方（被评对象）和第二方（服务对象）之外的一方，与其余两方都不具有行政隶属和利益关系，一般称为“独立第三方”。多数情况下，由具有非政府组织（NGO）性质的专业评估机构或研究机构充当“第三方”。这些 NGO 可以保证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要求。^②

从我国政府改革实践看，第三方评估是指由独立于政府及其部门之外的专业机构评估，第三方的主体可以包括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研究机构、专业评估组织（包括科研院所和智库机构）、中介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我国“第三方评估”模式主要分为高校专家评估、专业公司评估、社会代表评估和民众参与评估四种。

（二）我国政府第三方评估实施概况

1. 第三方评估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支撑

自 2013 年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听取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第三方评估汇报，涵盖民间投资政策、简政放权和放管结合、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军民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及相关高校、研究机构曾承担专业评估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专职评估部门

2019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建评估督导司，作为国家层面的专职评估部门，该项工作是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创新举措。评估督导司主要职责是拟定相关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简称“三个重大”）等评估督导的制度并组织实施，提出相关评估评价意见和改进措施建议。通过精准发现问题、精准分析原因、精准提出对策、精准督促落实，推动“三个重大”更好落地见效。

3. 第三方评估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实践表明，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了我国改革发展举措发挥的积极效应，同时也揭示了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公共政策绩效具有把脉会诊和促进完善的积极作用。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大力引入第三方评估，在高等教育、精准扶贫、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营商环境评价等诸多领域广泛使用。该项举措有效推动各部门强化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考核，有效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评估，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三）政府督查第三方评估开创成功示范

2013 年，国务院在政府督查中首次引入第三方评估，中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

①卢敏：《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体系的结构解析与优化建议》，《学会》，2020 年第 6 期。

②林德楷、丁陈伟：《检察建议中引入第三方回访评估机制的探究》，《中国检察官》，2016 年第 12 期。

院、全国工商联承担了评估工作。根据部署，第三方评估主要围绕简政放权、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重大水利工程等部分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展开评估，以便与自查和督查情况进行对表分析。相对于8个督查组重点关注的19类60项具体政策，4家机构的评估内容更具针对性。

1. 开展专业评估

全国工商联负责“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的政策措施”的第三方评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和“实行精准扶贫”两项政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国家行政学院负责“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激发企业 and 市场活力”政策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中国科学院负责“国务院重大水利工程及农村饮水安全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

2. 主要评估方法

一是为广泛听取民营企业的声音。全国工商联4个调查组分赴12省市，召开的174场座谈会共有1693家民营企业参加，实地走访企业278家，回收有效问卷3044份，获取了30多万字“原汁原味”的一手素材。二是为真实反映棚改项目进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个调查组赴9省份19县市实地调研，从建设任务和进度、资金筹集、土地落实、落实政策措施四个方面全面评估棚改和保障房项目。三是为体现评估的专业性。国家行政学院组建专业复合型专家评估队，涉及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经济学、行政法、政治学、社会管理、文化科技、电子政务等领域22位专家，还成立由相关专业知名学者组成的13人顾问组。四是为确保评估的科学严谨。中国科学院用两个多月时间访谈利益攸关方千余人，实地考察了8个重大水利工程、17个县的84个农村饮水安全和小农水项目。

二、我国现行重大评估监督机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引入第三方评估为我国现行重大评估监督机制建设提供成功示范，包括重大政策和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及其跟踪审计制度等。这些评估监督机制正在逐步发挥积极效果，并形成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建立金融系统的监督评估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制度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对新出台的重大政策、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这项规定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政策决策机制、优化预算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财政部门全面把握行业前景、预算部门组织管理、项目实施计划等情况，进而合理安排预算资金，提高预算资金分配决策的科学性；二是有利于预算部门宏观把控项目，通过明确绩效目标、定位受益群体并预期项目效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进入新发展阶段，客观环境和形势变化要求重大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制度进行更新完善。以事前绩效评估为切入点，结合成本效益分析，开展支出审查，形成绩效信息和预算安排直接挂钩的绩效预算模式，将事前绩效评估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改革举措是保障事前绩效评估有效运行的重要研究议题。^①

（二）重大项目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机制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性风险是指在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的因素。国际反贫

^①曹堂哲：《重大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若干问题探讨》，《中国财政》，2020年第5期。

穷工程师协会研究表明，要消除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引起民众冲突的社会风险因素，需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开展前瞻性风险评估。^①

近年来，重大事项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机制（简称“稳定性评估”）成为国家重大项目评估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 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制定稳定性评估机制。201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分析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指出重大决策是指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事项，包括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以及其他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影响的重大决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期发布指导性办法文件。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期发布文件明确评估报告编制内容。

目前，稳定性评估机制还存在组织主体责任失范、民主参与有待健全、评估结论有待精确、工作落实有待规范等问题。对其研究大多集中于评估主体、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等内容，^② 研究内容呈现零散化和被动型。

（三）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制度

随着重大政策文件的出台及不断贯彻落实，政策跟踪审计变得更加重要，在落实重大政策方面发挥着监督保障作用。自 2014 年开始，《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实施办法》《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指导意见》等相继印发，强化对审计工作的指导，要求审计机关在跟踪审计过程中梳理好思想意识，坚持审计工作原则，把握审计工作重点，严格按照工作要求执行。2019 年 11 月，审计署印发《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实施办法（试行）》。目前的政策跟踪审计已经变为常态化工作，开启全新的跟踪审计模式，开展审计全过程监督，保证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则有效规避了事后审计的风险敞口，监督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执行效果。在重大项目建设、重大资金使用等方面，要重点跟踪，对落实不好的问题加以改进，对整改较好的经验做法开展借鉴学习。

从整体实践看，跟踪审计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共性问题，难以适应“十四五”发展规划对重大政策落实情况提出的新要求。一是审计计划阶段，审计重点不清晰、政策下达不及时、人力资源不充足。二是审计实施阶段，信息共享不健全、统筹协调不到位、技术方法不完善。三是审计报告阶段，问题评价标准不明确、审计公告披露不及时、审计结果披露范围小。四是审计后续阶段，审计整改力度不够强、“屡审屡犯”问题常态化、审计宣传力度不够大。

三、我国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的机制建设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遵循党管金融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统筹兼顾中央巡视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层级监督管理职能，加快完善我国金融系统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填补金融系统绩效管理的第三方评估制度空白，协同构建党中央统一领导的金融系统评估监督体系，为国家发展全局、金融稳定大局提供坚强保障和决策支撑。

^① 牟绍波、杜静：《重大项目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西部经济管理论坛（原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2 期。

^② 同上。

（一）评估机制和实施主体

鉴于我国金融系统复杂、庞大，在执行国家意志、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功能，结合现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市场合作机制，坚持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原则，由金融委牵头组建评估体系和机制，吸收国家智库、金融智库、社会智库和专家，建立常态化制度安排。建立顶层推动和社会参与的两级、四层评估体制，既体现党管金融，又发挥市场活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共同保障国家金融工作的安全稳定运行。

1. 建立顶层常态评估机制

按照我国现行金融系统相关行政管理体系，紧密结合中国金融系统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定位，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三个重大”（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评估监督机制的经验做法，在金融委设置“评估监督管理部际联席会议”，作为国家层面的金融系统监督评估协调机制（简称“监督协调机制”）。由监督协调机制指定授权专职评估部门，对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推动，制定和发布金融系统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组织国家高端智库及金融系统智库承担重大专项评估，聘请市场化专业评估机构承担常态化评估工作。

2. 动员社会主体深度参与

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积极性，吸收金融智库、科研院所、专业公司等各类机构参与评估，建立专业化、规范化、多元化的多层级评估机制。其中，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决策、执行部门，并在特定政策领域具有专业、专长的研究组织，智库成为世界各国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主体的首选。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智库建设应注重公共政策的第三方评估，使之成为智库功能新的增长点，^①更好服务政府决策咨询。

一是组织国家高端智库承接重大专项评估。由金融委指定的国家高端智库机构，或从主要大型金融机构智库选调专员组建评估工作组，针对国家重大金融政策及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开展重大专项评估，包括事前的方案评估、事中的执行评估和事后的效果评估。坚持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二是发起设立市场化机构开展专业化评估。在金融委的指导和支持下，由银行、保险、证券等主要大型金融机构出资设立市场化的专业评估机构，针对国家金融政策成效、金融机构主体执行政策情况及自身发展等问题，按照商业化原则受托开展专业评估。评估内容、评估周期、评估成果运用由金融委统筹安排，并为此制定相应的评估管理办法。三是聘请市场化评估机构购买评估服务。按照金融委制定的评估管理办法，由金融机构主体按照统一要求，自主聘请市场化评估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定期开展单项、专项或综合性的第三方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报送金融委备案。四是金融机构成立内部机构配合评估。按照金融委统一要求和工作部署，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在总部内设专职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推动落实第三方评估工作。一般性金融机构设立第三方评估专家顾问职务，负责选聘机构出具评估报告。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重点

根据当前形势发展需要，我国金融系统的第三方评估可包含金融改革发展成效、金融系统服务国家发展和金融智库建言献策三个方面。评估重点如下。

1. 评估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实施成效

系统评估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及重大政策的近期效益和远期影响，包括金融战略规划、金融支持重大项目、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关键领域。深入挖掘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结合评估工作中收集整

^①韩万渠：《第三方评估：智库建设的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日第2版。

理的各方建议和专家观点，提出相关评估意见和改进措施建议。

2. 评估金融系统服务国家发展情况

全面评估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和重要决策情况，包括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关键领域的时效性、合规性等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央巡视、监管意见、业绩考核等情况，通过评估“精准发现问题、精准分析原因、精准提出对策”。

3. 评估金融系统智库建言献策情况

设立符合金融系统智库建设的评估体系和专项机制，通过专业评估客观评价金融智库自身能力建设情况，针对性评估金融智库为金融改革发展、重大金融政策等做出的决策支持作用。评估过程中吸收各方综合评价意见，包括金融机构内部认可度、利益相关方评价及社会满意度等。

（三）主要保障措施

1. 扎实开展基础数据收集

评估机构按照评估方案要求，通过听取工作汇报、座谈交流、专家论证、实地调查、抽样检查、问卷调查、舆情跟踪、数据收集等形式开展第三方评估。全面收集反映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资料、图文、数据，全面了解利益相关群体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为完整、准确、全面开展评估提供基础支撑。

2. 创新建设智库信息系统

借助现代通讯、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创新技术，搭建专业的评估数据库系统和信息平台，为评估工作提供数据收集、存储、交换、处理等系统保障。通过建设“中国金融智库系统”，全面采集和统计主要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和业务开展情况，以及执行国家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实体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的正向效应和负面影响。

3. 探索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第三方评估应兼顾国家利益和经济效益，充分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国家财政资金、金融机构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第三方评估基金”，通过商业化资金运作，保障金融系统评估工作的可持续、可获得、可负担。

4. 强化完善合规评估制度

评估委托方、重大决策执行机关及相关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第三方评估工作，不得引导评估机构做出预设的事实判断和评估结论。评估机构应遵守廉洁自律要求，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影响评估独立性、公正性的活动，并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准确性负责。

四、我国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的实践路径

新时期高质量开展金融系统第三方评估，关乎国家金融安全稳定的发展大局，务须做到“周密部署、统筹安排、履职尽责、严格把关”，确保评估结果可信、可靠、可用。

（一）缜密制定第三方评估方案

强化金融委对第三方评估的领导和监督，确保评估过程安全可控，评估工作有序、精准、有效。加强第三方评估与金融系统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良性互动与衔接，形成评估合力。围绕被评估主体确定第三方评估主要目标，明确重点领域，确定评估项目。选定并委托专业性高和实力强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工作，开发评估分析框架和模型，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工作流程，建设评估工具

箱。建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 的专业数据库和信息平台。

（二）开展第三方评估试点工作

优先选取重要系统性银行开展第三方评估试点。根据评估方案和拟定目标，第三方机构应与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统计、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纪检监察、公安执法等部门和机构加强协作，或开展联合评估。评估模式可采用公司评估、专家评估、公众评估等模式。设置评估结果申辩机制，纠正评估中的偏差。

（三）总结经验开展系统性评估

在试点基础上，对第三方评估工作进行经验总结，建立评估案例库，开展评估工作内部专家论议会。不断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框架、流程等，不断修正和优化第三方评估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评估专业化、科学化能力，提升评估工作精准度，逐步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全国金融系统中推广应用。

五、我国金融系统开展第三方评估的政策建议

我国应当在充分把握综合环境和国情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自身优势和需要克服的难点，完善金融领域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评估督导机制，因地制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系统评估督导制度。

（一）高度重视评估督导工作及其法律地位

“评估”与“督导”是推动政府行政改革、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国际经验看，评估监督机制建设均上升到战略管理层面，通过立法建立权威性的评估体系。加强立法有利于强化政府行为的监督考核意识，合理追溯责任主体，推进法治型、责任型政府建设，聚焦金融发展中的成功模式和薄弱环节，切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些法律法规尽管由不同的立法机关制定，但都对重大规划、政策、评估监督主体、内容、标准、方式和程序等进行规定，从法律上保证评估监督的地位，有力推动政策评估在国内的开展和推行。通过对金融领域评估监督立法，充分体现其法律地位和法律要求，对评估监督的目的、时间要求、评估主体、评估内容、组织程序和结果应用等做出明确规范，使评估监督工作具有独立性、规范性和法制化。

（二）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估监督理论和方法

结合国情和实际，加强评估与监督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探索先进、实用的评估方法与制度设计，包括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专家评估与民众参与相结合，事前评估与事中事后评估相结合，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相区别等，^① 不断提高政策评估的针对性、有效性。我国应加强金融领域政策评估督导理论方法研究，通过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解决为什么要开展评估督导、如何开展评估督导等问题，厘清评估督导与第三方评估的关系，确定评估督导功能与目标、内容与方法、组织与实施程序、结果应用机制。采用假设检验、经验数据、定量分析等评估方法，丰富评估督导“工具箱”，探索不同类型评估模式的评估主体和组织方式，形成动态监测与反馈的纠偏

^①李志军：《完善重大政策评估制度》，《学习时报》，2021 年 1 月 11 日第 A5 版。

机制，规范和指导评估督导工作。

（三）加强评估机构、人才队伍和技术系统建设

针对金融系统的监督评估，我国应加大力度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承担评估监督工作。加强金融系统评估督导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适时建立金融领域评估督导专业委员会等专家人才支撑系统，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政策评估专家库。一是培育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主体。通过与高校和高端智库合作、国内外培训、调研等多种方式，培养专业化政策评估人才队伍，鼓励市场化专业机构培养专业人才。二是鼓励和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在公共服务、环境生态和民生领域引入公众满意度评价，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有效地衡量实施效果，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三是加强评估督导与政府绩效评价的衔接。加强政策评估结果的问责，将政策执行情况纳入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以此加强对评估督导干部人才队伍的重视培养。此外，我国需要建立金融领域评估监督大数据库和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撑系统，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逐步推进政府数据信息开放共享，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有关重大规划、政策、项目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予以公开。

（四）提高“三个重大”评估监督透明度及成果应用

建立金融系统“三个重大”评估监督信息系统，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评估过程中，要扩大公众参与面，不仅可以保证评估的客观公正，提高评估与监督的质量，同时有利于真正实现重大规划、政策、项目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的责、权、利相统一。根据不同情况，把可公开的评估信息对公众发布，接受公众监督和评议。通过对重大规划、政策、项目的评估与监督，不断地改进、修订和补充“三个重大”，尤其是重大政策的内容，使整个政策形成“制定—执行—评估—完善”的良性循环。

根据评估主体和评估目标的差异化，金融系统第三方评估成果可广泛用于国家决策、政策优化、监管指导、业绩考核、业务调整等多方领域。总体来看，评估成果主要应用方向有以下四方面：一是配合中央巡视组提供金融业务的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辅助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咨询。三是协助监管部门完善监督指导制度。四是支持主管部门优化业绩考核指标。五是协同金融机构提高管理和业务质效。

参考文献：

1. 王莉莉、李小莉、陈堃胜：《第三方评估机构困境与突围》，《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 年第 14 期。
2. 陈妹、陈云、覃维彬：《高效智库参与第三方评估的 SWOT 分析研究》，《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 年第 6 卷第 2 期。
3. 刘彦随、周成虎、郭远智、王黎明：《国家精准扶贫评估理论体系及其实践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 年第 35 卷第 10 期。
4. 卢敏：《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体系的结构解析与优化建议》，《学会》，2020 年第 6 期。
5. 尚虎平、孙静：《失灵与矫治：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效能评估》，《学术研究》，2020 年第 7 期。
6. 李文姣：《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第三方介入机制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 年第 3 期。
7. 年绍波、杜静：《重大项目稳定性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7 年第 12 期。
8. 韩万渠：《第三方评估：智库建设的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3 月 2 日。
9. 李志军：《完善重大政策评估制度》，《学习时报》，2021 年 1 月 11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 名人观察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全球化》编辑部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共同邀请宁吉喆、郑新立、余永定、张军扩、贾康、樊纲六位专家，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研究及阐释。

落实高质量发展需做好六个“结合”

宁吉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署了五项重大任务。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这些重大任务，需做好六个“结合”。

一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是以内需为主拉动的，外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结合起来，关键是要打通妨碍循环的堵点、卡点，特别是要打通阻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扩大内需与结构优化相结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上，把调结构与扩内需更好结合。把扩大内需提高到战略高度。既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也要加强软硬建设，改善消费环境；还要完善消费政策，积极拓展新型消费，并推动部分投资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消费。

三是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相结合。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我们不能拘泥于数量的简单增长，不能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要看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离不开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保持。要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量的合理增长放在重要位置，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四是乡村振兴、城镇建设、区域发展相结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同时，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五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相结合。新一轮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正在重构经济社会结构，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改变军事冲突的手段。要以经济转型为引导，进一步发挥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作用，强化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投入，加大科技攻关和开发应用力度，加快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步伐。

六是高水平改革与高水平开放相结合。在高水平改革方面，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也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高水平开放方面，继续推进要素型开放，更加重视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改革推动开放，开放也是改革，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抓住重大机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郑新立

党的二十大重申了新时代新的发展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 2022 年算起，到实现第一个目标尚有 14 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下限大体为 2 万美元，如果 2022 年后的 14 年年均增长速度按 1.5% 计算，那么 2035 年我国应达到人均 2.46 万美元。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1.25 万美元，2035 年要达到和超过 2.46 万美元，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必须达到 5% 以上。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不低于 5.5%。这是一个硬指标。从当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看，实现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是需求不足。2021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把中央关于扩大需求的部署落到实处，不仅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增长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实现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根本举措。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风险与机遇并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七个难得的重大机遇，紧紧抓住这些机遇，就能化危为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来看，人均 GDP 处在全球中等水平。2021 年，美国人均 GDP 为 6.93 万美元，为中国的 5.5 倍。中国人均 GDP 能够达到美国的 1/4，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这个标志中美经济实力变化的重要时刻有可能发生在 2027 年。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在国际上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战略或许会转为合作，并将极大地提振中国人民实现未来两步目标的信心。

一、抓住需求收缩之机，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扩大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成功经历，也积累了解决需求不足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对需求不足问题，应当视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因为扩大需求意味着扩大消费和投资，既有助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只要采取综合性对策，重视发挥综合部门的协调作用，扩大需求比抑制通胀容易得多。货币发行是需求的总闸门，扩大需求主要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功能，同时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不同，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应采取与其截然相反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扩大需求，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拉动力。在美国即将陷入经济衰退之际，实现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需求管理应主要通过强化年度宏观调控来实现。要科学制订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居民收入、物价、财政收支、货币发行、投资总额、消费总额、国际收支等指标，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批准后，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负责实施，形成宏观调控合力。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下行，形成巨大下降惯性，改变经济运行态势，需要比正常情况下注入更大拉动力，在扩大需求上需要比正常状态投入更大力度。

近两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冲击，应当采取科学精准的预防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业，应当千方百计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计划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求膨胀，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这是一般性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需求不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扩大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既是一场总体战、综合战，也是一场攻坚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二、抓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在供给侧集中发力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四个明显短板：一是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二是社会发展主要是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三是生态环境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是城市更新面临着繁重任务。只要围绕着解决这四大短板，集中发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就能够把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民间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民间投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下降，近两年稍有回升，但仍处于低迷状态。应当把鼓励民间投资增长作为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通过增加国有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增长。要把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鼓励汽车、住房、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消费增长，重点增加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发展。北京几大医院开始实行护理员替代护工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还应继续努力，总结推广上海、青岛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实行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经验，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推行医疗保险费用异地报销制度，逐步提高农村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使全体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为 2.5:1，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 11:1，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要通过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和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使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得以利用。生态环境要抓紧治理黑臭水体、雾霾天气、土地面源污染和固废资源化利用。通过建立生态环保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把环保产业尽快打造为一大支柱产业。城市更新主要包括老城区改造，城市管廊、海绵城市建设，疏解城市中心区功能，实施城市“郊区化”。上海举办世博会时以“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从城市中心区搬到郊区 300 多万人，在郊区建立居住区、商贸区、教育区、工业区、休闲区，既改善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又拉动了郊区发展，这些经验值得学习

借鉴。做好以上四件事，不仅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对扩大内需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应对美国技术封锁，激发科技自立自强能力

美国政府对我国实行政治打压、军事围堵和技术封锁，推行产业链去中国化和美中经济脱钩，其目的是打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剥夺 14 亿我国人的发展权，维护其垄断利益。我们同美国之间的斗争是争取生存权、发展权的抗争。我国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产品长期主要依赖进口，国内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美国的封锁激发了国内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外在压力转变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大动力。要按照中央部署，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努力攻克技术难关。美国之所以能长期居于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优厚待遇吸引了全球科技人才。我们要打赢美中科技战，也必须吸引全球人才。要遵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努力提高自主培养人才质量，加快建设重要世界人才中心，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尽快以自主创新成果补上产业链短板。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量子技术、新一代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航天航空、先进制造，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现代能源体系，发展清洁能源，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以甲醇替代石油、天然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建立成本较低、清洁高效、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体系。

四、优选国外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扩大对外投资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举世无双的竞争力。扩大对国外基础设施投资，可带动建筑材料、施工机械和服务出口，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并通过人民币投资和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重点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加快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对国外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优选和带动作用，使 AIIB 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投融资平台。应允许外国政府及企业发行以财政担保和资产抵押的人民币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要加快泛亚铁路中线、西线建设，把孟加拉湾打造为我国海运第二大通道，扩大同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密切中南半岛诸国与国内的经济联系。积极推动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建设。逐步在亚欧大陆形成便捷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网络，为亚欧经济合作提供重要支撑。加大对国内短缺资源的海外投资开发力度，优化全球经济布局。通过陆海空运和网络联通，带动贸易投资，促进共同发展，从而打破美国政府对我国经济封锁的图谋。

五、抓住美元回流机遇，扩大海外熊猫债发行规模

前几年，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实行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目前严重通货膨胀。为抑制通胀现在又不断提高利率，导致美元升值回流，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外汇短缺。此时，允许一些外汇短缺国家发行以主权担保的人民币债券，进口中国商品，偿还到期债务，可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如俄罗斯、阿根廷、斯里兰卡等，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施以援手，有助于深化与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合作。

六、利用欧洲能源短缺之机，吸引外资补上国内产业短板

我国每年进口化工产品 2000 多亿美元，特别是精细化工产品缺口大。生产化工产品的原料主要是石油、天然气。由于乌克兰危机带来欧洲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供给短缺，使得一些化工企业难以生存下去。借此机会，吸引欧洲化工企业来我国投资，可弥补我国化工产业缺口。乌克兰危机还带来化肥供应短缺，针对欧洲市场需求，引进化肥和生物肥料生产企业，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能

增加出口。欧洲的化工企业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有不少像德国巴斯夫这样的公司。巴斯夫公司做出在中国投资的决策，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有关部门、地方和企业应抓住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与欧洲企业的合作，把吸引外资作为振兴中国化工产业的重要举措，筑牢中欧经济合作的基石，以扩大中欧合作抗御美国封锁。

七、抓住发达国家抑制通胀机遇，积极扩大出口

多年的美元滥发带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由于居民收入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造成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消费者怨气冲天。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是发达国家抑制通胀的一剂良方。我们应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进一步扩大对陷入通胀危机的国家的出口。要充分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作用，利用多边和双边贸易互惠协议，为扩大出口创造有利条件。要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的优势，完善跨境物流基础设施，使发达国家的居民能够坐在家门口即可方便地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电动汽车经过多年锤炼，已经具有全球竞争力，要支持电动汽车走进全球市场，这既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高端消费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良机。2022 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过德国。2023 年的出口量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汽车这个世界第一商品的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一，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经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说明凡是发达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国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

（作者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积极应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

余永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22 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4.8%，二季度增长 0.4%，三季度增长 3.9%，前三季度增长 3%。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虽然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来说，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仍然严峻。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持续了 12 年，从 2010 年的 10.6% 降到 2019 年的 6%；季度增速由 2010 年第一季度的 12.2% 降到 2019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 6%。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冲击，中国 GDP 增速更是跌落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 2.2%。

2022 年初，中国政府确定了 5% ~ 5.5% 的增速目标，并制定和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说，年初的经济增速目标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来说也是正确的。既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正确的，方向和力度也是大体正确的，为什么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差强人意？事实证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宏观经济领域之外的因素制约，并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影响。

2022 年，决定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无疑是新冠疫情。中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防疫政策对人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增长

的影响。在 2020 年疫情爆发之时，武汉采取封城措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基于奥密克戎传染性强、青年人致死率低、老年人致死率高的特点，我们可以更多考虑以保护老人（预防、检测和治疗）为中心，以特定人群为对象实行精准防控，从而尽量减少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干扰。

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特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地方政府来组织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但基础设施投资能否顺利实施，能否有效推动经济增长，除受外部条件的制约外，还要解决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而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和专项债管理则是操作层面上的两个突出问题。

理论上，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可以由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提供，如果一般公共预算出现预算赤字，可以发行国债弥补。但由于担心增加中央政府显性债务，担心在地方层级产生道德风险，中央政府执行了尽量减少“预算内”融资的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要受中央政府金融风险防范政策的制约。在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又要防范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融资结构：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中，成本最低的资金——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占比最低；成本最高的资金——城投债及一些非标产品则占比最高。一方面是低商业收益（甚至无收益）、缺乏现金流（甚至无现金流）的作为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项目；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高度依赖市场化的高成本资金。这种融资结构降低了狭义国债对 GDP 之比，即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但却提高了广义国债对 GDP 之比，即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金融风险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转移，但作为一个总体，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并未降低。相反，由于这种融资结构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资金和管理成本的上升，金融风险可能反而增加了。

对专项债发放和使用的管理缺乏必要灵活性是在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在操作层面出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难以覆盖资金成本，政府就只好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管理，特别是在加强专项债资金管理上下功夫，希望通过这种管理实现项目资金的收支平衡。在现行专项债管理制度下，专项债从项目申报、发行到资金分配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且手续繁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放和使用专项债的监管过于严苛，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影响了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的积极性，从而在一些地方造成专项债资金闲置的状况。

基础设施融资结构和专项债管理所表现出的问题都同决策者降低中央财政风险的指导思想有关。这种风险防范意识应予以正面评价。但应该注意到，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跌，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显性恶化换取经济增长的稳定可能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中国的经验已一再显示，提高 GDP 增速可能是降低宏观杠杆率的更有效办法。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使政府债务显性化，增加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特别是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不要过于担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特别是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加。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增发国债来平衡财政。

2022 年以来，美联储已 5 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 300 个基点，对中国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形成重要制约。为了维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允许人民币贬值。到目前为止，笔者认为中央银行的“善意忽视”（benign negligence）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 2022 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发生较大幅度贬值，但这种贬值给中国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还是可控的。从短期看，中美利差会对人民币形成贬值压力。但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应该阻碍央行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灵活的汇率制度和适度的资本管制，中国是可以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笔者相信，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现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就会改善，人民币就会实现稳定。

总而言之，尽管中国经济目前还面临众多困难，但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的基础还在。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协调好各种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坚持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就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优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走深走实

张军扩

在机遇风险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国内外环境下，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最好的应对之策，还是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不断优化我国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吸引力。我国发展基础牢固，供给需求优势明显，只要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吸引力，就一定能够形成更强的发展优势，不仅能够抓住机遇，也能够化危为机，获得更好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虽然成效显著，但客观讲，这些成就主要还是集中在企业投资创业经营活动的“便利化”方面，而在一些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上，需要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比如，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隐形壁垒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新官不理旧账承诺不兑现问题、政策不稳定不透明不可预期问题，等等。对于企业来说，与办事的“便利化”相比，这些问题可能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甚至更加生死攸关。如果说前一阶段的以“便利化”为重点的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 1.0 版的话，下一阶段以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为重点的工作，就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2.0 版。解决深层矛盾，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走深走实，需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直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继续明确这三项要求，而且提出要按照这三项要求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是应有之义。不过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形势的复杂变化，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行政干预增加、市场化力量削弱的“非市场化”迹象。比如，为控制一些重要商品价格上涨，一些地方、部门动辄实施行政干预，甚至直接限价。虽然这样的干预有一定的法规依据，但运用过多甚至成为常态，就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让价格信号失灵。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在客观上计划、行政力量增强而市场力量削弱，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市场主体信心的增强，最终也会损害发展的后劲。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总体来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也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市场主体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政

府失信相关的问题，包括新官不理旧账、招商承诺不履行、市政工程账款拖欠等。二是司法不公、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导致市场主体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即便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案例发生，导致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侵害，也会在企业群体中产生寒蝉效应，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产业布局剧烈调整、各国产业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外商投资下滑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2022 年前三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9%，可是分类来看，内资企业投资增长 6.2%，港澳台资企业投资增长 3.8%，而外资企业投资是下降 2.9%。这种情况说明，提高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不仅具有重要性，也具有紧迫性。2022 年 10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任务提出新要求，做出新部署。还特别提出，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便利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高管、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在党的二十大结束后不久，国家部委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外资在我国发展，对外资是一种正面导向，受到外资企业的欢迎。希望能够得到切实落实，创造更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第二，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政策风险问题是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另一个问题，也是今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走深走实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策的稳定性问题。越是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时期，越需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稳定企业预期与信心。强调稳定性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特别是对于那些对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和竞争力状况影响较大、企业一时难以满足新的政策要求的政策变化，一定要给相关企业满足新的要求留下一个必要的过渡期。对于那些合规经营而单纯由于政策变化遭受损失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补偿。

二是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问题。这方面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专门就“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问题做出论述。会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还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为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从系统科学角度看，“合成谬误”的产生，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密切相关。在条块分割体制下，政策系统性的缺乏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解决“合成谬误”“分解谬误”，根本上来说，需要从解决条块分割的治理体制问题入手。

第三，要更加注重大的宏观环境、舆论环境的改进。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的问题，包括疫情防控政策优化问题、地缘政治风险问题、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以及房地产和财政金融风险化解问题等；而政府政策部门的注意力则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具体，更加关注房租问题、税费负担问题、贷款融资问题等。有些企业家表示，与贷款融资、税费负担等具体问题相比，他们更担心的是宏观环境问题、政策风险问题。如果大的环境有待改进，具体支持救助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走深走实，不仅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支持救助政策，更需要大力改进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后不断被误解误读，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双循环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国内循环，共同富裕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劫富济贫，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国家要打击资本，等

等。由此可见，重要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充分酝酿，权衡利弊，而且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充分解读，以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排斥和否定“资本推动”

——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学习领会

贾 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依“新的两步走”时间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概念，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反映“共同价值”的共性），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个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第二，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基础上厚植物质基础，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第五，和平发展，在合作共赢的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

要以“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八个关键词语，作为本质要求，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要坚持相关五大原则：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发扬斗争精神（奋斗、缠斗、韧斗）。在学习、理解、领会中，笔者关于“问题导向”有一些思考和研讨。

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相关系统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精神，还需要避免片面化和落入误区。例如，有公众号以“全面解读二十大报告”为题，却“一言以蔽之”地作为小标题，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进而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其核心内容是完全否定“资本推动”（但未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应以什么来推动），把资本推动这一概念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和“西方的现代化”划等号，而彻底加以排斥。笔者认为，这就是明显地落入认识误区而违背了中央的指导精神。但这样的认识，却很可能在中国舆论场上引出具有“煽动性”的不良效应，有必要讨论和澄清。

从学术原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理性来看待资本，首先要与时俱进地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的不当贬义化、妖魔化，加以正名和澄清。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也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它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推动作用，并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实早已为“资本”

正名：国营企业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改称“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有”什么？直观地看，当然有资产，即钱和物。这些资产的运用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而“管资产”的表述，已随改革深化推进到国企改革主线上的“管资本”。进而这种国有资本运营，当然要发挥其推动作用，否则就丧失了存在意义。再有，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中，相应的预算管理形式，一开始就称之为“国有资本预算”。那么这样看起来，怎么能把“资本”这一概念归之于贬义词，同对其推动作用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呢？

的确，国有资本之外，还有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但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它们也只应基于“资本中性”逻辑来看待，以对接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概念。那也就必须承认，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和参与分配的必然性。在经济发展中，对各生产要素表现的合力作用，不宜直接联系“现代化”概念而陷入内涵模糊不清的谁为主导、谁为中心的“标签式选择”的讨论。至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科技含量等概念的区别化分析考察，则内涵和逻辑清晰，但这些是技术性的概念，完全不宜去贴“主义”标签。显然，我们不能说，凡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凡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性的要点在于，以资本的本性而言，无论是国资、民资、外资，都要参与发展，都必然要以保值增值取向的扩张，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其功能作用的两重可能性：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同时，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等参与分配的结果，也需要得到基于合理政策与合理制度安排的引导与调整。中央已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扩张、发展方面，要设置红绿灯；分配方面，要优化一、二、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所以，合乎基本学理和逻辑的理性认识应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决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是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发展中得到发挥。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作为其内涵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谐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都客观地要求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来支持，都不可排斥、否定，而应充分注重资本要素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其健康推动作用的充分发挥。认清这一点，不论对于当下刻不容缓的稳经济大盘，改善市场预期争取经济运行恢复进入合理区间，还是对于长远的“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具有极为明显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聚焦科技创新能力 深化体制改革

樊 纲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已经有了一定创新能力，在一些产业上已经接近世界前沿或已经有了自己的创新成果。但总的来说，多数产业在技术能力上还处在“中高端”的水平，离

“前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自主创新的能力仍然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更加努力地发挥后发优势，即通过学习、模仿与吸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购买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中间产品。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扩大知识增量，快速进入一些科技产业，掌握新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在“干中学”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在“正常情况”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发挥后发优势为主要的增长动力，其实可以说是“最优的”发展路径。从经济均衡的角度看问题，一个正常的世界经济体系，也不需要一个国家什么都自己创造、自己生产，大家在市场上专业化分工，各有所长，通过贸易相互依存，也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变得“不正常”了。美国出于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原因，动用国家机器并在国际上联合盟友对中国实行脱钩、断供、封锁、“卡脖子”，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它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抓住了要害”，就是要切断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各种渠道和路径：终止与中国学者的交流，禁止中国留学生学习某些专业，禁止向中国转让技术，禁止向中国企业出售各种高技术设备，对新技术中间新产品（包括芯片）实行“断供”，等等。

这种新的国际环境迫使我们的企业不得不更多地选择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困难的道路，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围绕如何提升创新能力，改革我们的体制和规则。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制度框架，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聚焦”科技创新体制与政策的改革，最大限度地挖掘创新增长的潜力。围绕建立科技创新能力的体制与政策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制度保证解放思想。西方的繁荣得益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国的繁荣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大家熟知的历史。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自由、百花齐放、思想碰撞，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尊重失败；保障科学家集中精力搞学术、搞专业、搞创造，不受社会事务的干扰。在应用技术层面和企业层面，这很重要；在基础理论、科学研究部门和大专院校层面，更加重要。没有基础科学新思想新理论的不断涌现，就还是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搞应用。我们是后发国家，在基础理论层面对人类科学进步的贡献相对还少，需要待以时日，这无可厚非；但从长远看，没有伟大的科学发现和人文思想的辉煌成果，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的。

当前，思想解放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继续学习先进，包括学习美国。美国在国际上是令人讨厌的不讲规则、只按丛林法则办事的恶霸，但是在它国内，它是“按规则办事的”，特别是它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保证了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产业源源不断地产生。这正是我们后发国家要认真学习的。在美国加紧遏制中国发展的时候，我们恰恰要不被反美情绪所干扰，认真地学习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鼓励创新的各种规则与制度。

第二，在制度上切实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我们不缺国有企业，我们的举国体制在科技创新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地发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民营经济的特点在于：一是它们要用自己的钱去进行失败风险极高的创新事业，无法依靠国家补贴，但与此同时，也束缚较少，自由度较大。国有企业用的是“公款”，是必须要有规则、有监管、有“追责”的，十个风险投资只有一个成功的事情，是很难让国有企业去冒险的。在模仿式创新或追赶式创新的情况下，国企可以进行“攻关”并取得成功，但在“无人区”的创新，国企很难对一些“匪夷所思”的大胆创新进行勇敢试错，需要更多地依靠民企的冒险精神。二是在大量民用产品的领域，创新活动必须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与你死我活的企业竞争，需要进行不断调整。国有企业的决策程序使它们很难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因此，国有企业适合在一些技术比较成熟稳定的上游传统产

业，以规模效益为竞争力，而民营企业更能适应终端产业的激烈竞争。三是民营企业可以是企业家的终身事业，可以通过家族传承，长期发展、改进、创新技术，企业受“人事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方面，有利于以长远利益为目标，持之以恒地不断进行“迭代创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那些市场总值不是很大，但是很容易成为“卡脖子”技术的关键元器件、关键原材料等“专精特新”产业，将它们作为“家庭企业”持续地创新发展。

事实上，目前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自动驾驶、区块链、虚拟现实、锂离子电池、无人机等新兴科技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中国既有民企，又有国企，既有市场竞争，又有举国体制，“左右逢源”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优势。而在越来越进入“无人区”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从制度上鼓励民营企业创新的措施主要包括：首先，切实保护私人产权，鼓励民营企业家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对财富有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其次，对国有资本收购民营科技企业的产权或股权的行为，设定明确的限制。政府和国有企业帮助一些民企“纾困”或实行产业内的兼并重组，要以保持民营企业基本性质为原则，不能以“消灭”民营企业，把它们都并入国有企业为目的。再次，在政府创新资源配置过程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吸收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创新项目，包括军事、航天等“国之利器”的项目。最后，更多地向民营企业转让“保密”项目的技术，在军转民过程中更大地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第三，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体制。技术与产业的发明创造，要以企业为核心。苹果公司和华为公司就是这种核心作用的典型案例。它们各自都建立了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但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研发力量，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要，提出各种研究项目，资助科研机构和其他企业进行研究与攻关，或者收购其他企业的创新成果，然后加以整合，不断把新产品、新技术推向市场。华为过去在各国与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资助大学建立研究中心，收购兼并企业的研发中心等等，不断保持自己的科技创新领先地位，不仅在 5G 等领域领先世界，智能手机销量也曾超过苹果居世界之首。现在华为遭到美欧政府的封锁，这种技术发展的模式被人为地切割，手机产量被“腰斩”。对华为而言，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国内建立起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找到可替代的高科技中间产品，以修补“断供”导致的供应链断裂。而这类案例对我们的启示就是，需要在国内形成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科研创新能力与国际最高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提升还有待时日，这无可厚非。但要看到的是，不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本身就是阻碍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因素。

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一定是以科学研究机构和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但是中国的许多科研机构却“争当”技术创新核心，竞争政府分配的创新资源，结果导致以科学研究、发表论文为导向，往往脱离市场需求，也脱离市场竞争的重点、焦点领域。政府资金向科研机构倾斜的另一个结果是，科研机构自己的钱还花不完，缺乏参加企业为主导的创新项目的兴趣与能力。以科研机构为核心的体制，由于科研机构本身没有盈利功能，不仅导致研究机构不关心新技术的市场价值，而且其创新活动主要依靠政府资助，政府资金一旦断供，创新活动就会停滞。而若以企业为核心，不仅由企业出题目、定需求，项目本身以盈利为目的，也就使其在财务上可以持续。

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制，还有利于“民用科技助力军工产业”。人们往往注意到了军工技术可以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但忽视了民用技术也可以用于军工。乌克兰危机中成功应用于战争的最新技术如星链、无人机、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AI）技术等，都是最先由民用工业创造开发的。民用技术

的研发由企业为主导、盈利为目的，就使得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具有财务可持续性，能够不断地更新换代，或者开辟出新的“赛道”，具有政府主导的军工产业不具备的优势。不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一味依靠政府部门去组织主导军事技术研发，无法与民用工业很好地结合及互补。这也是苏联在与美国的军事竞争中，开发出大量尖端的军工技术却难以为继，不但没有惠及民用工业的发展，反而拖垮了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立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的措施包括：一是国家鼓励不同领域中的龙头企业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制定科技创新计划，邀请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有关院系）、科学家和各领域的专家参加合作。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科研机构和有关专家参与这些由企业主导的项目，并将其纳入各种考核体系，有关科研成果可以作为考核的绩效，并按国家规定和与企业的协议，享有知识产权。二是企业可以提出项目申请政府支持，也可以申请加入政府发起的技术创新项目；政府资助的大型科技研发项目，原则上要有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参加，并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是牵头、领衔作用。在那些“卡脖子”技术的攻关项目中，要明确由企业主导。三是除纯学术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外，研发机构、高等教育机构（或理工科院系）和以科技研发为资助对象的基金会等，都应建立理事会并按一定的比例邀请有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家参加且参与决策。四是国家设立并资助的科技研发项目，除少数特殊情况外，都应向企业开放，包括向非国有企业开放；由企业自主发展起来的科技产业，可以因国家安全的原因进行适当管理，但不得强行收归国有或限制其发展。地方政府设立并资助的研发项目，要有一定的比例分包给中小型科创企业。五是大力发展由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基金为主导的创新企业培育体系，充分发挥产权机制的激励作用，发挥市场机制对创新活动的引导作用，这本身也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六是以企业为主体聘用境外人才，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科技人才，有利于弱化引进人才的政府色彩，避免各种障碍与阻力。

第四，发挥龙头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正确看待“垄断”问题。有的经济理论认为，完全竞争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市场状态，垄断竞争甚至是“寡头竞争”才是最好的市场结构，因为这种市场结构最有利于创新。与完全竞争的状态相比，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条件下，产品可以有较高的定价，企业可以有较高的利润，从而可以有较大的财务能力进行创新的投入。事实上，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意义上本身就是为了在一定时期内维护创新者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垄断地位，也就是将高于平均利润的高额垄断利润作为创新的激励。这种垄断利润的存在本身又使得企业可以进一步投资于创新活动。

中国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多数竞争性制造业中，行业集中度太低，大量中小企业“完全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主要竞争手段就是打价格战，利润压得很低。越是这样就越无力投资创新活动。因此，好的制度要防止出现排斥进入、扼制创新的垄断，但要鼓励创新导致的优胜劣汰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同时，在判断垄断的问题上我们要有国际视野。中国的一些技术创新企业，在国内看上去规模庞大，但在国际比较中仍然只占有很小的份额。特别是一些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互联网有国别安全问题，但互联网本身是没有国界的，这些企业的市场地位必须放到国际市场上进行比较。大企业更容易建立起创新机制，更容易形成持续的创新投入，也可以因此而带动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创新链、产业链，形成活跃的创新生态。

（作者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李 蕊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 = 100)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估计值	2022 年 预测值	2023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				
世 界	-3.0	6.0	3.2	2.7
发达国家	-4.4	5.2	2.4	1.1
美 国	-3.4	5.7	1.6	1.0
欧元区	-6.1	5.2	3.1	0.5
日 本	-4.6	1.7	1.7	1.6
发展中国家	-1.9	6.6	3.7	3.7
中 国	2.2	8.1	3.2	4.4
印 度	-6.6	8.7	6.8	6.1
俄罗斯	-2.7	4.7	-3.4	-2.3
巴 西	-3.9	4.6	2.8	1.0
南 非	-6.3	4.9	2.1	1.1
世界银行(WB,2022 年 6 月)				
世 界	-3.3	5.7	2.9	3.0
发达国家	-4.6	5.1	2.6	2.2
美 国	-3.4	5.7	2.5	2.4
欧元区	-6.4	5.4	2.5	1.9
日 本	-4.6	1.7	1.7	1.3
发展中国家	-1.6	6.6	3.4	4.2
中 国	2.2	8.1	4.3	5.2
印 度	-6.6	8.7	7.5	7.1
俄罗斯	-2.7	4.7	-8.9	-2.0
巴 西	-3.9	4.6	1.5	0.8
南 非	-6.4	4.9	2.1	1.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2 年 12 月)				
世 界	-3.1	5.9	2.8	1.5
中 国	2.2	8.1	3.1	4.5
美 国	-2.8	5.9	1.9	0.2
欧元区	-6.3	5.3	3.2	-0.1
日 本	-4.7	1.7	1.5	1.3
印 度	-6.6	8.7	7.0	5.7
俄罗斯	-2.7	4.7	-3.5	-2.9
巴 西	-3.3	5.0	2.9	1.0
南 非	-6.3	4.9	1.8	1.4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季度。(2)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半年度。(3)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月度。其中,南非、俄罗斯和巴西数据来自 8 月份报告。(4)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 = 100)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估计值	2022 年 预测值	2023 年 预测值
世 界	-8.2	10.1	4.3	2.5
进 口				
发达国家	-9.0	9.5	6.0	2.0
发展中国家	-8.0	11.8	2.4	3.0
出 口				
发达国家	-9.4	8.7	4.2	2.5
发展中国家	-5.2	11.8	3.3	2.9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 = 100)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估计值	2022 年 预测值	2023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				
世 界	3.2	4.7	8.8	6.5
发达国家	0.7	3.1	7.2	4.4
发展中国家	5.2	5.9	9.9	8.1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2 年 10 月)				
世 界	1.9	3.6	7.5	5.1
美 国	1.2	4.7	8.1	4.1
欧元区	0.3	2.6	8.5	6.3
日 本	0.0	-0.2	2.4	1.8
印 度	6.2	5.5	6.8	5.1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21 年		3.3	2.4	4.4
	10 月	4.5	3.5	5.7
	11 月	5.2	4.6	5.9
	12 月	5.6	4.8	6.4
2022 年				
	1 月	5.9	5.0	6.9
	2 月	6.6	5.7	7.2
	3 月	7.1	6.5	7.5
	4 月	7.6	7.0	8.4
	5 月	8.0	7.7	9.1
	6 月	8.8	8.5	9.6
	7 月	9.2	8.7	9.8
	8 月	9.1	8.7	9.5
	9 月	9.2	8.9	9.6
	10 月	9.7	9.5	9.7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21 年		8.6	6.2	10.5			
	11 月	4.0	2.9	4.9	54.2	52.6	53.3
	12 月	4.0	3.0	4.8	54.3	53.3	53.4
2022 年							
	1 月	3.9	1.4	6.8	53.2	51.3	52.2
	2 月	5.1	3.6	5.9	53.7	52.2	53.7
	3 月	3.4	1.7	4.7	52.9	50.9	51.4
	4 月	0.6	1.3	-0.6	52.3	48.6	50.5
	5 月	2.3	1.9	3.3	52.3	49.6	50.9
	6 月	2.8	2.1	3.3	52.2	52.4	50.1
	7 月	2.2	1.1	3.5	51.1	50.0	48.9
	8 月	3.4	3.1	3.3	50.3	49.4	48.2
	9 月	4.5	4.7	4.8	49.8	48.7	47.7
	10 月				49.4	48.7	46.9
	11 月				48.8	47.8	46.8

注 : (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环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0 年		-2.8	-3.0	2.6
	3 季度	35.3	43.0	-5.9
	4 季度	3.9	3.9	-0.1
2021 年		5.9	8.3	0.6
	1 季度	6.3	10.8	6.5
	2 季度	7.0	12.1	-3.0
	3 季度	2.7	3.0	-0.2
	4 季度	7.0	3.1	-1.0
2022 年				
	1 季度	-1.6	1.3	-2.3
	2 季度	-0.6	2.0	-1.6
	3 季度	3.2	2.3	3.7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环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2.3	-13.2	-9.0
	3 季度	29.2	59.5	88.2
	4 季度	16.8	24.2	32.9
2021 年		7.4	6.1	14.1
	1 季度	9.7	0.4	7.6
	2 季度	5.8	4.9	7.9
	3 季度	-1.1	-1.1	6.6
	4 季度	0.6	23.5	18.6
2022 年				
	1 季度	4.8	-4.6	18.4
	2 季度	-5.0	13.8	2.2
	3 季度	-3.5	14.6	-7.3

注 :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 (表 6、表 7)。

资料来源 :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同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0 年		-2.8	-3.0	2.6
	3 季度	-2.0	-1.7	1.6
	4 季度	-1.5	-1.4	1.0
2021 年		5.9	8.3	0.6
	1 季度	1.2	2.8	1.8
	2 季度	12.5	16.6	-0.7
	3 季度	5.0	7.4	0.7
	4 季度	5.7	7.2	0.5
2022 年				
	1 季度	3.7	4.8	-1.6
	2 季度	1.8	2.4	-1.3
	3 季度	1.9	2.4	-0.3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 2. 3	- 13. 2	- 9. 0
	3 季度	- 3. 2	- 14. 6	- 8. 4
	4 季度	1. 0	- 10. 0	0. 4
2021 年		7. 4	6. 1	14. 1
	1 季度	4. 1	- 6. 1	5. 7
	2 季度	15. 0	20. 2	30. 5
	3 季度	7. 6	6. 6	13. 3
	4 季度	3. 7	6. 5	10. 1
2022 年				
	1 季度	2. 5	5. 2	12. 7
	2 季度	- 0. 2	7. 3	11. 2
	3 季度	- 0. 9	11. 3	7. 4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21 年		1. 9		5. 4	674. 3
	11 月			4. 2	64. 7
	12 月	4. 4	1. 9	3. 9	58. 8
2022 年					
	1 月			4. 0	50. 4
	2 月			3. 8	71. 4
	3 月	- 5. 9	- 0. 4	3. 6	39. 8
	4 月			3. 6	36. 8
	5 月			3. 6	38. 6
	6 月	- 4. 1	- 2. 1	3. 6	29. 3
	7 月			3. 5	53. 7
	8 月			3. 7	29. 2
	9 月	0. 8	- 1. 3	3. 5	26. 9
	10 月			3. 7	28. 4
	11 月			3. 7	26. 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1 年	23075		4. 5	35919		14. 0	- 12843
10 月	2259	6. 8	21. 9	2941	1. 4	18. 8	- 682
11 月	2281	1. 0	21. 1	3061	4. 1	20. 8	- 780
12 月	2324	1. 9	19. 8	3113	1. 7	21. 3	- 789
2022 年							
1 月	2278	- 2. 0	15. 3	3158	1. 4	20. 8	- 880
2 月	2327	2. 2	20. 3	3205	1. 5	23. 9	- 878
3 月	2442	4. 9	17. 8	3511	9. 6	27. 5	- 1069
4 月	2524	3. 3	21. 6	3396	- 3. 3	24. 2	- 872
5 月	2561	1. 5	21. 8	3418	0. 7	23. 4	- 857
6 月	2605	1. 7	22. 7	3412	- 0. 2	20. 3	- 807
7 月	2609	0. 1	21. 8	3316	- 2. 8	17. 0	- 707
8 月	2617	0. 3	21. 2	3275	- 1. 2	14. 0	- 658
9 月	2585	- 1. 2	22. 2	3326	1. 6	14. 7	- 741
10 月	2566	- 0. 7	13. 6	3348	0. 7	13. 9	- 782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0 年		950	2045	- 1094
	3 季度	317	595	- 278
	4 季度	337	- 209	546
2021 年		3892	3500	392
	1 季度	737	890	- 153
	2 季度	737	1408	- 671
	3 季度	1219	599	620
	4 季度	1198	603	596
2022 年				
	1 季度	701	993	- 292
	2 季度	721	1162	- 441
	3 季度	818	585	233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0 年		-6.1	-7.7	1.0
	3 季度	12.4	14.0	6.1
	4 季度	-0.3	-2.9	0.6
		5.3	3.8	4.3
2021 年	1 季度	-0.1	-1.9	-0.3
	2 季度	2.0	3.4	2.1
	3 季度	2.3	4.5	0.5
	4 季度	0.5	-0.1	0.4
2022 年	1 季度	0.6	0.0	0.0
	2 季度	0.8	1.0	-0.1
	3 季度	0.3	0.9	0.1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6.2	-8.9	-8.5
	3 季度	15.6	16.3	13.0
	4 季度	3.5	4.7	5.8
		3.6	10.5	8.3
2021 年	1 季度	-2.3	1.1	-0.8
	2 季度	1.8	2.5	3.0
	3 季度	-0.8	1.9	2.1
	4 季度	3.4	2.6	4.7
2022 年	1 季度	-0.7	1.4	-0.7
	2 季度	0.9	1.7	2.2
	3 季度	3.6	1.7	4.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2021 年		3.9		7.7	1261.6
	10 月			7.3	1192.5
	11 月			7.1	1169.2
	12 月	0.0	2.2	7.0	1155.9
2022 年	1 月			6.9	1143.3
	2 月			6.8	1131.4
	3 月	0.1	2.5	6.8	1126.3
	4 月			6.7	1118.0
	5 月			6.7	1113.0
	6 月	0.4	1.6	6.7	1111.3
	7 月			6.6	1103.6
	8 月			6.7	1105.0
	9 月	0.0	0.5	6.6	1101.4
	10 月			6.5	1087.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0 年		-6.1	-7.7	1.0
	3 季度	-3.8	-4.5	2.6
	4 季度	-4.1	-7.4	3.3
		5.3	3.8	4.3
2021 年	1 季度	-0.8	-5.0	3.2
	2 季度	14.2	12.3	8.7
	3 季度	3.9	2.9	2.9
	4 季度	4.8	5.9	2.6
2022 年	1 季度	5.5	7.9	3.0
	2 季度	4.2	5.4	0.7
	3 季度	2.3	1.7	0.4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6.2	-8.9	-8.5
	3 季度	-2.7	-8.6	-8.8
	4 季度	-8.0	-4.2	-7.6
		3.6	10.5	8.3
2021 年	1 季度	-5.5	-0.2	-5.6
	2 季度	18.9	26.2	22.1
	3 季度	2.0	10.5	10.3
	4 季度	2.0	8.3	9.2
2022 年	1 季度	3.6	8.7	9.3
	2 季度	2.7	7.9	8.4
	3 季度	7.4	7.7	10.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1 年	24378		14.3	23206		22.1	1171
10 月	2078	2.5	7.6	2102	6.1	26.1	-24
11 月	2150	3.5	14.8	2198	4.6	33.7	-48
12 月	2140	-0.4	14.2	2279	3.7	39.0	-139
2022 年							
1 月	2232	4.3	20.0	2339	2.6	46.3	-107
2 月	2254	1.0	17.5	2376	1.6	39.8	-122
3 月	2280	1.2	14.8	2483	4.5	37.3	-202
4 月	2315	1.5	12.9	2646	6.6	40.3	-331
5 月	2422	4.6	28.6	2709	2.4	53.1	-287
6 月	2419	-0.1	19.9	2745	1.3	44.0	-326
7 月	2374	-1.9	13.0	2769	0.9	43.3	-396
8 月	2466	3.9	24.2	2925	5.6	53.5	-459
9 月	2502	1.5	23.5	2866	-2.0	44.5	-364
10 月	2492	-0.4	17.9	2775	-3.2	30.7	-283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19 国之间的贸易额。月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1 年		- 1327	1620	- 2947
	10 月	41	326	- 286
	11 月	579	627	- 49
	12 月	- 1284	- 1029	- 256
2022 年				
	1 月	512	408	104
	2 月	- 118	151	- 269
	3 月	- 66	- 7	- 59
	4 月	168	114	54
	5 月	- 152	863	- 1015
	6 月	- 439	- 387	- 51
	7 月	196	130	66
	8 月	435	602	- 167
	9 月	- 470	257	- 727
	10 月	- 25	62	- 87

注:(1)指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2)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 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0 年		- 4. 3	- 4. 7	2. 4
	3 季度	5. 6	5. 4	2. 4
	4 季度	1. 9	2. 0	0. 8
2021 年		2. 1	0. 4	3. 5
	1 季度	- 0. 1	- 1. 7	- 0. 2
	2 季度	0. 3	0. 1	1. 9
	3 季度	- 0. 5	- 1. 3	1. 3
	4 季度	1. 2	3. 2	- 1. 1
2022 年				
	1 季度	- 0. 5	- 1. 0	0. 5
	2 季度	1. 1	1. 7	0. 7
	3 季度	- 0. 2	0. 1	0. 1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 3. 6	- 11. 6	- 6. 8
	3 季度	- 0. 9	9. 9	- 7. 2
	4 季度	1. 3	9. 6	5. 9
2021 年		- 0. 1	11. 7	5. 1
	1 季度	1. 1	2. 5	1. 9
	2 季度	0. 7	3. 0	4. 4
	3 季度	- 2. 1	- 0. 3	- 1. 2
	4 季度	- 0. 5	0. 6	0. 3
2022 年				
	1 季度	- 1. 2	1. 2	3. 7
	2 季度	1. 2	1. 5	1. 0
	3 季度	1. 1	2. 1	5. 2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0 年		- 4. 3	- 4. 7	2. 4
	3 季度	- 5. 1	- 6. 2	2. 8
	4 季度	- 0. 5	- 0. 9	3. 3
2021 年		2. 1	0. 4	3. 5
	1 季度	- 1. 1	- 3. 2	3. 0
	2 季度	7. 7	5. 6	5. 1
	3 季度	1. 8	- 0. 7	4. 0
	4 季度	0. 8	0. 3	2. 0
2022 年				
	1 季度	0. 4	1. 0	2. 7
	2 季度	1. 6	2. 6	1. 6
	3 季度	1. 5	3. 8	0. 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 3. 6	- 11. 6	- 6. 8
	3 季度	- 7. 3	- 14. 6	- 13. 5
	4 季度	- 1. 0	- 5. 2	- 6. 7
2021 年		- 0. 1	11. 7	5. 1
	1 季度	- 2. 2	1. 9	- 0. 6
	2 季度	2. 5	27. 1	4. 9
	3 季度	1. 1	15. 5	11. 3
	4 季度	- 1. 1	5. 7	5. 1
2022 年				
	1 季度	- 3. 1	4. 4	7. 3
	2 季度	- 2. 4	3. 0	3. 5
	3 季度	0. 5	5. 5	10. 5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21 年		4. 9	1. 13	2. 8
	11 月	4. 9	1. 17	2. 8
	12 月	0. 8	1. 17	2. 7
2022 年				
	1 月	- 0. 5	1. 20	2. 8
	2 月	1. 0	1. 21	2. 7
	3 月	0. 1	1. 22	2. 6
	4 月	- 2. 2	1. 23	2. 5
	5 月	- 1. 2	1. 24	2. 6
	6 月	- 2. 9	1. 27	2. 6
	7 月	- 0. 7	1. 29	2. 6
	8 月	3. 6	1. 32	2. 5
	9 月	7. 7	1. 34	2. 6
	10 月	3. 3	1. 35	2. 6
	11 月		1. 35	2. 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1 年	858777		23.6	913685		33.4	-54908
11 月	73568	5.2	20.5	79050	8.2	44.1	-5481
12 月	73837	0.4	17.5	79090	0.1	41.4	-5253
2022 年							
1 月	74226	0.5	9.6	83566	5.7	38.7	-9340
2 月	74795	0.8	19.1	85242	2.0	34.0	-10447
3 月	76252	1.9	14.7	86386	1.3	31.3	-10134
4 月	77607	1.8	12.5	93276	8.0	28.3	-15669
5 月	79551	2.5	15.8	98591	5.7	48.8	-19041
6 月	82970	4.3	19.3	102189	3.6	46.0	-19219
7 月	84799	2.2	19.0	105945	3.7	47.3	-21146
8 月	84231	-0.7	22.0	107569	1.5	49.8	-23338
9 月	87090	3.4	28.9	106643	-0.9	45.8	-19554
10 月	89029	2.2	25.3	111105	4.2	53.7	-22076
11 月	87874	-1.3	20.0	105196	-5.3	30.3	-17323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1 年		36048	231125	-195077
	10 月	2479	11772	-9293
	11 月	3508	20908	-17400
	12 月	3429	25297	-21868
2022 年				
	1 月	5659	14082	-8423
	2 月	3002	15270	-12268
	3 月	7163	15802	-8639
	4 月	3538	18232	-14694
	5 月	4983	18128	-13145
	6 月	-1210	21730	-22940
	7 月	3853	17316	-13463
	8 月	3302	19293	-15991
	9 月	7137	25086	-17949
	10 月	3312	18672	-15360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0 年		-5.1	-11.0	-6.3	-3.9	-6.6	-2.7
	3 季度	-4.7	-10.3	-5.7	-3.0	-6.6	-3.3
	4 季度	-2.9	-9.2	-3.5	-0.4	0.7	-1.3
2021 年		5.0	7.5	4.9	4.6	8.7	4.7
	1 季度	0.5	-7.7	-2.4	1.7	2.5	-0.3
	2 季度	12.1	24.4	19.5	12.4	20.1	10.5
	3 季度	4.3	8.5	3.0	4.4	8.4	4.0
	4 季度	3.9	8.9	1.7	2.1	5.4	5.0
2022 年							
	1 季度	3.2	10.7	2.7	2.4	4.1	3.5
	2 季度	4.7	4.0	0.2	3.7	13.5	-4.1
	3 季度	3.9	1.9	4.1	3.6	6.3	-3.7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20 年		-0.9	-8.2	-6.5	3.4	2.9	-2.1
	3 季度	-1.0	-8.5	-4.1	4.3	2.7	-3.5
	4 季度	-1.1	-4.4	-3.4	5.3	4.5	-2.2
2021 年		4.0	4.8	6.3	6.6	2.6	3.7
	1 季度	1.9	-3.8	8.0	9.2	4.7	-0.7
	2 季度	6.0	19.9	7.6	7.8	6.7	7.1
	3 季度	4.0	4.5	5.4	4.4	-6.0	3.5
	4 季度	4.2	1.1	4.7	5.3	5.2	5.0
2022 年							
	1 季度	3.0	1.8	-3.9	3.9	5.1	5.0
	2 季度	2.9	2.4	-1.3	3.0	7.7	5.5
	3 季度	3.1	4.3	-4.5	4.0	13.7	5.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1 年		7.5	4.6	34.3	13.4	7.8	4.8
	11 月	6.0	4.1		11.6	7.0	4.3
	12 月	6.0	4.1	35.3	11.1	7.9	4.3
2022 年							
	1 月	6.5	3.9		11.2	6.6	4.4
	2 月	5.5	3.8		11.2	8.1	4.1
	3 月	5.3	3.7	34.5	11.1	7.6	4.1
	4 月	5.2	3.8		10.5	7.8	4.0
	5 月	5.1	3.8		9.8	7.1	3.9
	6 月	4.9	3.8	33.9	9.3	7.8	3.9
	7 月	4.9	3.6		9.1	6.8	3.9
	8 月	5.4	3.5		8.9	8.3	3.8
	9 月	5.2	3.6	32.9	8.7	6.4	3.9
	10 月	5.2	3.7		8.3	7.8	3.9
	11 月	5.1				8.0	3.7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21 年		3.7	4.1	5.5	4.0		
	11 月	3.1	3.7	4.1	3.7		
	12 月	3.8	3.5	4.0	3.7	3.6	
2022 年							
	1 月	3.6	3.7	3.9	3.7		
	2 月	2.7	3.7	4.5	3.7		
	3 月	2.7	3.0	5.0	3.7	2.5	5.8
	4 月	2.7	3.0	5.4	3.7		
	5 月	2.8	3.3	5.1	3.7		
	6 月	2.9	3.3	4.7	3.7	2.3	
	7 月	2.9	3.4	4.3	3.7		
	8 月	2.5	3.5	4.1	3.7		
	9 月	2.8	3.3	3.9	3.6	2.3	5.9
	10 月	2.8	3.3	3.8	3.6		
	11 月	2.9		3.7	3.6		

注:(1)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
(2)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3)越南为季度数据,印尼为半年度数据。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5034	4992	42	4680	6944	-2263
10 月	455.8	446.3	9.5	466.3	623.6	-157.4
11 月	466.5	450.1	16.5	406.3	651.4	-245.1
12 月	451.0	451.6	-0.6	458.8	626.1	-167.3
2022 年						
1 月	439.6	393.5	46.1	355.6	694.7	-339.2
2 月	434.0	411.1	22.9	400.2	676.2	-276.0
3 月	552.1	529.9	22.2	450.9	817.2	-366.3
4 月	512.5	506.3	6.3	394.2	686.2	-292.1
5 月	558.5	507.8	50.7	454.0	674.5	-220.5
6 月	562.4	533.6	28.8	407.0	679.3	-272.4
7 月	506.6	490.0	16.6	445.1	674.3	-229.3
8 月	503.6	529.4	-25.8	458.0	669.5	-211.5
9 月	486.9	497.4	-10.5	479.1	632.4	-153.3
10 月	494.1	493.0	1.1	465.0	637.5	-172.5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1226	930	296	2806	2194	612
11 月	104.7	81.7	23.1	205.0	216.1	-11.1
12 月	98.1	79.3	18.7	244.3	204.2	40.1
2022 年						
1 月	84.0	81.8	2.3	197.8	198.2	-0.3
2 月	93.3	89.3	4.0	235.1	188.8	46.3
3 月	123.3	93.3	30.0	294.0	218.1	75.9
4 月	100.8	90.5	10.3	289.5	207.6	81.9
5 月	112.7	94.9	17.8	296.5	246.9	49.6
6 月	116.4	101.4	15.0	327.7	238.6	89.1
7 月	104.9	90.3	14.6	298.6	244.9	53.7
8 月	104.7	100.7	4.0	307.7	266.6	41.1
9 月	108.4	97.6	10.8	286.6	249.5	37.1
10 月	88.1	90.5	-2.4	273.0	233.8	39.2
11 月				281.6	214.9	66.7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3912	5747	-1835	4944	3039	1905
11 月	300.4	529.4	-229.0	489.6	279.0	210.6
12 月	378.1	594.8	-216.7	574.0	306.8	267.2
2022 年						
1 月	345.0	519.3	-174.3	459.3	247.5	211.7
2 月	345.7	554.5	-208.8			
3 月	422.2	607.4	-185.2			
4 月	401.9	603.0	-201.1			
5 月	389.4	632.2	-242.8			
6 月	401.3	663.1	-261.8			
7 月	362.7	662.7	-300.0			
8 月	339.2	619.0	-279.8			
9 月	354.5	611.6	-257.1			
10 月	297.8	566.9	-269.1			
11 月	319.9	518.8	-198.9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6444	6149	296	4942	5037	-95
11 月	603.3	573.6	29.7	456.5	457.0	-0.5
12 月	607.3	611.6	-4.3	477.1	471.0	6.1
2022 年						
1 月	554.6	604.0	-49.4	339.1	401.9	-62.8
2 月	541.6	533.6	8.0	462.4	449.5	12.9
3 月	638.0	637.0	0.9	519.1	518.0	1.1
4 月	578.5	603.3	-24.8	474.8	493.6	-18.8
5 月	615.9	631.9	-16.1	500.1	522.2	-22.2
6 月	576.8	601.8	-25.0	512.3	551.9	-39.6
7 月	602.5	653.4	-50.9	465.0	524.6	-59.6
8 月	566.7	660.7	-94.0	506.7	561.7	-55.0
9 月	574.5	612.3	-37.8	523.4	532.3	-8.9
10 月	524.8	591.8	-67.0	492.8	512.9	-20.1
11 月	519.1	589.3	-70.2	493.1	494.1	-1.0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6699	7124	-425	4465	3812	653
11 月	643.7	651.8	-8.2	415.7	357.2	58.5
12 月	651.4	698.9	-47.5	406.9	349.4	57.5
2022 年						
1 月	610.9	606.9	4.0	399.8	349.7	50.1
2 月	419.7	466.7	-46.9	374.5	316.3	58.2
3 月	502.4	549.2	-46.9	435.0	385.9	46.5
4 月	507.7	565.3	-57.6	414.6	365.5	49.1
5 月	514.5	579.5	-65.1	420.5	396.8	24.1
6 月	518.0	617.9	-99.8	422.1	375.9	46.2
7 月	523.6	556.2	-32.6	432.4	382.2	50.2
8 月	521.8	548.1	-26.3	403.0	373.3	29.7
9 月	537.5	597.3	-59.8	375.2	324.4	50.8
10 月	492.5	526.6	-34.1	399.3	369.5	29.8
11 月				361.3	327.0	34.3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3353	3306	46	2298	1960	338
11 月	318.7	306.1	12.6	228.5	193.3	35.2
12 月	345.9	316.2	29.7	223.6	213.5	10.1
2022 年						
1 月	308.4	294.5	13.9	191.7	182.1	9.6
2 月	234.2	253.8	-19.6	204.7	166.4	38.3
3 月	347.1	326.6	20.5	265.0	219.6	45.4
4 月	333.2	324.7	8.5	273.2	197.6	75.6
5 月	309.2	326.2	-17.0	215.1	186.1	29.0
6 月	328.4	323.7	4.7	261.5	210.0	51.5
7 月	306.1	305.3	0.8	255.6	213.5	42.1
8 月	349.2	310.6	38.6	278.6	221.5	57.1
9 月	298.2	283.9	14.3	247.8	198.1	49.9
10 月	303.7	279.0	24.7	247.3	191.4	56.7
11 月	291.8	284.0	7.8	241.2	189.6	51.6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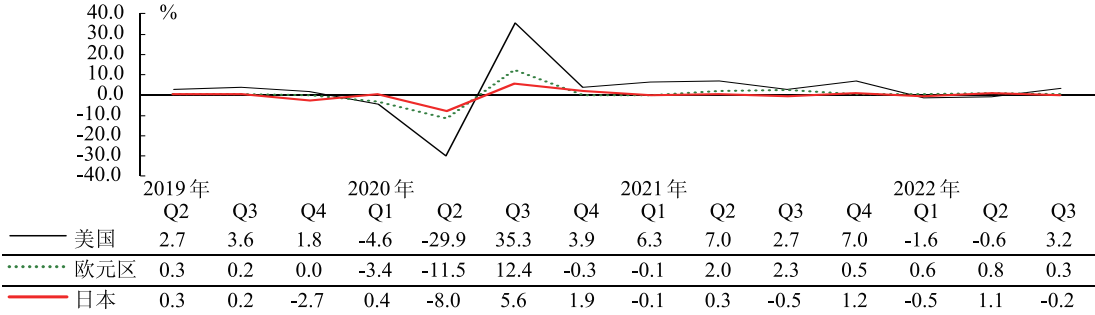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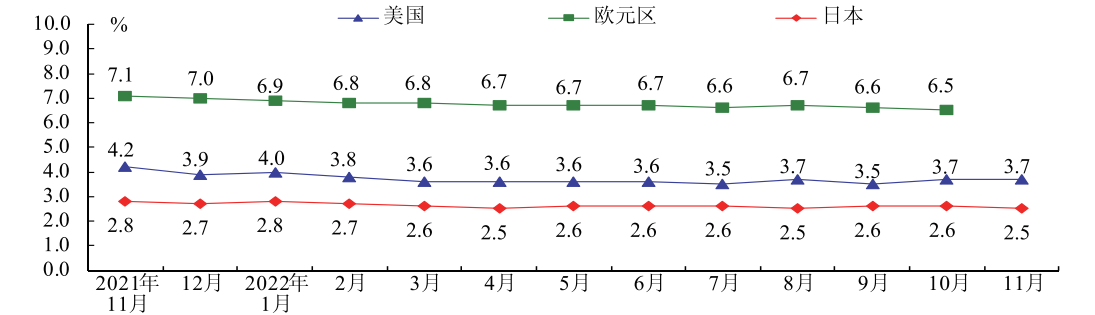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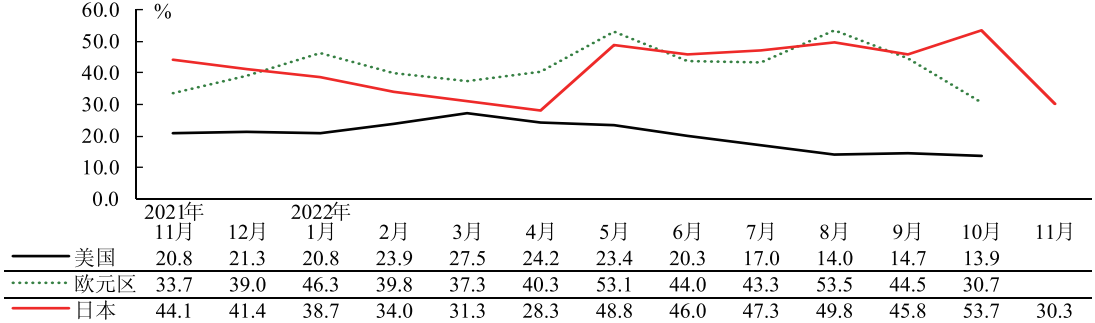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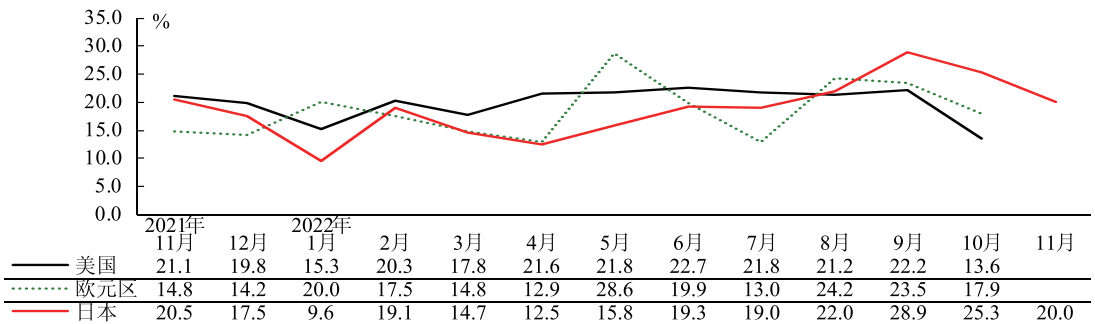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1~图4)。

ABSTRACTS

(1) Grasp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be ourselves

Zheng Jingping

The outlook for the world economy from 2022 to 2023 is not good, and it is entering the trough of nearly 20 years, and the cloud of stagflation is looming.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monetary policy was too loose in the early stage, anti-globalization, 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ahead of schedule,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the COVID-19 infection epidemic, etc. Governing economic stagflation or getting out of the quagmire of economic stagflation is a relatively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macro-control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judge the causes of “stagnation” and “inflation” respectively, and take structural macro-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m by grasping the main problems. The way out to resolve risks is to rebuild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research and create a new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currency, and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etc. A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China needs to firm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try its best to promote the globalization of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il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ccelerat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ctively and steadily promote low-carbon green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strive to be ourselves.

(2) Fed’s “triple tightening” and its policy spillover effects

Gu Yuanyang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inflation spiral, the Fed starts the interest rate hike cycle. Aggressive rate hikes accelerate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for the U. S. economy, which will eventually drag the U. S. into the abyss of economic recession. The Fed’s continued interest rate hikes have disturbed the world, driven the U. S. dollar index to rise, changed the flow of world funds, major non-dollar currencies depreciated sharply, and capital flowed out from many countries, aggravating the risk of debt crisis, causing turmoil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disorder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U. S. economy is the “microcosm” of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y. Inflation and economic prospects in most countries are uncertain, and they face more serious threats of stagflation and recession than the US. It ne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e impacts of the Fed’s monetary policy adjustments on the US economy and the series of risks it poses to the financial systems of emerging markets. It must be particularly vigilant against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Fed’s monetary policy on China, take precautions, and prepare for buffering thoughts and actions in an all-round way, strictly prevent financial systemic risks, ensure national energy and food security, and respond to possible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and world economic recessions.

(3) The great power economic game in the digital era: mode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Xu Zhengzhong , Xing Weibo , Liang Yunyan

The 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a key force for reorganizing global factor resource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hanging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pattern. In the digital age,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to seize valuable data resources, continuously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occupy an advantage in the new round of great power gam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attern and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game among major power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analyzes the economic gam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nts maintain its achievement, and other rising countrie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reshaped the game mode of the major power econom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that the network platform has become a commercial value aggregator, digital geographical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 new source of power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game is facing the superimposed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ir own endowments,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 differentiated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moted American-style digital rules by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European Union has implemen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ace of multiple constraints, the United Kingdom has maintained its role as a global digital leader by continuing to promote digit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Japan has focused on mastering the key link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value chain and

actively established a digital economy alli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economic game of major countries,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of resources, markets and rul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innovate the rules and system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layout of extraterritorial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improve the right to set UN topics.

(4) Break through the blocking points and pain point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ual circulation

Zhao Jin

In the past 20 years, relying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hina has quickly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e-commerce powers,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and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restrictions on the flow of factors,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trade barriers st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is not yet solid, and the triple pressure of demand contraction, supply shock, and expected weakening is still large, tak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with foreign trade growing against the trend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reaking through the blocking points and pain point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abilize the basic foreign trade growth in 2023 and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ual circulation. China should lead by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with trade digitalization, open up the key production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with the opening of factor markets, promote a virtuous cycle of domestic reproduction with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mo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with system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E-commer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nd standards.

(5) 50 years of Sino-US relation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Guo Da , Chi X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world today, and the trend of bilateral relations has become a major variable in the profound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ttern. 2022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Looking back on the course of these 50 year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eriods: from breaking the ice to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1972 – 1978) ; Economic and trad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ere fully opened (1978 – 1988) ; Deepening exchanges amid friction (1989-2000) ;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coexist (2001 – 2017) ; Major Change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2017 – 2022) .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2 * 3”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benefit, cognition-action, issue-response”. The next decade will not only be a critical period for China’s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rebalanc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hich largely depends on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only facing the major task of deepening their own structural reforms, but also need to reshape the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strategic thinking”.

(6) Standing at thirty: review, prospect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Korea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Hong Qunli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close neighbors and important cooperative partner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cooperation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steadily, the service trade has grown rapidly, and the two-way investment has further expanded. The signing of China-Korea FTA and RCEP marks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and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not only welcomes opportunitie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but also faces increased risks of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political interference from countries outside the region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trend of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ake the China-Korea FTA a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cus o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information, cultural tourism, medical health, and finance, desig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ervice industries,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hina-Korea FTA negotiations, achieve practical results in RCEP implementation, introduce more open support

policies,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hird-party market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local cooper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of the China-Korea Free Trade Area, and promote in-depth cooperation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n an all-round and high-quality manner

(7) 30 years of China-Korea trade: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Li Tianguo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scale of trade and deepene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achieved gratifying results. China-South Korea trad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raw material trade to intermediate goods trading mode, and the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s also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With its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nd active innovation activities, China has gradually climbed to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link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has correspondingly changed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China-Korea trad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strengthening its contain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futur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game will affect China-South Kore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to continue to expan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form a stronge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China and South Korea can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emerging industries such a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energy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continue to tap the complementarity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explore new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models.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to accelerate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China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further deepen cooperation in investment, service trade, finance, market access and other fields, and continuously upgrad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8) Influence of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on China and policy suggestions——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US trade and investment by member countries

Dong Huimei, Liu Dan, Cao Yiting, Liu Qi

As an extension of the "U. 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serves the entir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hopes to exclude China and reshape the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y establishing new rules and standards in the four areas of interconnected economy, resilient economy, clean economy and fair economy.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of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member countries to China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rect investment flow to member countries is growing overall,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 and export dependence, import and export category structure, direct investment dependence, and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y structu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advantage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of each member state or due to the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s of each country, but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arrowing day by day. With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agreements are reached in related fields, it will have a substitution effect on China's traditional trade, curb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trade, reduce the dependence of member countries on China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selectively "decouple" China's strategic industries. To this end, 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encourag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minimize its possible imp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adhering to the strategy of opening up at a higher level in a larger scope, wider fields and deeper levels.

(9) Reflections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help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Zhou Yami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f operati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leveraging public and private financing, enhancing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ild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s the largest recipient country of the GEF, China has achieved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is also actively assum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a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 and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GEF within its capacit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environment has not been reversed,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tak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common value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urrently, the GEF is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allocation of funds and agenda setting are politicized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hina will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GEF in the future and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etting agendas and standa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strive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genda toward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international game.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the help of the GEF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discourse connection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ction coordination at the practical level, and inclusivenes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10) The state of consumption research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20: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Lu Wanhui ,Jing Linbo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 Journal Citation Database (CHSSACD) develop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important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through domain experts, mainly the keywords marked by the authors, and uses the text mining algorithm to extract important keywords from the topics and abstracts as supplements, draws the network diagram of the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this field,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of research topics, publ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period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this study divides the data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into six time periods: before 1995, 1996 – 2000, 2001 – 2005, 2006 – 2010, 2011 – 2015, and 2016 – 2020, and draws a knowledge map for the research content in each time period.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fluctu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economy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grasp the change trajectory of research topics, and understand the publication status of vario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publication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of high-prolific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study of this kind in China, and it hopes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the majority of colleagues.

(11)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third-party assessment i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Wen Hao , Tian Huimin

Building a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is the core of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arrying out third-party assessments for the financial system can fill the gap in the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realize the whole chain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and keep the bottom line of no systemic risk. Drawing on the supervision work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and 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financial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gh-end think tanks,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will take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a two-level evaluation system, organize national high-end think tanks and financial system think tanks to undertake major special assessments, and initi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professional assessments.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system’s service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financial think tank’s advice and suggestion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uarantee mechanisms in terms of basic data collection, think tank information systems, fund guarantee mechanisms, and compliance assessment systems.

(12)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ain poi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Jing Chunmei , Chen Yan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2021 – 2035)” clarifies the roadmap and timetabl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and answers the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what is hydrogen”, “why develop hydrogen energy” and “how to develop hydrogen energy”. At present, China’s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hether it is green production, smooth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diversified application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link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r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policy support and othe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re are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At this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supporting policies,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1 + N” policy system for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build a policy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repare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strengthen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hydrogen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carry out targeted pilot demonstr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break through the blocking point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use demonstrations to drive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cost reduction; adhere to innovation leadership, accelerate key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build a hydrogen energy industry innov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ditor:Yang Yuge